

少数民族女性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性别作用

蒋颖荣

(云南大学,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伦理学在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迈向美好生活的同时,也关注女性自身的发展和完善,关注女性的自由和解放问题。在社会性别视角的嵌入下,我们在伦理学、女性学、民族学等学科视域下,以女性自我意识为切入点,通过对少数民族女性自我意识经由“无我”到“觉醒”再到“自主”的发展历程的梳理,可以看出少数民族女性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所扮演角色的历时性变化过程同时也是女性身份被建构、解构和再建构的过程,以及少数民族女性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和自我成长的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少数民族女性在与男性的性别角色分配、性别互动与性别观照下发挥着她们在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的性别作用。

关键词:少数民族女性;社会发展进程;性别作用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9)05-0001-07

一、问题的提出

自1980年代以来,社会性别问题的提出促成了女性主义哲学研究三个方面的转换:第一,理论基础转换。女性主义哲学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主要以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等理论为研究依据,强调某一种因素对女性的作用。进入80年代中期至今,女性主义哲学转而主要以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作为研究的理论框架,关注社会多种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注重近年来女性主义研究中的多元化、重差异、反普遍主义和反传统等趋势。第二,研究主体的转换。女性主义哲学最初主要是“有话语权”妇女的心声,即研究的主体主要是发达国家上层妇女,社会性别概念的提出,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妇女自身也存在差异,并不是一个完全统一的整体,更多阶层的妇女参与到女性研究的行列中。第三,研究客体和主题的转换。女性主义哲学研究

最初只局限于对妇女本身进行研究,社会性别概念的提出,使女性主义研究扩展到对妇女内部的不同群体、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关系、妇女与社会结构等因素的互动关系等诸多方面的研究,研究主题相应从追求男女“绝对平等”到强调“绝对差异”,再到“在社会中求公正”的转换^[1]。进入21世纪,女性主义哲学研究成果主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对西方经典原著的翻译和解读;二是对女性主义哲学基础问题的深入研究,包括对哲学方法论与认识论的研究、对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研究的深化以及对应用伦理学理论和问题(生命伦理学和生态伦理学)的关注、对“差异”以及“性别差异”与平等的研究。当代女性主义哲学在形而上与形而下两个层面考察和研究了“女性问题”,既促进了哲学学科自身的发展,也推动了女性和女性主义学术的发展^[2]。女性自我意识在女性对自我的反思与观照中成为了女性主

收稿日期:2019-07-11

基金项目:云南省2017年度基层社科智库建设课题“云南省少数民族女性在民族道德传承中的地位与作用”(项目编号:SKZK201766)

作者简介:蒋颖荣,女,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哲学系系主任,主要从事哲学、伦理学研究。

义哲学、伦理学研究的重要方面。

伦理学在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迈向美好生活的同时,也关注女性自身的发展和完善,关注女性的自由和解放问题。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11月2日在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指出,做好家庭工作,发挥妇女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独特作用,是妇联组织服务大局、服务妇女的重要着力点。要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认真研究家庭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把推进家庭工作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抓实抓好。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引导妇女既要爱小家,也要爱国家,带领家庭成员共同升华爱国爱家的家国情怀、建设相亲相爱的家庭关系、弘扬向上向善的家庭美德、体现共建共享的家庭追求,在促进家庭和睦、亲人相爱、下一代健康成长、老年人老有所养等方面发挥优势、担起责任。要引导妇女带动家庭成员,发扬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抵制歪风邪气,弘扬清风正气,以好的家风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全面展示了党中央对女性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充分发挥女性性别作用,为社会发展和家庭建设作出贡献所寄予的期待。发挥少数民族女性作为女性这一群体不可或缺的部分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性别作用同样是值得期待的。

在社会性别视角的嵌入之下,我们从女性的自我意识切入,通过对少数民族女性自我意识经由“无我”到“觉醒”再到“自主”的发展历程的梳理,可以看出少数民族女性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所扮演角色的历时性变化过程同时也是女性身份被建构、解构和再建构的过程,以及少数民族女性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和自我成长的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少数民族女性在与男性的性别角色分配、性别互动与性别观照下发挥着她们在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的性别作用。这一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新时代下进一步挖掘少数民族女性充分发挥妇女在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树立良好家风,并以良好的家风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方面独特的性别作用。

二、从“无我”到“自主”:少数民族女性自我意识的发展历程

“自我意识是一个经历了感性世界和知觉世界的自身反映,而且在本质上是一个经历了他者的自身回归。自我意识是一个运动。……自我意识仅仅是这样一个静态的同语反复:‘我是我’。由于自我意识认为差别并非和自我意识一样也包含着存在的形态,所以存在不是一个自我意识。在这种情况下,自我意识认为他者是一个存在,或者说是一个有差别的环节,但自我意识同样认为它自己与这个差别构成的统一体是另一个有差别的环节。……自我意识的现象与自我意识的真理之间的对立在本质上包含着这样一个真理,即自我意识是一种自身统一。自身统一必须成为自我意识的本质,也就是说,自我意识是一般意义上的欲望。从现在起,意识作为自我意识具有了双重的对象:首先是一个直接的对象,亦即感性确定性和知觉活动所认识的对象,但这个对象在自我意识看来具有否定事物的标记。其次就是自我意识本身,这个对象才是真正的本质,但一开始还仅仅是与前一个对象相互对立。在这种情况下,自我意识呈现为一个运动,它在这个运动中扬弃了上述对立,并发现达到了自身一致。”^[3]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自我意识是对意识的意识,是一种反身意识,是自我认知的结果,是真实的本质。我们每个人之所以为人,之所以和动物不一样,就是因为我们有自我意识。这个自我意识不仅包含着我去生存的意识,同时还包含着我对我生存过程、生存状况的观察、观看、观照。女性自我意识是女性对自我社会性别角色肯定性观察和认知的过程,是女性对自我独立人格、自我价值、自我权利和义务的自觉意识,是女性获得本真性自我、获得解放、实现自身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关键。纵观历史,少数民族女性对性别的自我意识经历了缺乏自我意识的“无我”阶段、自我意识的“觉醒”阶段和自我意识的“自主”阶段。

(一)“无我”阶段

在这一阶段,少数民族女性缺乏自觉的自我意识。我们每个人都先验地具有自我意识,然而

在现代性、主体性没有凸显之前,人们只是按照祖上遗留下来的某种传统、某种规范去展开每一天、每一年甚至是一辈子的生活,不需要对自己产生任何怀疑,因而不存在对自我认知和认同的问题。表现为对自身性别压迫的生存状态的无条件接受。

第一,性别压迫是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产物。母系社会后期,狩猎工具的改进和农耕工具的出现,使得男性可以为氏族提供更多更稳定的食物,男子在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等主要的生产部门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母权制自然过渡为父权制。“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了。”^{[4]54}“在包括许多夫妇和他们的子女的古代共产制家户经济中,委托妇女料理的家务,正如由男子获得食物一样,都是一种公共的、为社会所必需的事业。随着家长制家庭尤其是专偶制个体家庭的产生,情况就改变了。家务的料理失去了它的公共的性质,它与社会不再相干了,它变成了一种私人的服务;妻子成为主要的家庭女仆,被排除在社会生产之外。”^{[4]71}换言之,也就是社会出现了“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女性的活动范围渐渐开始局限于家庭之中,生育与抚育子女以及操持家务成为女性的当然之责。而男性的活动范围则是家庭之外的公共领域,他们控制着社会的政治、经济,从而控制着女性。社会性别分工因此就加重了女性经济上对男性的“期待”,“唯其不能自养,而待养于他人也。故男子以犬马奴隶畜之,于是妇女极苦。”^[5]

第二,性别压迫是传统社会性别文化的产物。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恩格斯指出,“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个体婚制是一个伟大的历史的进步,但同时它同奴隶制和私有制一起,却开辟了一个一直继续到今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因为在这种进步中一些人的

幸福和发展是通过另一些人的痛苦和受压抑而实现的。”^{[4]63}长期以来,由于少数民族自身发生发展的历史与文化、与其他民族交往的历史与文化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少数民族女性被选择性地塑造成家庭、家族乃至本民族不繁荣的根源、民族矛盾产生和加重的根源,被选择性地悬置在男权(父权、舅权)的话语体系中而成为一种依附男性的存在者,丧失了自我的性别意识和性别认知。

(二)觉醒阶段

在这一阶段,一方面女性的自我意识在现代性的语境之下成为了一个问题,女性不再只是一种先验的存在;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女性在获得受教育机会、获得参与公共事务活动机会的同时,逐步产生了对自我存在状态的观照。少数民族女性意识到自身与男性的不一样,她们不仅意识到“我在生存”,而且有意识地观察、审视、思考自己的存在状态。换言之,她们在强调现代性、主体性的理论背景之下,在知识的启蒙和与他人接触的对照中,开始了对“我是谁”“我应该是谁”“我能做什么”的自我认同和追问,对自我价值、自身权利和义务的追问,对现实生活世界中女性与男性之间相互关系的追问。

第一,获得受教育机会是少数民族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契机。少数民族女性获得教育的途径主要有:国家政策性支持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以家庭为中心的家庭濡化教育,以村落为中心的村寨文化涵化教育和以民族宗教祭祀圈为中心的民族文化遗产教育,渗透在少数民族女性的日常生活世界、人情往来、人生仪式、民族节日和村寨、神灵祭祀之中。“单单为了要使自己的潜在性成为现实性,意识就必须行动,或者说,行动正是作为意识的精神的生成过程。所以说,意识要根据它的现实性,才知道它是什么。”^{[6]265}意识为了成为自在自为的存在的意志,必须把自己从纯主观性中解放出来,走向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即单一性)。“有教养的人首先是指能做别人做的事而不表示自己是具有特异性的人,至于没有教养的人,正是要表现这种特异性,因为他们的举止行动是不遵循事物的普遍特性的。在

对其他人的关系上,没有教养的人还容易得罪别人,因为这些人只顾自己冲,而想不到别人如何感觉。教育就是要把特殊性加以琢磨,使它的行径合乎事物的本性。”^{[6]20} 易言之,缺乏自我意识的人不可能通过他自己的内部行为得到自我发展,必须给予外力的推动,这个外力就是教育。教育是使人由无教养迈向有教养、由感性的盲目迈向理性的自觉的前提。教育是把人从自然存在即消极的无我状态中解放出来、达到理性自由进而实现人的自由的环节,就是对人的普遍性的提升,它确立了人的自我创造和自我生成的历史主体状态,从而使人成为应该成为的人。

第二,少数民族女性获得的在当地就业或外出打工的机会是其自我意识觉醒的又一契机。当地就业、劳务输出到国内(比如云南少数民族女性到省城昆明,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国外(比如跨境而居的云南世居少数民族女性到泰国、缅甸、老挝、越南等国家)的就业机会为少数民族女性提供了越来越广阔的活动场域和生存空间,而不再局限于传统村寨的生产生活,其劳动价值得到了量化、体现和回报,这无疑为少数民族女性意识中“认不同”的起点,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女性直观地感觉到“现在的我”和“过去的我”不一样了,“我”和这里的人也不一样,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这里的生活和村庄的生活、这里的家庭生活和村庄里的家庭生活进行比较,自我的价值性得到了肯定,性别意识被唤醒,性别责任得到了物质上的肯定、强化和激励,对性别权力的追求也随着对两性对立、两性不平等问题追问而逐渐彰显。

(三)自主阶段

在这一阶段,少数民族女性意识到自身社会性别的独立性、特殊性,因而也特别强调女性的独特性和特殊性,她们在注意到女性和男性事实上的性别不平等(如同工不同酬,再比如一些重要岗位对女性的排斥和拒斥等等)问题,注意到虽然少数民族女性在获得就业机会以及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的改变的同时,也更多地注意到无论是在公共事务领域还是在家庭生活领域,她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话语权、决定权和

控制权,以及其所处的相对弱势的地位都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一部分少数民族女性以及少数民族社会中的女性文化精英群体对这一女性问题的思考从基于女性立场的两性对立转向基于男女两性作为命运共同体的两性平等与和谐,这样,问题也因此转化为不再是男女两性斗争而是彼此之间相互合作与共同发展。具体体现为少数民族女性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社会的不断进步,主动追求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能够自觉承担起自己的性别责任,能够自觉意识到自身发展、本民族发展和国家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其重要性,有着对男性性别的关怀和互动,有着对来自男性的性别关怀的期待,以及对性别平等与和谐的关切、民族和社会发展的关切、国家繁荣昌盛的关切。

三、少数民族女性在社会发展中的性别贡献

大量的田野调查显示,少数民族女性与男性拥有同样的生命质量和生命意义,在人生仪式、传统节日、日常生活中,拥有社会公共活动参与机会和家庭活动参与机会。在公共活动空间和家庭、家族活动空间里,少数民族女性自觉地扮演了家庭生活和族际交往中的重要角色,承担了许多重要的伦理责任和义务,在“在场”(女性能够与男性同时出现的场域)和“不在场的在场”(女性不能够与男性同时出现的场域)中通过与男性的携手互动共同完成了社会公共活动和家庭家族活动,从而完成了对社会发展的性别贡献。

(一)少数民族女性通过自觉承担家庭伦理角色进行代际间的道德教育

“儒家角色伦理学的鲜明的特征就是直接亲属亲情不仅是道德能力教育的切入点,而且也是在所有人类生活秩序层面的最佳化激励与模式。”^[7] 在少数民族日常生活中,基于血缘姻亲关系建立起来的直接亲属亲情是人伦关系和睦的纽带,而建立在亲属亲情关系之上的家庭则是少数民族女性进行代际间道德教育的重要场域。

少数民族由于历史、社会发展水平和独特的地理环境,在漫长的过程中形成了民族个性特征鲜明、形态多样、结构复杂的多种民族文化。同时也由于外来宗教在不同民族之间的影响(有无

以及程度)不尽一致,少数民族原始宗教、佛教(藏传佛教、小乘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在少数民族地区多元并存。只有在将少数民族伦理道德置于人的对象性活动历史性展开的过程中,才能深刻领悟少数民族对人与人自身、人与人(包括同一民族内部、不同民族之间)、人与社会(村落)、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思考,从而客观、全面地揭示少数民族地方性文化的精神意蕴。与此同时,少数民族女性是日常生活中具体事物的承担者、人生仪式(诞生仪式、成年仪式、结婚仪式、丧葬仪式)、宗教仪式(这里主要指的是家庭祭祀)的主持者和主要承担者。而仪式是少数民族族际交往的一个场域,不仅是血亲、姻亲、地缘关系表达的场域,也是联结着家族、本民族与异族之间关系的礼物流动的重要场域,同时还是代际间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场所,贯穿在仪式中的由少数民族女性承担着的富有道德教育意义的祝词、歌曲、舞蹈在具体的场域中强化和深化了道德教育的内涵和效果。

以哈尼族的诞生仪式为例。诞生仪式是人生仪式的起点,哈尼族诞生仪式包括降生仪式、保魂和处理衣胞仪式、命名仪式、见天仪式、认舅舅仪式、贺生仪式等程序。在哈尼族的诞生仪式中,蕴含着诸多的伦理文化内容。哈尼人通过婴儿的诞生仪式将追求幸福与生命价值、家族发达联系在一起,表达了他们对人生幸福的理解。哈尼族的诞生仪式十分强调劳动的价值,劳动使得个人的生命获得了意义。哈尼族诞生仪式中的“认舅舅”仪式是哈尼人尊敬母亲和重视舅权血缘伦理的集中体现,为哈尼族社会的有序运行奠定了血缘伦理的根基。哈尼人通过诞生仪式确认与婴儿的家庭(家族)伦理关系,而这样的家庭(家族)伦理关系又将在婴儿的未来成长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其一,血缘性和亲属性的社会关系网络是新生命成长过程中足可依赖的伦理情感资源。有了这样的伦理情感作为依靠,个体在成长的道路上将不会感到孤独和无助,因其能够获得来自家庭(家族)以及族群的强有力的道德支持。其二,家庭(家族)伦理关系是新生命习得伦理知识、形成道德观念和道德意志的重要平

台。个体道德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其所生存的社会伦理关系中培育和发展起来的,家庭(家族)伦理、族群或共同体的伦理文化是影响个体道德演化的主要因素之一^[8]。

(二)少数民族女性通过自身性别发展带来对女性的性别激励、对男性的性别拉动,带来乡村振兴的新思路新理念,有力地推动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少数民族女性通过走出家庭走向社会使自身得到发展,或者在当地获得就业机会,或者通过流动获得就业机会。就外出流动方面而言,“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与10年前相比,无论是省内流动还是跨省流动,流动女性因经济原因流动比例都上升了约10个百分点;与跨省流动女性相比,省内流动女性具有更高受教育程度、有更高比例是专业技术人员或商业服务业人员;同时流动年龄模式也发生了变化,15~24岁男女两性在迁移率上升阶段的差距显著缩小。改革开放后的劳动力流动为中国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女性在其中的贡献应当占四成以上。”调查进一步显示,“多数女性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或到经济更为发达的地区,是为了从事有更高收入的劳动。尽管有些女性的主要外出动机并不是帮助家庭维持基本生存条件,但无论是因婚嫁、随迁,还是因务工经商而流动,女性在流入地多数从事有收入的工作。”同时,“根据返乡者的报告,在通常情况下,男性返乡以经济和工作原因为主,而女性返乡的原因主要是家庭需求,如结婚、生育和照顾上学的孩子等,这显示出在返乡决策方面的性别差异。相同研究还发现,与农村非流动女性相比,返乡女性的非农就业比例相对较高,她们仍延续了在城市中的就业特征,与返乡男性相比有更高的商业服务业工作的比例。”^[9]

从郑真真对迁移流动和农村女性发展的回顾与展望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少数民族女性)通过流动进入城市或者经济较发达地区,无论是省内流动还是跨省流动,都获得了与异文化接触、交流的机会,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的技术技能,获得了高于流出地的经济收益,由此提升了自我发展的能力。女性(少数民族女性)返乡的原因

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家庭需求,但是她们的返乡并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带着现代文明熏陶下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回到家乡,身体力行、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周遭人们的观念和行为习惯。

于家庭生活而言,走出家庭就业的女性在职场中能够感受到来自他者(外地流入的商人、外来打工者)的文化浸润,从而或多或少会带来少数民族女性在学习方式、婚姻家庭、人生价值方面的观念思考和行为改变,少数民族女性获得自身性别发展的同时必然在日常生活中产生对女性的性别激励、男性的性别拉动,引发他们在比较当中、在女性的行为示范中,对原来长期积累下来的习惯进行反思与革新。

于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而言,走出家庭就业的女性是当地摆脱贫困、发展经济的一个重要的性别力量。无论是在当地就业还是外出就业返乡的少数民族女性,都在她生活的村寨和地区,通过经商、民族文化旅游、种植业等成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头人,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增长,促成了当地经济增长方式的多元化。身体力行的示范作用,还能够让当地原来不想干活、靠享受政府给予的扶贫政策的“等靠要”的观念意识逐步改变为个人主动的创业就业行动,从而实现劳动致富和创新致富。

(三)少数民族女性通过文化比较形成更加和谐的交往伦理观念,有效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性别和谐与族际和谐

少数民族女性在自身性别意识觉醒和对自身、民族、国家命运的关切过程中,有意识地汲取不同文化之间的观念意识,能够重新审视男女两性之间、不同族群之间的伦理关系和交往规范,在继承本民族传统伦理文化的同时,通过比较、吸收和借鉴异文化在性别和谐、族际和谐方面的伦理文化观念,形成尊重、理解、包容的交往伦理规范,并具体运用于现实生活世界,有效促进了男女两性的性别和谐,促进了不同族群之间的和谐相处。

少数民族地区仍然是以熟人社会为主要模式,人情、面子、礼物的流动依然在其生活世界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少数民族女性在日常生

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虽然多样,但都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杨华将农村人情分为“日常性人情”和“仪式性人情”^[10],其中仪式性人情主要指伴随着仪式的举办而形成的人的聚集和交往,常常是为了纪念某个人或某件事,如诞生仪式、订婚仪式、结婚仪式、丧葬仪式、宗教仪式等。这些仪式通过礼物的馈赠,能够将一个家庭因血缘、姻亲而形成的亲缘关系聚集起来,形成两个家族之间不定期的礼尚人情往来。仪式的程序性、庄重性甚至是神圣性内在地要求少数民族女性具体而适时地出现在各个细节或具体执行中,需要认真处理好自己所扮演的各个角色,从而能够强化少数民族女性的自我定位,促使她们更好地发展自我,促进其家庭与家族的和睦、村寨的和谐;同时,少数民族女性走出家庭,担任村落妇女主任等角色,积极参与农村社会的治理,促进了农村社会和谐与发展。

李兰芬教授认为,性别平等是一种需要接受基于不可更改的生物属性的自然差异而导致的事实“不平等”之上的正义价值的评价与规导的制度安排和行动准则。较之性别平等,性别和谐是一种基于“不同而和”与“和而不同”双重理念基础上注重性别个性的权利尊严和自由发展的生存理念和生活方式。作为一种生活图景、生活模式和生活理想的和谐社会需要以性别和谐为其性别生态,回归生活的生活方式则构成性别和谐语境中实现女性发展的基本实践路径^[11]。在叶文振教授看来,性别和谐是一种新型的男女相互依存、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性别关系,性别尊重、性别公平、性别友爱和性别均衡是性别和谐的基本内涵^[12]。少数民族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不仅是女性对自身命运的观照,也是对自己所生活世界的未来图景的关切,体现着少数民族女性对获得男性尊重的诉求,以及对“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期待。这就必然地在生活实际中体现为男女两性的携手、两性性别的良性互动与合作,从而实现男女两性的共同进步、共同发展。

族际和谐关系是人们对民族之间交往伦理文化良性互动的期待,形成于民族之间彼此接触、从不认同到认同的过程中。日常的生活世界

中因着血缘、姻亲、地缘关系的你来我往、在生产活动中类似哈尼族与傣族认“牛亲家”的彼此合作、农忙时节的“换工”、在人生仪式与节日活动中的礼尚往来,少数民族女性在其中都起着不可或缺或纽带作用。对两性性别和谐的愿景转化为对彼此认同的群体之间的尊重、友好和协作期待。笔者在拙著《民族伦理学研究的人类学视野——以哈尼族为中心的道德民族志》中认为,

我国西南地区多样性的民族文化形成了民族间各自不同的地方性交往文化,民族之间的交往也直接表现为民族交往文化之间特别是民族交往伦理文化之间的互动,表现为不同民族的伦理文化所规定的了的道德规范之间的调适、整合以至于达成一定的伦理共识,从而保证交往在彼此尊重、互相宽容、平等友爱的基础上进行,以形成和谐的民族关系^[13]。

[参考文献]

- [1] 刘江涛. 近年来女性主义哲学中的社会性别研究综述[J]. 哲学动态, 1999, (9): 22-24.
- [2] 肖巍, 朱晓佳. 国内女性主义哲学研究的新进展(2006—2011年)[J].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12, (4): 76-81.
- [3]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M]. 先刚,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 112.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四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5]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之《文集》第一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38.
- [6]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 上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 [7] 安乐哲. 儒家角色伦理学——一套特色伦理学词汇[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7: 171.
- [8] 蒋颖荣. 哈尼族诞生仪式的伦理解读[J]. 道德与文明, 2013(4): 136-142.
- [9] 郑真真. 迁移流动和农村女性发展: 回顾与展望[J].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2018(5): 17-24.
- [10] 杨华. 农村人情的性质及其变化[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 2008(1): 41-44.
- [11] 李兰芬. 性别和谐视域中的女性发展[J]. 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3): 93-97.
- [12] 叶文振. 论性别和谐[J].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08(6): 7-12.
- [13] 蒋颖荣. 民族伦理学研究的人类学视野——以哈尼族为中心的道德民族志[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 183.

The Gender Function of Ethnic Minority Women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Development

JIANG Ying-rong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China)

Abstract: While Ethics concerns the pursuit of happy life in a community of all mankind, it stresses the development, perfection, freedom and liberation of females. In light of social gender,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thics, women studies and ethnology, we started from ethnic minority women's self-conscious, analyzed the development of self-conscious from "nothingness of me" through "awakening" to "self-reliance", and finally revealed that the diachronic process of those women's development was also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de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women's identity and the process of self-growing, self-development and self-perfection of ethnic minority women. It is right in this process, they played their role 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rough fulfilling their special tasks, and through their interaction with and care for men.

Key words: ethnic minority women; the process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e gender function.

(责任编辑 鲁玉玲)

· 性别平等理论研究 ·

重读经典：布迪厄的《区隔》 对社会性别理论批判的启示

魏 丹

(南昌大学, 江西 南昌 330031)

摘要:布迪厄的经典著作《区隔》从社会空间及场域内的权力结构生成机制为女性主义明晰了批判方向,其社会理论不仅为宏观社会结构,同时也为社会两性微观日常生活分析提供了重要基础。性别的品味差异及由此形成的区隔,源于空间结构内不同资本的构成,进而形塑了不同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以象征暴力的形式发挥历史超验性作用。由此,布迪厄启示社会性别批判的两大方向为空间结构和制度结构。

关键词:社会性别;布迪厄;社会空间;区隔

中图分类号:C9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9)05-0008-06

一、社会性别理论的发展阶段

法国结构主义大师布迪厄的场域、惯习与资本等概念是学界分析学术场域、教育场域以及艺术文化场域的重要工具,其著作成为学界被引次数最高的作品之一。研究女性主义和社会性别者往往会提及布迪厄的另一著作《男性统治》,书中指出,现有性别秩序的改变并不靠将女性和男性对立起来,或者如激进女权主义一样靠极端地仇视男性、反对男性而实现。女性主义同其他哲学理论一样,其产生需要一定的社会基础,同时也是人类发展、追求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的结果。但从18世纪法国大革命以来,女性主义便和妇女解放运动密不可分。女性主义(feminism)起源于法国,最初翻译为女权主义,集中体现了女性个人权力斗争的中心目标。历史上出现过三次妇女运动浪潮,前两次浪潮促成了自由主义、激进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

四大流派的产生,第三次浪潮则催生了后现代、心理分析、第三世界女性和生态女性主义四大理论分支^{[1]45-47}。

社会性别理论是对性别概念和性别差别的含义进行的哲学分析^[2-3],是对资源分配和社会管理中实施社会公正和平等的一个分析框架^[4],是对女性所处不平等位置的批判^[5]。批判性是社会性别理论的重要特征。在论及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时,学者往往会涉及福柯关于身体和惩戒凝视的观点、德里达书写语言说和拉康三界说(象征现实、想象现实和现实的现实)等关于主体和话语的论述。布迪厄的《区隔: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下文简称《区隔》)^[6]则被视为社会阶层分析利器。随着20世纪9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女性主义发声的主体也更加多元化了,传统的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的声音虽依然占据重要地位,如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7],贝蒂·

收稿日期:2019-08-07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江西省建筑业青年婚恋选择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5SH08)

作者简介:魏丹,女,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女性社会学研究。

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8],凯特·米利特的《性别政治》^[9],但白人中产阶级女性已不是唯一发声主体。

女性主义从其诞生之初就充满了批评意味,如女性的角色、地位不是天经地义的,而是社会历史文化影响的结果,因而是可以改变的。除此观点之外,社会性别理论如何走得更远?女性的附属地位主要受制于父权制的影响,父权制背后又蕴含了什么样的因素与权力逻辑?布迪厄在《区隔》中以惯习、场域、资本等概念构筑的社会空间和社会阶层理论指出,应当以更具关系性或结构性的方式研究女性的处境和现有的性别秩序。女性主义分析与批评开始纷纷注重阶层、种族、公民权、劳动场域、个体地域来源等因素,如英国学者露丝·里斯特从公民身份、宗教、阶层等方面分析了女性群体内部的巨大差异^[10];李静君从性别和地缘的角度切入到工作现场,分析了阶层、性别与地缘之间的复杂微妙的权力关系^[11]。

二、社会性别理论的二元对立困境

从对大众传媒中女性“被观赏性”形象的批评,到对文学作品中女性意识缺失的批评,再到对现实社会中男女两性不平等的批判,批判性无疑是社会性别理论的重要特征。但 Toril Moi 认为,笼统的横扫一片的批判性观点的提出并不难,难的是如何进一步剖析这些观点在哪些具体的社会现实结果上得到了印证^[12]。社会性别理论批判的实体和对象是否清晰?社会性别理论是否能够突破传统的男性与女性的二元对立?其批判能否走得更远?

英国的社会学家 Janet Wolff 称“只有通过对社会性别隔离、文化生产的社会关系、文本的关系性、社会性别和社会结构等进行系统的分析,女性主义文学批判才能真正找准对象。”^[13]布迪厄对文学、语言、美学等领域以文化生产与再生产场域理论,详细分析与批判了权力结构及其在场域内的再生产逻辑,其《男权统治》更清晰地论述了性别隔离及其权力生产机制,这些理论有助于为社会性别理论明晰批判对象,突破男性与女性的二元对立,为社会性别理论提供更清晰准确

的批判方向。

布迪厄的《区隔》一书明确提出了其理论抱负:力图超越社会科学长期以来的宏观与微观、理论与经验、象征性与物质性等知识模式的二元对立局面,因此他主张研究关系性,注重分析文化和社会权力的再生产。也正是基于这个基础,布迪厄在其《区隔》中提出,社会理论应当既能够分析宏观的社会空间结构,也能够用于微观层面的分析。他在《区隔》论著中涉及了食物、衣着、音乐品味、装饰风格、择友特点、电影类型以及学生同教师交谈的感受等各个细节方面。因此,布迪厄的社会空间与社会阶层理论不是帕森斯式的宏大、巨型理论,而是既有社会结构的宏观分析,又有深入日常平凡世俗的社会生活进行的微观分析。Toril Moi 指出,并非其他社会学家不分析日常生活,但唯有布迪厄揭示了如在餐馆中吃鱼这样平常微小的事例同社会领域中的位置之间的复杂、具体、特殊的联系,并对此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分析^[12]。

因此,布迪厄的《区隔》及其理论对社会性别理论研究的启示意义在于,首先,社会性别理论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宏观社会结构上一般化地论述男性的优势地位和女性的劣势地位,或者从生产方式中探究女性地位形成的历史原因,也就是不能泛泛地谈女性是第二性,是社会文化建构的,而需要深入微观的日常生活中去探究男性和女性的细致差异,同时揭示日常生活经验中男性和女性的差异与广泛的社会历史结构、制度结构之间的关系,即为社会性别理论提供关系性视角。其次,布迪厄的由阶层、品味、区隔等形成的社会空间概念为分析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结构性地位提供了重要分析工具,甚至能够进一步细化女性群体内部的差异,为社会性别理论研究提供微观生活视角。再次,布迪厄的理论视域有助于社会性别理论突破传统的个人/社会、公共/私人领域的二元对立分析,从而将社会经验层面男性与女性社会地位的差异与社会空间、制度结构与权力的再生产机制相联系,为社会性别理论批评走得更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

三、阶层与品位——社会性别分析的切入点

布迪厄认为,差异(区隔)是无处不在的。然而并不存在社会阶层实体,真正存在的是各种差异构成的社会空间,阶层在某种意义上只存在于一种现实的虚拟状态中,它不是已经形成,而是将被建构^[14]。

布迪厄对阶层的界定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上的阶层仅是指诸如年长者、穆斯林或妇女、黑人、巴黎人与外省人等某一类特定的群体;而广义上的阶层则包含了年龄、宗教、种族、性别、居住地等在内的因素,其范围之广、包容性之强,几乎涵盖了社会系统的每一因素^[14]。本文对布迪厄阶层理论的分析主要基于在性别这一因素所形构的社会空间中,对男性和女性由于位置不同所形成的男性主导(统治)地位和女性从属(被统治)地位的对比分析。因此本文的阶层概念主要是采用了布迪厄对阶层狭义范畴的定义。本文着力于对男性和女性不同社会空间位置的结构和权力关系进行分析。

社会世界的区隔并不建立在社会的真空地带。社会空间中行动者占据的位置,即不同资本的分配结构,是行动者斗争的武器^[14]。品味与阶层紧密联系,它是指一个阶层中实践活动和商品消费的特定风格。惯习使得某阶层中的行动者在选择交往的人、进行消费或参加实践活动时按照一种统一的特定的风格行事。比如:工人和厂长在饮食、吃饭方式、运动方式、实践方式、政治观念、表达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系统的区别。惯习意味着不同的选择,是分类的原则,不同的观念意味着不同的趣味。它将好和坏、正确和错误、特别和普通等作了区分,但是这种区分并不是严格统一的。可能某一种行为或同一种商品对某些人来讲是区分的标志,而在另一些人那里则可能仅仅是作为一种炫耀等。这种不同的社会类别以原则、观念、趣味、实践、商品等表达了不同的符号意义,构成了一种真正的语言含义。在每一个社会空间中的不同位置,以及该位置附着的商品、实践、行为举止、功能等构成了一个象征体系,形成了一个区隔标志。

区隔是指一些固有的举止和行为方式的特

征,以及区分这些特征的界限。这个特征是联系性的,需要通过和其他的特征相关联才能加以界定。区隔的概念是空间概念的基础,社会空间是指根据行动者或群体所在位置,其所拥有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所建构的一个领域^[14]。

布迪厄关注差异,特别是关注同质中的分歧,其据此形成的阶层理论,为社会性别理论提供了很多可借鉴的视角。男性和女性在社会空间中同样形成不同的品味和位置区隔,在观念、趣味、商品等不同方面形成不同差异。布迪厄关于阶层与品味,通过大量的实证调查收集资料,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社会空间中的阶层、品味区隔图景。在社会性别研究中,同样可以通过同一社会阶层的男性和女性的品味、观念、消费的实证调查构建性别差异下的区隔图景,以更直观的方式去了解男性和女性的具体日常微观生活的细致差异。这一差异与区隔图景的展示,并不意味着能改变当前女性的弱势地位,女性突破自身边缘阶层的途径在于摒弃自身已有的生活旨趣爱好、审美情趣与消费方式,而培养同男性一样的品味。差异是不可避免的,而差异并不是形成位置的最终原因,其主要取决于惯习的作用和权力的再生产机制。阶层和品味为社会性别理论提供的启示是我们研究性别与品味或者性别、阶层与品味之间的关系,研究这种差异形成的位置构成。区隔理论虽然用于描述社会不同阶层在社会空间中形成的不同位置结构,但是其也具有推广性,可以用于分析社会性别秩序,为社会性别理论提供更深入的理论分析体系。

四、资本的空间架构与象征暴力——社会性别秩序的成因

布迪厄在《区隔》中指出,社会成员依据其所拥有的资本结构和资本总量在社会这一大型的空间坐标场上占据不同的空间位置。不同空间位置上的互动与交往形塑了不同的思想观念、认知行为、生活方式、性情倾向与审美情趣。即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不同的品味、爱好旨趣与行为模式。与此同时,这些空间位置之间有社会距离,社会成员作为行动者的距离是以品味和趣味的差异显现出来的。“如果不能建构出位置空间,

你就毫无机会看到你借以观看事物的立足点。”^[14]与此同时,布迪厄建构了一个三维的“社会空间”来安置社会世界中种种分配不均的资本和权力关系,“社会空间基于社会场域中资本的运作、分化与分配构建而成,拥有了资本,就意味着拥有了社会理论与社会权力,不同的行动者和群体为社会空间的不同相对位置所定义。”^[14]简言之,布迪厄认为拥有资本则意味着拥有权力,资本分配的不平等意味着权力的不平等,正是这些不平等形塑了不同的社会行动者在社会空间中的不同位置。

布迪厄在社会空间这一大坐标场上,以资本总量为指标区分垂直的社会阶层差异。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总和构成了资本总量,其中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最为重要。“各阶层(class)以及同一阶层内的各部分(fraction),从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都最为丰富的阶层到两者都最为贫乏的阶层作出划分。居于最上层的是专业人员(professions),他们拥有高的收入和高的学历,出身于统治阶层(dominant class)的家庭(专业人员或高级管理人员),能够享受和消费大量的物质及文化产品。处于中间的是办公室雇员,他们学历较低,通常来自于工人阶层(working class)或中等阶层(middle class)的家庭。在最底端的是各种水平的体力劳动者和农民,他们收入最低,没有学历,几乎都出身于工农阶层家庭。”^[14]

布迪厄以资本构成结构区分在水平坐标上社会成员的阶层差异。比如统治阶层内部,艺术生产者和大学教授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本,但其经济资本较少,是统治阶层中的被统治者;而工商业资本家拥有丰富的经济资本,而文化资本相对较少。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不平均分配也是统治阶层内部分化的主要根源。在此基础上,布迪厄描绘出一个由“首要对立”与“次要对立”共同建构出的趣味社会阶层空间图^[14]。

布迪厄的资本与社会空间理论为现有的性别结构、性别阶层分析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在《男权统治》一书中,布迪厄提出男性的统治与女性的附属地位关系存在于所有的社会空间、次

空间中,即存在于私领域的家庭,公领域的学校、劳动力市场以及大众传媒、政治空间中。“即使妇女在公共职务中所占比例真的越来越高,留给她们的也总是最低级和最不稳定的位置。有一个事实无疑是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上所处地位不确定的最佳证明,即如果其他情况都一样的话,她们得到的报酬总是比男人少。虽然她们持有同男性一样的文凭,得到的职位却比男人低,尤其是从比例上看,她们受事业和工作不稳定的影响最大,且最容易被打发到兼职工作中去——这尤其会使她们几乎必然被排除出权力活动和升迁的通道。”^[15]¹⁵⁰在社会现实中形成了公共空间尤其是生产领域的经济中男性的绝对统治权;而女性则在诸如家庭、生育等私人空间中拥有着象征性的权力的局面。这是布迪厄对于性别权力秩序的现实刻画。然而这种社会秩序是如何形成和发挥作用的呢?布迪厄认为,性别区分结构除了体现在性别化或强或弱的学科、职务和职位中之外,还通过女人甚至她们周围的人在在选择中使用的三个实践原则起作用:第一,适合女人的只能属于家庭职能的延伸部分:教育、护理、服务;第二,女人不能对男人行使权力,即使其他情况都一样,男人也可能比女人更容易登上权位,而女人只能居于次要的辅助位置;第三,赋予男人操纵技术用具和机器的垄断权。

这种原则是被统治的女性和统治的男性共同默许的,其以不易觉察的方式产生作用。布迪厄称这种作用为象征暴力。“更令人奇怪的是,法定的秩序,连同它的统治关系,它的权利和破格优待,它的特权和不公正,除了几个历史事件之外,能够如此轻易地永久延续下去,而最无法忍受的生存条件可能常常以可接受的甚至是自然而然的现象出现。此种服从是我称之为象征的暴力即温柔的、受害者本身不易察觉的、看不见的暴力的结果。”^[16]J. Morris 将这种象征性、持续作用且不易觉察的暴力称为女性的习得性无助^[17],布迪厄称颠倒的或否定的皮格马利翁效应持续、过早作用于女性身上,最终形成了几乎难以觉察的象征暴力。

社会空间中以性别区分的结构生产和再生

产的固有模式以象征暴力发挥历史超验性作用,成为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准则而被普遍认同。男性在社会结构、生产和再生产活动中得到普遍认可的优先权。另外,男性的优先权还体现为习性固有的模式,这些模式被客观接受,是所有社会成员认知、行为和思想的模式,因此以历史超验性发挥作用。男权统治被视为一种常识的客观性,女性因此接受和模式化这一客观性以及由此形成的权力关系,可以说,女性自身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制造”了象征暴力^{[16]46}。

社会性别理论认为,女性的性别特征同阶层、种族等不同要素融合起来,使得女性问题呈现出复杂且层次多样的特点。布迪厄的区隔理论为社会性别分析提供了资本及社会空间分析的一整套工具,依据男性及女性的资本及位置能够构建一个社会性别空间位置区隔图,以社会现实经验和更细致入里的方式探索女性地位的状况及其权力结构。而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结构构成同阶层的社会空间位置,形成具有结构同源性的特征,即形成遵循同样等级序列的差异。因此,运用布迪厄的区隔理论,以资本为标尺既能够区分男性和女性的分层等级差异,形成高低左右不同的性别秩序,同时也能够融合种族、宗教等其他因素细化女性群体内部的差异。这些现有的性别秩序及阶层差异通过象征暴力以历史超验性在全部社会空间中发挥作用。

五、形成社会性别理论新秩序的可能路径

妇女运动的几次浪潮历史性地揭示了男性与女性权力秩序现状的改变,不应将女性和男性对立起来,或者有激进女权主义一样以极端仇视男性的态度。事实上,在雄性气质过度渲染和张扬的西方世界,男性往往也是受害者。正如布迪厄所阐述的,在长期自我贬低、自我否定的社会化作用下,女性习得了服从、克制和失语等消极道德,男性则成为了男权统治表象下的囚徒和隐形的受害者。“男性特权也是一个陷阱,而且它是以长久的压力和紧张换来的^{[15]71-73}”。

要改变现有的性别秩序,需要从性别秩序生产和再生产的机构机制中去努力。布迪厄认为,性别秩序或者男性统治秩序的再生产活动,主要

是由三个机构完成的,这三个机构是家庭、教会和学校。“如果家庭单位是男性统治以最不可辩驳和最显而易见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一个地点的话,那么在家庭中起作用的物质和象征力量关系的永久化原则,则基本上处于这个单位之外,存在于诸如教会、学校或国家机构以及它们特有的公开或隐秘的、官方或非官方的政治活动之中。”^{[15]67} 同时在考察性别分工再生产的制度因素时,布迪厄认为需要考虑到国家的作用,“国家通过父权制的规定和禁令来认可和加强私人父权制的规定和禁令,公共父权制被纳入所有负责管理和调节家庭单位的日常生活的机制中。”^{[15]168}

不仅如此,布迪厄启示,社会性别理论政治行动需要从社会空间结构和权力的再生产机制去消解男性统治,而消解途径则需从国家、学校着手。“政治行动只有真正考虑到所有的统治作用,才会在长时期内借助不同的机制或相关的制度所固有的冲突,促进男性统治的逐渐消亡。因为所有的统治作用都是通过(无论在男人身上还是在女人身上)被归并的结构与重大制度的结构之间的客观同谋实现的,不仅男性秩序,甚至整个社会秩序都是在这些重大制度中实现和再生产的。”^{[15]171-172}

布迪厄的社会理论既能够为社会性别理论批判提供清晰的结构方向,同时也能够搭建宏观社会层面与微观生活层面的桥梁,其理论具有较强的渗透性和伸缩性,能够解释宏观问题、中观问题以及微观现象:不仅可以解释男性和女性性别秩序问题,也可以细化女性群体内部的差异。社会性别理论研究可以在布迪厄社会阶层与品味理论的启示下,通过经验研究构建男性与女性品味区隔图景。同时,分析象征暴力如何在性别秩序、性别区隔中发挥作用。社会性别理论运动只有从制度性结构着手,分解权力机制生产和再生产的结构作用机制,才能够消解男性统治。在男性统治秩序下,男性和女性同样是受害者。因此,当前的社会性别理论批判在借鉴布迪厄理论的基础上,有可能消解传统的性别二元对立的局面,走出传统男性与女性对立或男性与

女性无差异的理论歧途,从社会空间结构和社会制度作用方向着手,从国家—权力机制和学校—权力再生产机制等方面去分析。这是布迪

厄社会理论的重大启示意义。布迪厄社会理论为社会性别理论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范式,值得社会性别理论研究者进一步探索和挖掘。

[参考文献]

- [1] 叶文振. 女性学导论[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45-47.
- [2] 柏棣. 性的政治:谈“社会性别”概念的不确定性[J].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3(5):1-6.
- [3] 秦美珠. 社会性别与发展的形成、特征及思考[J]. 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10(5):1-5.
- [4] 王政. 社会性别研究在国内外的的发展[J]. 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09(5):1-7.
- [5] 刘伯红. 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概念和特点[J]. 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09(6):1-8.
- [6] PIERRE BOURDIEU. Domination masculine[M].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 [7] 西蒙·波伏娃. 第二性[M]. 郑克鲁,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 [8] 贝蒂·弗里丹. 女性的奥秘[M]. 程锡麟,等,译. 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5.
- [9] 凯特·米利特. 性别政治[M]. 宋文伟,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 [10] 露丝·里特斯. 公民身份:女性主义理论的视角[M]. 夏宏,译. 长春:吉林出版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
- [11] LEE, CHING KWAN. Engendering the worlds of labor: women workers, labor markets, and production politics in the south China economic miracle[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5:378-397
- [12] TORIL MOI. Appropriating bourdieu: Feminist theory and Pierre Bourdieu's sociology of culture new literary history[J]. The common wealth center for literary and cultural change, 1991, 22, (4): 1017-1049.
- [13] JANET WOLEF. 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art[J]. Social forces, 1981, 62(4): 141.
- [14] PIERRE BOURDIEU. Social space and symbolic space[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627-638.
- [15] (法)皮埃尔·布迪厄. 男性统治[M]. 刘晖,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114.
- [16] PIERRE BOURDIEU.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M]. London, Amsterdam: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 1983: 312-356.
- [17] J. MORRIS. Conundrum[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4: 165-166.

Classic Reread: Pierre Bourdieu's “*Distinction*” Illuminates Gender Study

WEI Dan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1, China)

Abstract: Pierre Bourdieu's book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provides clear direction for feminist critiques from the generative mechanism of power structure in the social space or field. The theory of social space can be used for analyzing the macroscopic structure and the microcosmic normal life. The different taste and distinction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were due to different capital structure and the different power relation. This power relation functions in the form of symbolic violence on the history of transcendence. Pierre Bourdieu enlightens feminist study the structure of space and institution.

Key words: gender; Pierre Bourdieu; social space; distinction

(责任编辑 鲁玉玲)

· 性别平等理论研究 ·

蔡特金的妇女解放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冯子珈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100872)

摘要: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妇女解放问题是无法忽略的一个话题。克拉拉·蔡特金作为国际妇女运动的发起者和著名领袖,站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结合国际妇女运动实际,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观点和方法阐述了其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观点,论证了妇女解放的条件、行动纲领和途径,形成了系统且逻辑清晰的妇女解放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蔡特金妇女解放思想的价值从未终止于历史,其对于推进我国新时代妇女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关键词:蔡特金;妇女解放思想;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9)05-0014-07

克拉拉·蔡特金是国际妇女运动的发起者、无产阶级教育理论的精辟阐述者、俄国苏维埃政权的热情拥护者、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维护者和倡导者以及反对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不屈战士。尽管蔡特金的一生充当过许多角色,但唯有无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的领袖是其终极定位。她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捍卫者,在汲取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妇女解放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对妇女解放较为系统的认识。

一、系统论证妇女解放的条件

(一)妇女解放的经济条件

妇女实现经济上的平等和独立是妇女解放的首要条件,有利于促进其他方面的解放。妇女解放的经济条件具体来讲即私有制的消亡和公有制的确立,以及妇女能够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和实现家务劳动的社会化。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伴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家庭内部分工更加明显,生产资料和生活资

料都被男性所占有,妇女被排除在了社会生产之外,成为男性的附庸。这表明,妇女脱离社会生产是其经济地位低下的直接原因。因此,妇女的解放,首先其在参加社会生产劳动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即“妇女解放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妇女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1]。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妇女解放经济条件的论述对蔡特金产生了巨大影响。蔡特金在侨居巴黎期间,读过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之后,摆脱了那种实现形式上男女平等的思想的束缚,深刻地认识到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和奴役真正来自于私有制。在她看来,长久以来妇女不平等地位的根源蕴含在财产关系当中,无产阶级妇女的解放之路从根本上只能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妇女和男工一样,才能享受到她们的充分权利。”^[2]¹⁵⁷共产国际成立之后,蔡特金更是着重提出了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总目标,即消灭私有制和资本主

收稿日期:2019-07-07

作者简介:冯子珈,女,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

义,建立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可见,蔡特金在这个问题上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推翻私有制、实现妇女解放的思想,使这一思想在指导劳动妇女具体斗争实践的过程中更加充实起来。在蔡特金看来,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必须具备的两个主要条件除了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外,另一个就是必须将妇女的活动纳入社会生产过程。蔡特金指出,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对于实现社会财富增长是有必要的,“妇女劳动本身的问题不是由于同男劳动力竞争而降低了工资,而是它受资本家的剥削。”^{[2]152} 在论述了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劳动的必要性后,蔡特金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方式变革的角度论述了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劳动的必然性。她指出,一方面,资本主义大工业改变了以往的生产方式,大大促进了家庭生产,从而使妇女生产家庭用品的劳动成为多余,摆脱了家务劳动对妇女的束缚;另一方面,机器大生产减轻了体力的消耗和沉重的劳动,这就为妇女参加劳动生产提供了条件。妇女参加工业生产后,在经济上不再依附男人,而是和男人平等了,他们都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甚至价格本来低廉的妇女劳动力还会被资本家用来降低男工的工资。“因此不存在男工和女工之间利益的真正对立,但是在资本和劳动的利益之间却真正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2]155} 正是基于以上分析,蔡特金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即“妇女的解放同全人类的解放一样,最终必将是劳动从资本中解放出来的事业”^{[2]157}。这个结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一个重要创新。

(二) 妇女解放的政治条件

第二国际成立以后,针对欧洲一些国家宪法把广大工人、劳动人民和妇女排除在选举之外的现实情况,国际工人运动把重心放在了争取普选权的斗争上,但却并没有将争得妇女的选举权纳入到运动中。于是,蔡特金强烈要求各国社会民主党能够重视妇女选举权问题。在第二国际斯图加特大会上,蔡特金系统阐述了她的有关妇女选举权的观点:首先,关于妇女争取选举权的意义,蔡特金认为,“无产阶级迫切需要为妇女获得充

分权而斗争,女性在政治上的平等地位符合无产阶级的切身利益。这种斗争能够唤醒妇女群众,帮助她们提高阶级觉悟”^[3]。其次,关于妇女争取选举权的目的,蔡特金认为选举权是妇女获得经济独立的必要政治补充,受阶级斗争的影响,不同阶层妇女争取选举权的目的不同,作为无产阶级妇女,只有不分性别地同一切剥削者进行斗争才有可能争得选举权,要将获得妇女选举权作为实现最终目的所要达到的一个阶段,而这个最终目的必将是参加无产阶级斗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再次,蔡特金提出了争取什么样的妇女选举权才是社会党应该为之斗争的问题,她反对一切有限制的妇女选举权,强调社会党必须只能为实现妇女普选权而斗争。蔡特金的报告经大会讨论后通过了,意味着争得妇女选举权将列入国际工人运动的行动纲领中,成为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一个奋斗目标。

在这之后,蔡特金于1910年召开第二次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就无产阶级妇女如何争取选举权的问题进行讨论,最终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争取妇女选举权基本原则的决议案》,规定了妇女争取选举权的具体行动原则和要求,并以此设立了国际妇女节。这样看来,蔡特金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妇女选举权问题的原则基础上,不仅在理论上,还在实践中进一步系统地阐述了无产阶级妇女享有平等选举权的思想,将此作为无产阶级妇女解放的政治条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妇女解放理论。

除了妇女的选举权之外,妇女享有平等的其他政治权利也是妇女解放的条件,只不过蔡特金并没有对此着重进行论述。

(三) 妇女解放的文化条件

妇女的文化解放也可以说是妇女解放的一个重要内容,妇女在文化方面的解放以政治解放和经济解放为前提和基础,同时,文化的解放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政治和经济的解放产生影响。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妇女的受教育权被剥夺,在教育的问题上一直处于被歧视的地位。对此,蔡特金强调妇女接受平等的文化教育权利的重要性,她认为妇女的解放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

其与男子享有平等文化权利的方面,但却不仅仅局限于这一方面。她特别指出,无产阶级妇女要同本阶级的男子一样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权、教育权和自由就业的权利,提出妇女应该平等地进入到教育生活当中,平等地参加学校教学和管理的相关工作,甚至有有能力者也可担任最高的教学与行政职务。同时,妇女也要在青少年的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使我们的后代也受我们的影响,力争成为无产阶级的有生力量。妇女的受教育程度是衡量妇女社会地位的重要尺度,平等的教育权有助于让妇女获得更多展示自我个性、发展自己能力的机会。虽然蔡特金并没有大篇幅地论述妇女平等的受教育权和教育权思想,但纵观其整个妇女解放思想,妇女的教育解放也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实现妇女解放的重要条件,同时她的论述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个延伸与创新。

(四) 妇女解放的其他社会条件

除了经济、政治、文化条件外,在蔡特金看来,妇女的解放也依赖于其他的一些社会条件,主要表现在传统思想束缚的破除以及妇女享有平等的社会参与权利和社会管理权利等方面。

妇女想要获得解放,就必须打破男尊女卑思想的束缚,挣脱这些传统观念的枷锁,这就需要在全社会营造保护妇女权益的大环境,宣传进步的性别文化,倡导两性和谐发展,使得男女平等的观念深入到每一位社会成员心中。不从思想上消除对妇女固有的偏见和歧视,妇女解放也就无从谈起。另外妇女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全面参与社会建设,享有社会生活平等的参与权,也是妇女解放所应具备的条件。妇女应和男性一样参加对社会事务的管理,在参与管理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社会角色的重新定位和社会地位的提升对于妇女解放来讲十分重要。

二、科学阐述妇女解放的行动纲领

蔡特金妇女解放思想的其中一个亮点在于她结合当时国际共产主义妇女解放运动的实际,为其制定了行动纲领,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进一步延伸。

(一) 妇女解放是共产主义奋斗目标的重要

内容

第二国际从它诞生之初,就高举为实现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而奋斗的旗帜,但它却存在理论与实践、决议与行动相脱节的问题,导致它最后放弃了共产主义原则和目标。共产国际则非仅仅是决议的生产者,它还要继续第二国际所背叛的事业。因此共产主义妇女运动想要更好地开展,就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提高妇女自身的觉悟,加入到共产国际中,加入到为共产主义事业斗争的无产阶级队伍中,加入到统一的革命组织中。共产主义妇女解放的伟大目标,只有通过被压迫和被剥削的男女不分性别地共同反对有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才能实现。若没有信念坚定的劳动妇女群众的参加,无产阶级不可能取得革命胜利。实现共产主义事业,也应当成为信念坚定的妇女无产者的事业。妇女解放的实现是以共产主义目标的实现为前提的,只有实现了共产主义,才能真正实现妇女解放。

(二) 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是国际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任务

在反战的问题上,蔡特金主张广大劳动妇女要勇敢地站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无产阶级妇女要站在跟资产阶级妇女不同的立场上。罪恶的帝国主义战争所带来的后果,大大加深了大多数妇女的贫困、操劳和负担,由于长时间饥饿,加上在生产 and 家务方面过度劳累,战争带来的灾难让她们达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其健康状况不断地恶化。帝国主义战争造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崩溃和危机,它们只能够随着资本主义的灭亡而消失。在1912年巴塞尔举行的第二国际非常代表大会上,蔡特金作为国际妇女书记处书记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演说,她揭露了帝国主义战争罪恶的本质,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无产阶级妇女所肩负的反帝国主义战争的伟大使命。她指出无产阶级妇女要教育自己的儿子不能为了资本主义利益而兄弟间相互厮杀,同时要教育他们坚定为无产阶级伟大事业奋斗的决心。蔡特金的演说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她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同争取社会主义相联系,认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无产阶级要消

灭战争的根源——资本主义制度。蔡特金还将社会主义要取得胜利,必须联合无产阶级妇女这个论断具体化,指出无产阶级要取得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战争的胜利,必须联合广大劳动妇女。争取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是国际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任务。

三、深刻揭示妇女解放的途径

(一)把妇女解放运动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如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所写的:“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4]马克思、恩格斯从妇女解放关系整个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高度出发,将妇女解放纳入到无产阶级解放的伟大事业中,认为无产阶级的解放离不开妇女的解放。马克思、恩格斯对妇女解放运动和整个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考察以及对二者关系的论证,对蔡特金产生了很大的启发。蔡特金在《关于妇女鼓动工作》的报告中指出,要想获得解放,只有不分民族、职业和性别地团结起来,要将广大妇女吸纳到其斗争队伍当中。之后,在《在阶级斗争的影响下》中,蔡特金进一步指出,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激烈的斗争形势下,广大妇女的觉悟日渐提高,逐步成为反对资产阶级、争取全人类解放和自身解放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除了撰文论证这一思想外,蔡特金还走到妇女群众中发表演讲,鼓动广大劳动妇女积极参与到无产阶级的革命中来。可以看出,蔡特金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将妇女解放同无产阶级解放联系起来的重要思想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侧重于阐述吸收广大妇女参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将妇女解放运动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侧重于加强妇女的鼓动工作,充分发挥妇女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妇女的解放之路从根本上只能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

(二)教育和组织妇女积极投身于自身解放

运动

蔡特金认为,将妇女解放运动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从整个阶级的阶级使命出发探索出的实现妇女解放的道路。从男女平等出发,从劳动妇女的解放出发,要教育和组织广大妇女积极投身于自身的解放运动。无产阶级政党要致力于帮助唤醒本阶级劳动妇女的主体意识和自我意识,推动无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从自发上升到自觉。

一方面,要占领舆论阵地,利用报刊等媒介以及演说报告等形式宣传革命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激发广大劳动妇女的阶级觉悟,引导妇女解放运动向深层次发展。蔡特金将《平等报》作为教育、鼓动、引导广大劳动妇女参加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宣传工具和领导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重要阵地。在《平等报》创立伊始,蔡特金就明确指出,《平等报》的定位是无产阶级性质的,面向先进的无产者,通过教育和启发劳动妇女成为目标明确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核心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主要任务之一是要保护劳动妇女不受资产阶级女权思想的侵蚀。同时,蔡特金认为,《平等报》也是反对修正主义、反对战争和军国主义的重要武器。在《平等报》之后,蔡特金还担任过《莱比锡人民报》的妇女副刊编辑、德国共产党妇女刊物《女共产党人》以及共产国际妇女书记处机关刊物《共产主义妇女月刊》的主编。此外,作报告和进行演说也是蔡特金进行革命宣传、开展妇女教育和鼓动的主要手段,以此来传递无产阶级妇女解放的革命原则,唤醒其自我解放意识。

另一方面,需要有成熟的国际妇女组织和领导机构来联系各国无产阶级妇女,团结各国妇女力量,通过制定统一的纲领性文件、统一的革命原则、统一的行动策略,在深入推进无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的同时,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在蔡特金等人的努力下,国际妇女书记处建立了,这意味着无产阶级妇女运动有了一个专门的机构和组织来直接领导。事实也证明,正是因为国际妇女书记处对广大劳动妇女的组织与动员,各国的妇女运动才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

并大大地提高了妇女的政治参与度。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二国际分裂,共产国际作为其对立物成立,蔡特金开始领导共产主义妇女运动,她一再强调建立从属于共产国际或各国共产党的领导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专门机构的极端重要性,勾勒出了一个国际妇女组织和领导机构的大致轮廓,并不断细化具体的组织和领导。

(三)积极开展同资产阶级女权运动和改良主义的斗争

蔡特金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的一个创造性发展体现在她根本区别了妇女阵营中的两大对立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强调无产阶级妇女运动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抵制资产阶级女权运动的影响,反对改良主义倾向。

在无产阶级妇女运动兴起以前,欧洲范围内流行的主要是资产阶级女权运动,它仅仅诉诸于打破性别歧视,实现男女平等,具有浓厚的改良主义色彩。对此蔡特金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妇女运动之间在争取男女平等等一些方面有一致的地方,但是从根本上来讲,无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是革命而非改良的,是要在变革社会制度的基础上实现全面的解放,这一点就与资产阶级女权运动存在本质的区别。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真正保障广大妇女享有一切平等而充分的权利与自由,只能是用表面上的政治平等掩盖实质上的依附关系和剥削关系。针对德国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起草的《女权请愿书》,蔡特金写了《关于女权请愿书》。她指出,请愿书只是一般性地提出妇女要有集会和结社的自由与权利,但却没有强烈要求议会通过实现妇女这些权利的法案的意志。这种单单对集会和结社权利的乞求并不是无产阶级妇女的性格、原则和立场,无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的精神实质在于它是无产阶级运动,因此,即便请愿书与无产阶级妇女的某些要求相符,但是无产阶级妇女也绝不能在请愿书上签字。蔡特金的《关于女权请愿书》在《前进报》上刊登后,得到了恩格斯的高度赞扬和支持。

在无产阶级妇女运动发展进程中,其除了受到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挑战外,还遭到了德国社

会民主党内部改良主义倾向的影响和干扰。蔡特金并不反对和否定改良,认为改良对于争取无产阶级妇女解放和提高妇女觉悟是有益的,但她强调争取改良的必要前提是坚持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夸大改良的作用和意义,更不能用它代替无产阶级革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通过改良所取得的效果是有限的,无法满足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妇女的根本要求。在这方面,蔡特金主要利用舆论阵地对无产阶级妇女进行引导和教育,使广大妇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力求清除党内的错误观点和改良主义倾向。

四、蔡特金妇女解放思想的当代启示

蔡特金关于妇女解放的论述,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蔡特金妇女解放思想的价值从未终止于历史,而是实现了超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妇女工作给予了高度关注。由于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项体制机制都有待进一步完善与健全,仍然存在有碍妇女解放事业发展的因素。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各类文化激荡,西方女性主义思潮风靡,带来了思想的混乱。针对妇女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妇女理论的个别结论没能正确指导实践抑或是走了弯路,有些人就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过时”了。蔡特金妇女解放理论对于我国新时代妇女事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仍然显示出强大的理论阐释力和实践指导力,对顺利开展妇女工作、清除现阶段存在的一系列妇女问题具有现实启示意义。

(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

在蔡特金看来,私有制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私有制的消亡是妇女解放的根本条件,因此,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妇女解放才有可能实现。2013年10月31日,习近平在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指出,我们党“领导我国妇女运动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这是实现妇女平等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平等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平等享有改革发展成果的正确道路。”^[5]这一论断揭

示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的必要意义和重要价值,这既是历史和现实的选择,也是广大中国妇女群众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就是坚持从中国妇女建设事业的实际出发,深刻把握妇女运动发展的基本规律,将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紧密结合起来。在“新时代”的历史语境下,我们更要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具体实际来开展妇女工作,在建设社会主义各项事业中发挥劳动妇女的伟大作用。

(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

蔡特金站在她所处的历史方位,对妇女解放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阐述与总结,实现了对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妇女解放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在当代中国,习近平总书记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妇女工作和妇女事业的发展作了一系列深刻论述,提出了诸多新观点、新论断、新目标、新要求,推动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在当代中国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指导新时代中国妇女事业创新发展的思想武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是中国妇女建设实践和时代的呼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不是封闭、僵化、停滞的,而是开放、创新、发展的,它深刻把握和揭示了立足中国实际的妇女发展的内在规律,表明我国现阶段妇女解放和发展的时代主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最本质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战略目标是实现男女平等;基本路径是推动妇女全面参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赋予了中国妇女运动和妇女事业发展更为丰富的时代内涵和更为鲜明的中国特色。

(三)推进被赋予新时代内涵的男女平等事业发展

“追求男女平等的事业是伟大的。”^[6]习近平在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中谈道:“实现妇女平等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平等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平等享有改革发展成果”^[5],从权利的平等、集会的平等、结果的平等三个层面

丰富了新时代推进男女平等事业的内涵。在蔡特金看来,只有实现妇女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领域的平等,实现妇女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最终目标才有可能实现。上述“三个平等”,可以说是实现妇女自由全面发展的阶段性目标。为了推进新时代男女平等事业,就要进一步切实推进妇女全面参与经济建设,有效提升妇女社会地位;进一步推进妇女全面参与政治建设,积极保障妇女权益;进一步推进妇女全面参与文化建设,引领妇女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进一步推进妇女全面参与社会建设,努力营造和谐包容的社会氛围;进一步推进妇女全面参与生态文明建设,不断优化妇女发展的生态环境。“事实表明,实现男女平等,还需要我们付出巨大努力。我们要不懈努力,为妇女事业发展开辟广阔道路。”^[6]

(四)加强妇女工作和妇联组织建设

蔡特金多次强调无产阶级妇女的解放,需要有成熟的妇女机构组织和领导。在我国,妇联是团结教育广大妇女、维护妇女合法权益、推进妇女解放事业健康发展的组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妇女工作和妇联组织建设,指出:“做好党的妇女工作,关系到团结凝聚占我国人口半数的广大妇女,关系到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强大力量,关系到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5],并就我国妇联的地位作用、当代使命、工作要求、目标任务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充分凸显了中国在进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节点上做好党的妇女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十九大报告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要“推动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发挥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坚定不移跟党走。”^[7]“要通过立体化、多层面的组织体系最广泛地把广大妇女吸引过来、凝聚起来”^[5],不断改善和加强党对妇女和妇联工作的领导,更好地发挥妇联的积极作用,开创妇女工作新局面。

(五)发挥新时代妇女独特作用

蔡特金的妇女解放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肯定了妇女在革命和经济社会各项建设事业中所发挥的作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妇女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高度评价,他在全球妇女峰会上指出:“妇女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没有妇女,就没有人类,就没有社会。”^[6]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指出:“我们要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努力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

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成为人们梦想启航的地方。”^[8]基于此,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发挥妇女在各个方面的积极作用,注重发挥妇女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独特作用,发挥妇女在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树立良好家风方面的独特作用。这并非刻意强化妇女的传统家庭角色,而是充分重视和认可妇女对于家庭生活、家风建设以及社会发展的贡献和力量。他主张两性平等,强调“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支持妇女建功立业、实现人生理想和梦想”^[6]。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85.
- [2]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编辑委员会. 第二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 [3]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3卷[Z].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162.
- [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80.
- [5] 习近平. 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 发挥我国妇女伟大作用[N]. 人民日报,2013-11-01.
- [6] 习近平. 促进妇女全面发展 共建共享美好世界——在全球妇女峰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09-28.
- [7]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69.
- [8] 习近平. 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家庭文明建设 推动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N]. 人民日报,2016-12-13.

Zetkin's Thoughts of Women's Emancipation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FENG Zi-jia

(Renmin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history, women's emancipation is a topic that can not be ignored. As the initiator and famous leader of international women's movement, combining Marx's class standpoint and international women's movement, Klara Zetkin elaborates views on women's emancipation with Marxist basic principles, viewpoints and methods, demonstrates the conditions of women's emancipation, the program of action for women's emancipation and the paths of women's emancipation, the systematic, helps to shape logical and clear thoughts of women's emancipation, finally enriches and developed the theory of Marx's women's liberation. The value of Zetkin's thoughts of women's emancipation never ends in history.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s cause in the new era of our country.

Key words: Klara Zetkin; women's emancipation;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责任编辑 鲁玉玲)

中外女性参政研究视点与发展

——基于文献计量的分析

黄君洁, 王静雯

(厦门大学,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女性是政治民主化中不容忽视的行动者。基于 Web of Science 与中国知网(CNKI)系统,以国外 674 篇期刊文献和国内 342 篇期刊文献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计量方法对比国内外女性参政的研究现状,利用共词分析手段绘制国内女性参政研究主题知识图谱,挖掘出女性参政研究的六大主题:女性参政整体性研究、女性参政实践、农村妇女参政、女性干部、女性参政制度与政策、女性参政运动。这些主题从多学科视角出发,以女性或其内部群体为研究对象开展女性参政的动因研究,构建女性参政理论体系,是未来研究所需关注的。

关键词:女性参政;女性政治参与;文献计量;共词分析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9)05-0021-15

一、引言

在民主社会,女性参政被视为女性权利的一部分,妇女参与政治经济活动的程度与水平不仅是保障和衡量女性政治权利、社会地位的重要内容,也是体现女性生存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而且,女性参政形成了一种倾向于非暴力、对话、合作、协商与和平的价值取向,其更是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表现之一,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尺度,符合政治环境与社会现实发展的需要。女性参政的具体内涵包括参与、代表和领导三个相互联系又各有区别的概念。现阶段虽然女性的政治权利得到逐步解放,但政治领域内的性别分层现象仍然十分明显^[1],呈现“三高三低”

的状态:副职多、正职少;虚职多,实职少;职务低的多,职务高的少。从学理、现实两方面探索破除女性参政障碍的路径正是诸多研究的出发点。

在对中国女性参政研究的述评中,李宁等从政治动因和理论基础两方面探讨国内女性参政问题^[2];杜美玲认为我国女性参政研究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1995年的“初始兴起期”、1995年至2000年的“阶段高峰期”以及新世纪以来的“蓬勃发展期”,并分述了各阶段成果及未来研究重点^[3]。近年来,女性参政研究仍在持续进行中,状况亦有所不同。目前国内女性参政研究缺乏文献的更新、系统性的梳理,对现有研究状况未能有全面的把握,先前论述文章并

收稿日期:2019-07-23

基金项目:2018年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体育精准扶贫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应用”(项目编号:FJ2018B104);2017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科类)项目“财政分权、地方官员个人特征与环境治理”(项目编号:20720171013);2017年福建省中青年教育科研(社科类)项目面上项目“地方官员个人特征及其公共支出偏好选择——以福建省环境治理支出为例”(项目编号:JAS170010);厦门大学繁荣哲学社会科学项目

作者简介:黄君洁,女,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公共经济学研究;王静雯,女,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公共管理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行政管理研究。

未涉及国外同主题研究,对于世界范围内的研究也缺乏足够了解。因此,对于国内女性参政研究而言,厘清研究现状、把握研究发展脉络与方向的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为了推进女性参政研究的发展,本文借助文献计量分析方法首次对国内外女性参政研究的发展脉络和研究特征进行系统梳理,利用共词分析方法厘清国内外女性参政领域的关注点,从对比、量化、定性综合的角度为推进我国的女性参政研究寻找可供借鉴的经验与发展方向。本研究使用的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该领域的文献研究中也是一次有益尝试。

本文旨在全面呈现女性参政研究现状,为进一步推进我国女性参政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建议。主要研究贡献在于,第一,基于 Web of Science 文献检索结果,从发文时间、学术期刊、研究主题与方法、研究机构与作者等方面对国外近 40 年来女性参政研究的状况进行回顾分析。第二,基于国内外女性参政文献(国外 674 篇,国内 342 篇),比较二者在研究氛围(发展趋势、学术期刊)与研究实践(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主题、研究学者、研究机构)上的异同。第三,对国内女性参政研究内容进行共词分析,绘制出国内女性参政研究知识图谱,挖掘研究中的热点主题与研究趋势。

二、国外女性参政研究

笔者在 Web of Science 上对国外女性参政研究期刊进行了收集,手工筛选整理了 1981—2017 年发表在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上的 674 篇相关文章^①。同时,对国外女性参政研究从发文时间、发文期刊、国家与地区、作者、研究机构和研究方法与主题方面,进行了量化分析,得出了国外女性参政研究的总体情况。

(一)时间跨度变化

从图 1 中可以发现,国外女性参政研究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出现,之后在波动中不断增长。

近些年相关研究达到了历史以来的最高峰。但从现有可获取的文献来看,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甚至至今,女性参政研究并未受到学界的重视。总体而言,国外女性参政研究呈现一种不断增长的大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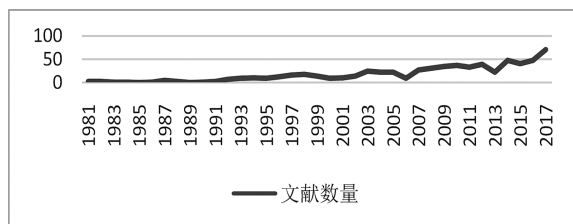


图 1 国外女性参政研究历年发表的文献数量 (1981—2017 年)

资料来源:根据 Web of Science 文献数据整理,文献总数为 674 篇^②。

(二)期刊发文

国外女性参政研究论文总共来自 260 种期刊,表 1 列出了刊发女性参政研究最多的前 10 种期刊。从这些期刊的刊发文章数量来看,女性参政文章发表的出版物较为分散;第一名(或第二名)期刊刊文总量仅为 17 篇,占总文献量的 2.52%;这些出版物的发文总量为 131 篇,仅占总文献量的 19.43%。

另外可以发现,虽然 10 个出版物中有 4 个出版物是专门以女性研究为主题的(*Journal of Women Politics Policy*、*Women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Women Politics*、*Asi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但这些刊物的影响因子是其中较低的,均在 0.3~0.6 之间。从表 1 中可以看出,期刊的影响因子大于 1.00 的刊物仅有 3 种(*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World Development*),共有 33 篇,占比并不高。由此可以看出,女性参政作为一个研究主题还未形成一系列具备影响力的主题出版。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女性参政研究仍然是一个较为新兴的研究主题。

① 检索条件:“主题”为“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or “Wome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数据库为“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最终检索时间为 2018 年 7 月 21 日。

② 图 1~2、表 1~6 的数据均来源于此。

表1 国外刊发女性参政研究文献最多期刊(前10)

序号	期刊名称	影响因子	文献数量(篇)	文献占比
1	<i>Journal of Women Politics Policy</i> 《女性、政治与政策》	0.367	17	2.52%
2	<i>Women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i> 《妇女研究国际论坛》	0.591	17	2.52%
3	<i>Women Politics</i> 《女性政治》	-	16	2.37%
4	<i>Asi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i> 《亚洲妇女研究杂志》	0.321	14	2.07%
5	<i>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i> 《政治研究季刊》	1.116	13	1.92%
6	<i>Politics Gender</i> 《政治性别》	-	13	1.92%
7	<i>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i> 《美国政治评论》	3.316	11	1.63%
8	<i>Social Politics</i> 《社会政治》	0.909	11	1.63%
9	<i>Social Science Quarterly</i> 《社会科学季刊》	0.849	10	1.48%
10	<i>World Development</i> 《世界发展》	3.166	9	1.33%

(三)国家与地区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女性参政文献来源地分布在68个国家与地区,表2列出了发文量位居前10的国家与地区。其中发达国家与地区占据主导地位,在发文量排在前10的国家中只有印度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美国的文献数量

位居首位,发文量为292篇,占到总文献量的43.32%,许多较为高质量、高产的研究机构都来自美国。紧随其后的有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女性参政研究遍布亚、欧、美、大洋洲。由此可以看出,该研究主题已经受到世界范围内学者的关注,但更为西方发达国家所关注。

表2 国外女性参政研究文献最多的国家或地区(前10)

序号	国别(地区)	文献数量(篇)	文献占比
1	USA 美国	292	43.32%
2	England 英国	77	11.42%
3	Canada 加拿大	53	7.86%
4	Australia 澳大利亚	40	5.93%
5	Sweden 瑞典	21	3.11%
6	Germany 德国	18	2.67%
7	Netherlands 新西兰	14	2.07%
8	India 印度	12	1.78%
9	Italy 意大利	12	1.78%
10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中国	12	1.78%

(四)学科属性

从学科属性来看,女性参政研究所涉及的相关学科内涵丰富,主要集中在政治学及女性研究学方面,两类文献量占到文献总量的50%以上。但不可否认的是,女性参政研究仍然涉及社会学、区域研究学、发展规划学、经济学、地理学、国际关系

学等诸多学科,值得关注的是,其中还涉及跨学科社会科学。由此可以看出,女性参政不仅受到了政治学和女性研究学领域学者的关注,还受到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关注,其在不同社会、经济发展中有着其研究价值。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等都有助于这一研究主题的成熟与发展(见表3)。

表3 国外女性参政研究的学科属性分布(前10)

序号	学科类别	文献数量(篇)	文献占比
1	Political Science 政治学	247	36.64%
2	Women's Studies 女性研究学	162	20.03%
3	Sociology 社会学	93	13.79%
4	Area Studies 区域研究学	53	7.86%
5	Planning Development 发展规划学	39	5.78%
6	Economics 经济学	26	3.85%
7	Social Sciences Interdisciplinary 跨学科社会科学	26	3.85%
8	Public Environmental Occupational Health 公共环境职业卫生学	23	3.41%
9	Geography 地理学	22	3.26%
10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国际关系学	21	3.11%

(五)研究作者

量产较高的国外女性参政研究作者多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新西兰(见表4)。国外女性参政研究以团队合作的方式居多,跨校合作十分常见,甚至有许多跨国的合作研究。在这10位学者中就存在着诸多的合作关系,跨国典型如新西兰学

者 Coffe H 与美国学者 Bolzendahl. C 有4篇合作文章;国内跨校合作如 Paxton. P 与 Kunovich. S、Burns. N、Schlozman. KL 等,都有着稳定的合作研究关系。另外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在列表中女性研究者占据多数,其中仅有加拿大学者 Stockem. ER. D 和美国学者 Thomas. JL 为男性。

表4 国外发表女性参政研究作者(前10)

序号	作者姓名(国籍)	作者性别	文献数量(篇)	文献占比
1	Coffe H 新西兰	女	8	1.18%
2	Bolzendahl. C 美国	女	6	0.89%
3	Paxton. P 美国	女	5	0.74%
4	Schlozman. KL 美国	女	5	0.74%
5	Stockem. ER. D 加拿大	男	5	0.74%
6	Burns. N 美国	女	4	0.59%
7	Duncan. LE 美国	女	4	0.59%
8	Kunovich. S 美国	女	4	0.59%
9	Stolle. D 加拿大	女	4	0.59%
10	Thomas. JL 美国	男	4	0.59%

(六)研究机构

表5总结了文献量排在前10的研究机构。研究机构的发文量能够对文献来源的地区分布进行相互印证,这10所研究机构中有8所都来自美国,1所来自英国,1所来自澳大利亚。这些研究机构多有着较为可观的研究实力,其中不乏国

际知名高校,如哈佛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等。说明女性参政研究这一主题已经受到权威研究机构的关注。此外,这些研究所的发文量144篇,仅占到总文献量的21.36%,说明国外女性参政研究与其出版物一样,并未集中在少数研究机构。

表5 国外发表女性参政研究文章的研究机构(前10)

序号	学科类别	文献数量(篇)	文献占比
1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ystem 加利福尼亚大学(美国)	36	5.34%
2	University of Michigan 密歇根大学(美国)	30	4.45%
3	University of London 伦敦大学(英国)	14	2.07%
4	Harvard University 哈佛大学(美国)	13	1.92%
5	University of North California 北加利福尼亚大学(美国)	10	1.48%
6	Ohio State University 俄亥俄州立大学(美国)	9	1.33%
7	Rutgers State University New Brunswick 罗格斯大学(美国)	9	1.33%
8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美国)	8	1.18%
9	Pennsylvania Common Wealth System of Higher Education, PCSHE 宾夕法尼亚高等教育系统(美国)	8	1.18%
10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澳大利亚)	7	1.03%

(七)研究方法

笔者对国外女性参政文献的研究方法进行了人工统计,结果如图2显示。实证研究是国外女性参政研究的主流,占比高达51.19%(345篇),并且随着时间增长呈现逐步增多的趋势;定性研究类的文章占38.72%(261篇)。值得关注的是,国外实证研究更倾向于利用官方数据或相关组织的公开数据进行研究,在更大的样本量基础上体现寻找更具普遍意义上规律的意图;运用问卷收集数据进行此类研究在早期出现的较多。此外,在涉及政治心理、认知观念的研究中则采用了实验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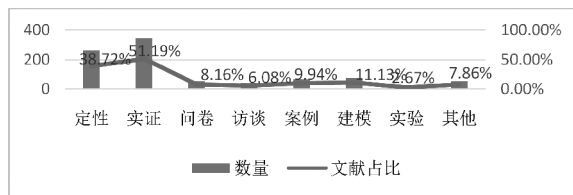


图2 国外女性参政研究方法

(八)研究主题

本研究对所选取的国外女性参政期刊进行了高频词提取^①,虽然国外针对女性参政研究文章的关键词较为分散,但从表6列出的前10个关键词,还是可以观察出其研究的落脚点。除了

“女性政治参与”之外,女性主义、政治文化、性别平等、政治党派等一类关键词出现在其行列。此外,地方政府也出现在了研究者的视野中,许多对于女性参政的案例研究都落脚于基层或者地方政府层面。

表6 国外女性参政研究的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频数
1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政治参与	5
2	Women 女性	5
3	Social movements 社会运动	4
4	Feminism 女性主义	3
5	Development 发展	3
6	Political parties 政治党派	3
7	Gender 性别	3
8	Participation 参与	2
9	Political culture 政治文化	2
10	Local government 地方政府	2

三、国内女性参政研究

针对国内女性参政研究,本文对中国知网(CNKI)上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选取,手工筛选整理了1992—2018年发表在国内核心期刊、SCI、

^① 本研究运用中国医科大学医学信息系开发的“书目共词分析系统”,对样本期刊进行高频词提取。

CSSCI 上的 342 篇相关文章^①。对国内女性参政研究从发文时间、发文期刊、作者、研究机构、研究方法与主题等方面,进行了量化分析,得出了国内女性参政研究的基本概况。

(一)时间跨度变化

国内女性参政研究文献总量不多。从图 3 中可以发现,对女性参政的关注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出现,文献量在 1995 年达到了首次高峰,此后陆续历经几个小高峰,并且在 2010 年(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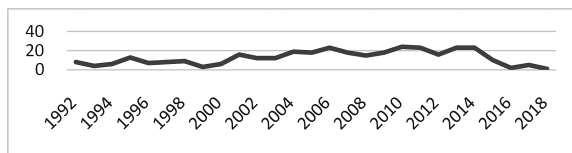


图 3 国内女性参政研究历年发表的文献数量 (1992—2018 年)

资料来源:根据 CNKI 文献数据整理,文献总数为 342 篇^②。

篇)的高峰后,文献高峰量保持在较为一致的水平,但在 2015 年后的文献量有了大幅度下降(去除 2018 年的案例),总体呈现出在波动中前进的状态。这样并不稳定的文献量趋势图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研究主题的新生性。

(二)期刊发文

表 7 列出了国内刊发女性参政研究最多的前 10 名期刊。总体来看,国内女性参政研究文章总共来自 150 个出版物,前 10 名出版物的发献量为 117 篇,占总文献量的 34.21%,发量并不十分集中。可以发现,其中文献量较为集中地出现在一个期刊——《妇女研究论丛》中。从出版物质量来看,前 10 名期刊中有 4 种属于 CSSCI 来源期刊。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国内女性参政研究仍然在起步阶段,还并未拥有权威系统的主题期刊。

表 7 国内刊发女性参政研究文献最多的期刊(前 10)

序号	期刊名称	CSSCI 来源期刊	文献数量(篇)	文献占比
1	《妇女研究论丛》	是	47	13.74%
2	《领导科学》	否	20	5.84%
3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否	10	2.92%
4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是	8	2.33%
5	《理论学刊》	是	7	2.04%
6	《理论与改革》	是	6	1.75%
7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否	5	1.46%
8	《湖北社会科学》	否	5	1.46%
9	《中国人才》	否	5	1.46%
10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否	4	1.16%

(三)研究方法

为了了解国内女性参政文献的研究方法,笔者对其进行了手工统计,结果如图 4 所示。定性研究占据了国内女性参政研究方法中的主体,占比高达 71.35%(244 篇);实证研究类的文章占

到 20.76%(71 篇)。值得关注的是,在近 5 年内的文献中,实证研究占比提升到 31.25%,定性研究则下降到 52.5%,这也体现了女性参政研究方法的日趋完善。此外,问卷法、访谈法、案例法是研究主要使用的方法。

① 检索条件:“主题”为“妇女参政”“女性参政”“女性政治参与”“妇女政治参与”,学科领域为“哲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I 辑”“社会科学 II 辑”“经济与管理科学”,期刊来源类别为“SCI 来源期刊”“核心期刊”“CSSCI”,检索时间为 2018 年 5 月 25 日。

② 图 3~4、表 7~9 的数据均来源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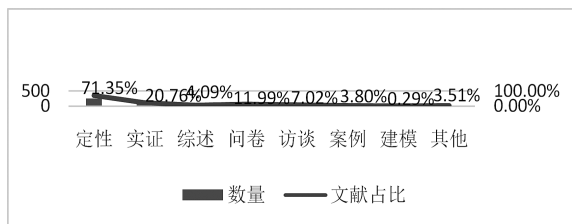


图4 国内女性参政研究方法

(四) 研究主题

笔者对所选取的国内女性参政期刊进行了高频词提取^①,表8列出了30个关键词及其频数,可以发现,关键词较为集中地出现在“妇女参政”上,其他关键词具有一定的分散性。下文将对国内女性参政研究主题作进一步分析研究,在此不多作阐述。

表8 国内刊发女性参政研究文献的关键词统计

序号	关键词	频数	序号	关键词	频数	序号	关键词	频数
1	妇女参政	126	11	村民自治	13	21	妇女政治参与	7
2	女性政治参与	50	12	对策	10	22	男女平等	6
3	政治参与行为	35	13	女性领导	9	23	男性	6
4	农村女性	30	14	参政意识	9	24	配额制	6
5	参政	26	15	妇女解放	8	25	女子参政同盟会	6
6	中华人民共和国	24	16	女干部	8	26	公共政策	6
7	政治	20	17	辛亥革命	8	27	妇女代表	6
8	参政运动	14	18	中国妇女	8	28	少数民族妇女	5
9	社会性别	13	19	妇女运动	7	29	农村妇女参政	5
10	性别平等	13	20	参政权	7	30	妇女干部	5

(五) 研究作者

表9对国内女性参政研究发文量靠前的作者和其所在机构进行了统计。国内对于女性参政研究仍然较为分散,这些学者发文总量为37篇,占总文献量的10.81%,且均来自不同的高

校。此外,国内女性参政研究进行团队合作研究或者跨校研究的案例较少,大多数都属于独立发表成果。在这些文章中,团队合作的文章数为4篇。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些学者中,仅有一名男性。

表9 国内女性参政研究作者(发文数量前8)^②

序号	作者名字	作者性别	所在单位	文献数量(篇)	文献占比
1	牛天秀	女	南京师范大学	6(2) ^③	1.75%
2	李晓广	男	南京农业大学	6(2) ^④	1.75%
3	范若兰	女	中山大学	5	1.46%
4	梁旭光	女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	5	1.46%
5	李慧英	女	中共中央党校	5	1.46%
6	刘伯红	女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	4	1.16%

① 运用中国医科大学医学信息系开发的“书目共词分析系统”,对样本期刊进行高频词提取。对“女性参政”“妇女参政”“农村女性”“农村妇女”“女性政治参与”“妇女政治参与”等同义词、相近词进行等价处理。本文论述中统称为“女性参政”,但关键词提取等数据资料仍作“妇女参政”引述。

② 由于发文量为3篇的作者数量较多,故该列表选取至发文量为4篇及以上的作者。

③ 括号内表示合作研究数量。

④ 同注释②。

续表

序号	作者名字	作者性别	所在单位	文献数量(篇)	文献占比
7	张永英	女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	4	1.16%
8	张桂华	女	华东师范大学	4	0.87%

四、国内外女性参政研究的比较分析

基于上述统计分析,可以发现国内外对于女性参政研究存在着诸多差异,同时也有着一定的

相似点。对比二者之间的异同,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女性参政这一新兴研究领域,同时能够为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表 10 国内外女性参政研究特征的对比分析

		国外研究	国内研究
研究氛围	发展趋势	稳步上升,近年文献量达到历史最高,逐步成为研究热点	仍然波动中,已受到关注,但近年关注度有所下降
	学术期刊	出现一些女性研究期刊,但未具备较高的影响力	较为集中于某一期刊,未形成系统性
研究实践	研究视角	政治学、女性研究学、社会学、区域研究学、发展规划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等	政治学、社会学、女性研究、历史学、公共管理等学科
	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为主流,除问卷、访谈外,亦采用实验研究方法	定性研究为主,以访谈、问卷调查、案例研究为手段的实证研究
	研究主题	性别、女性主义、政治参与、政治文化、政治党派、社会运动等	整体性研究、农村妇女参政、女性干部、女性参政制度与政策、参政运动等
	研究学者	女性研究者居多,跨校、跨国团队多	女性研究者居多,以单独研究为主
	研究机构	权威综合性高校成为研究的主要机构	少数官方女性组织机构承担了研究任务

(一) 研究氛围

从研究氛围来看,二者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虽然女性参政在学界仍属于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但国外研究呈现出一种稳步上升的趋势,2017年文献数达到时段最高的71篇(见图1),其已逐步进入学界研究视野并初现局部的研究合作网络,在高产作者之间已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合作研究关系;而国内研究仍然处于一个波动状态,在新世纪进入蓬勃发展阶段,但近两年热度下降,发文量仅有个位数(见图3)。如何吸引更多学者和科研机构关注女性参政研究,将是未来需要关注的问题。

由于该领域的新生性,学术期刊方面同样处于一个起步状态。国外出现了一些专注性别政治研究、女性研究的期刊,如 *Journal of Women Politics Policy*、*Women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Women Politics*、*Asi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等,各期刊之间发文量也较为平均,但问题在于

这些期刊还未具备较高的影响力。国内女性研究期刊则与之相反,为数不多的权威期刊《妇女研究论丛》集中了较多的女性参政研究文章(47篇),而专注于女性研究的期刊仍少之又少,且刊发的相关文章也较少,如《中华女子学院学报》等仅有5篇。

(二) 研究实践

从研究实践来看,国外女性参政研究更倾向于采用实证研究和定量研究,已达到51.19%,从初期关注局部地区、个别案例发展到近来更关注国家、世界地区层面的宏观规律探索。上世纪,国内女性参政研究的研究方法以定性研究为主流,理论思辨文章居多,总占比达到71.35%;后随着研究深入,由过去的以定性研究为基础逐步走向了多元化,实证研究的方法近年来受到青睐,运用定量研究、案例研究的文章逐步增多。

研究视角上,国内外女性参政研究集中于政治学、女性学研究视角,并不断向相关学科拓展。

从现实状况来看,国外女性参政研究的跨学科范围较国内广阔,已遍及政治、经济、社会、卫生、国际关系等领域。研究主题上,国外研究的性别视角较为明显,虽然不乏单独以女性为研究对象的文章,但同时学界也将研究落脚于性别差异及其原因,以寻求共性规律和理论发展;国内研究的关注点则更多在参政女性群体或者参政行为本身。

国内外研究作者的性别呈现出来的一致性,是一个有趣的发现。国内外对于女性参政研究较为关注并且发文量较多的学者大部分为女性。从研究机构来说,国外权威高校,如哈佛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等,都有对女性参政的研究,并且学者之间的跨校、跨国合作较为常见;我国女性参政研究者之间的学术交流较少,专业学术机构还未形成团队合作研究的形式,但我国出现了官方女性组织研究机构。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国内外女性参政研究的状况有着相似之处——在新生中摸索。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世界范围内女性主义研究的新生性。与国外女性参政研究的上升势头相比,国内女性参政受到的重视更多是“昙花一现”,无论是从专门性期刊、研究视角、研究方法还是研究网络来说都与国外存在一定差距。但国内研究在官方组织机构、专门性期刊方面有着较为出色的代表,形成成熟的研究体系未来可期。

五、国内女性参政研究的共词分析

基于对国内女性参政研究的高频词统计,本文采用文献计量中的共词分析,利用 SPSS、Uninet、Netdraw 等软件,对高频词进行聚类分析、多维尺度分析及社会网络分析。由于这三种分析方法各有利弊,本研究综合了三种分析方法的分析结果,并在此基础上,得出国内女性参政研究的知识图谱,总结出女性参政的五个热点研究主题。

(一) 聚类分析

在对国内女性参政研究的关键词提取(见表8)的基础上,得到其共词矩阵^①,利用 SPSS 24.0

对国内女性参政关键词作分层聚类分析(Hierarchical Cluster),得出了聚类分析结果的树状图。在归纳分析后,笔者得出国内女性参政研究的9大主题(见图5):女性组织与参政制度、女性代表与女性干部、性别平等、女性参政行为与因素、妇女运动与历史、妇女基层参政行为、社会性别、妇女群体参政、女性参政研究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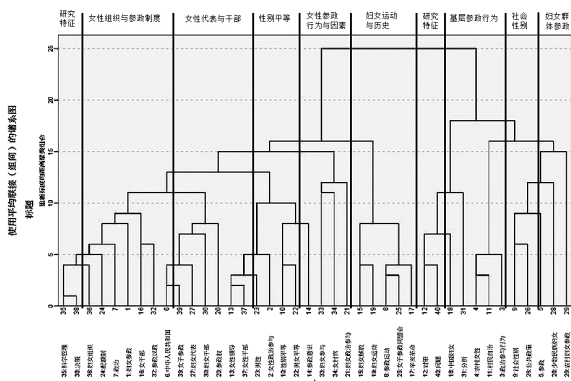


图5 国内女性参政研究的聚类分析图谱

(二) 多维尺度分析

在对国内女性参政研究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后,采用 SPSS24.0 对其作多维尺度分析(Multi-Dimensional Scale)^②,使其在二维象限中组合各关键词之间的关系,得出国内女性参政研究的知识图谱。我们可以发现,多维尺度分析的知识图谱基本上与聚类分析的树状图分类相吻合,但又有了一个新的特征;另外高频词呈现中心聚集、四周分散的状态,聚集在中间的关键词也是这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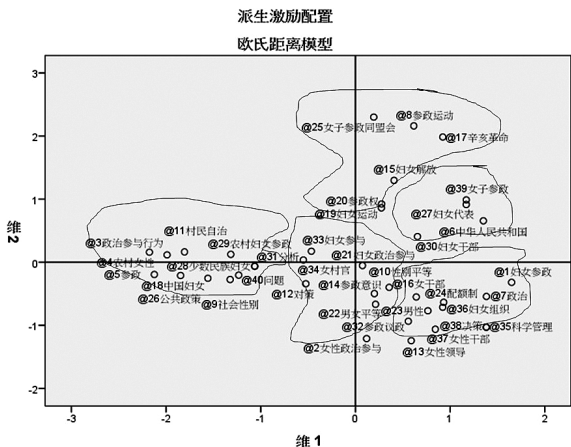


图6 国内女性参政研究的多维尺度分析图谱

① 利用 Ochia 系数方法,将共词矩阵转化为相关矩阵。

② 同样以相关矩阵为数据资料。

领域的标识词。在比较归纳后,笔者按照顺时针方向将多维尺度分析的结果划分为5大词团(见图6),分别涉及女性参政的运动、女性代表、女性领导干部、参政行为和基层实践。

(三) 社会网络分析

为了弥补聚类分析、多维尺度分析对关键词之间分类的限制,展现关键词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采用社会网络分析软件 Uninet 和 Netdraw 等可视化软件绘制了女性参政研究的知识图谱(见图7)。一般而言,社会网络各个节点之间的关系越紧密,网络密度越接近1^[4]。通过软件分析显示,该网络的密度是0.1933,标准差0.1717,中心势值19.63%。该网络密度较为一般,说明关键词之间的关系较为均匀而分散。图谱显示度数中心度^①前10的关键词是:妇女参政、女性政治参与、政治参与行为、农村妇女、参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参政运动、社会性别、性别平等。由此可以看出,围绕着女性参政、妇女政治参与等核心关键词,形成了农村妇女、参政运动、政治和性别平等研究主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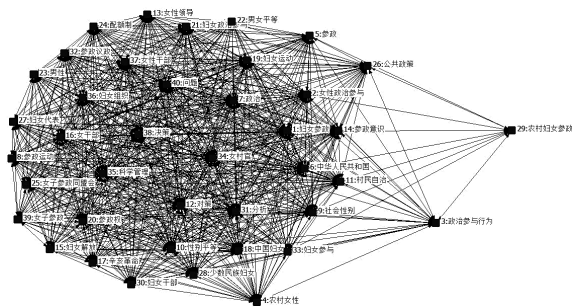


图7 国内女性参政的多维尺度分析图谱

(四) 国内女性参政研究的主题

经过对关键词的共词分析可以发现,国内女性参政研究形成了以女性参政为核心,不断向外发散、探索研究主题的趋势,其知识图谱呈现出六个主题方向。知识图谱将女性参政研究主题的整体概貌和结构可视化,在此基础上对主题进行细化解读,这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各个主题的研究现状及结构。结合知识图谱,通过阅读文献、分析比较,将国内女性参政研究主题归类为女性参政整体性研究、农村妇女参政、女性干部、女性

参政实践、女性参政制度与政策以及女性参政运动六个主要方面:

1. 女性参政整体性研究。女性参政的整体性研究占据了大多数,达到73篇之多。在“女性参政/妇女参政”这个核心词汇之下,出现了较为相近的两个关键词:“参政意识”“女性(妇女)政治参与”,这也是学界讨论较多的方面。女性参政被认为是由参政意识、参政能力和参政机会三要素构成,在整体性研究之下的子主题中,相比于对女性参政能力的讨论,女性的参政意识和参政机会更受学界关注。

对参政意识的研究主要从女性对参政的认知、功效感、动机、信心等方面展开,有学者对女性参政的主体性意识进行讨论,杨静从中国妇女参政历程论述了妇女参政主体意识缺失的原因^[5],她认为需要有为妇女参政服务的理论才有可能实现“参政妇女为妇女参政”的政治理想。对参政行为的研究一般从途径、方式、能力等方面展开,对参政机会的研究则是从非制度性因素方面进行讨论,比如社会关系网络、政治资本、性别秩序等非正式支持机制。对女性参政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也是众多定量研究的聚集地。

这个主题的研究呈现出明显的按时间发展而丰富和提升的脉络,上世纪90年代的研究多以问题、障碍为研究切入点,随着时间的发展,近年来不仅现实中对于女性参政理论有了需求,研究中也出现了较多对于女性参政理论的体系化思考,范若兰提出了不同父权制类型之下女性政治参与模式的理论思考^[6]。

2. 女性参政实践。对某一类实践的经验性总结是这一研究领域发展之初的必经之路,女性参政研究也不例外。参政实践虽然并未形成一个关键的核心词,但从统计结果来看,关于国内外女性参政实践研究的文章达到115篇,占总文献数的1/3。此类型的文献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仍屡见不鲜,说明了国内学界对于女性参政研究在总体上仍然更倾向于此类基础性的研究。

从类别上看,该主题可以分为国内外实践研

① 点的度数中心度是衡量各个节点中心性的指标,反应一个节点与其他节点的连接情况。

究两个部分:外国实践涉及了欧洲、美洲、东盟国家等近 20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对北欧女性参政程度较高的国家探讨的较多;国内实践中有一部分涉及古代女子参政考论,另外则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省或自治区的女性参政实践进行研究。

从内容上看,此类研究一般从该国家或地区女性参政的数量和质量分析入手,探讨该国家或地区女性的参政环境、女性的参政实践、女性在该国家或地区政治生活中实际的作用力和影响力状况、女性的政治形象等,从而形成该国家或地区的女性参政概貌。

从横向比较来看,对于女性参政实践研究,人们更多将目光聚焦在某一国家和地区的实践模式刻画上,呈现出一种相对隔离和分立的状态,对于我国女性参政实践的未来价值和意义体现得并不十分明显,将国内外并列起来作对比分析的研究占据少数。近五年来,刘伯红梳理了兴起于 19 世纪中叶的国际妇女参政运动等三次妇女运动浪潮,对比分析了我国女性参政与国际女性参政存在的差距和问题^[7];隋悦对比分析了中西女性参政实现的路径;李洪峰等则从世界城市的视角,对比分析了纽约、东京、伦敦、巴黎四大城市的女性参政数据与机制,并在此基础上为北京市实现性别平等提供了借鉴^[8],这也是其中为数不多从可供借鉴的比较视角出发的研究。

3. 农村妇女参政。农村妇女参政是今年女性参政研究中一直备受关注的话题,在 342 篇文献中有 56 篇文献研究了农村妇女参政问题,从 2000 年起其一直贯穿于女性参政研究中,并且绝大多数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相对于城市妇女参政,由于社会环境、教育条件、经济基础等诸多方面的差距导致农村妇女参政状况相对滞后且问题众多,这也是学界对农村妇女参政关注颇多的原因。

与农村妇女参政联系在一起的词团有政治参与行为、村民自治、少数民族妇女等,这反映出了该主题研究的基本结构。“村民自治制度”是我国新世纪以来构建基层民主政治的探索与实践,也是农村妇女参政研究的重要背景条件。农

村妇女的参与主体性被“一刀切”的“村民自治制度”虚置化,不仅参与度明显落后于男性,同时在“民主化”的乡村治理中也面临着群体边缘化与低层化的风险^[9],农村妇女参政现实与制度安排之间的落差,是诸多学者关注到农村妇女参政的主要原因。目前学界中,对广义、狭义农村妇女参政均有涉及,对政治参与(即广义参政)的研究占据多数,学者主要对农村妇女参与基层民主状况及行为进行描述性研究,对制约农村妇女参政的因素及其机理作出解释。在此基础上,对目标群体进行了细化,出现了不少对于某一特定群体,如农村中欠发达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妇女及留守妇女的研究。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农村发展及政治参与状况差异较大,故选择个案研究或基于某一特定地区的调查研究成为农村妇女参政研究的主流。整体看来,学界呈现出由微观调查、群体刻画拼凑出我国农村妇女参政图景全貌的研究路径。

值得关注的是,“农村女性政治精英”这一群体性名词出现在农村妇女参政研究中,这意味着对于农村妇女权力参与的关注:2003 年,柳莉在对浙江省 C 市 T 镇 T 村的女性政治精英的访谈及个案分析中,论证了工业化对农村妇女政治精英构成的影响,其中包括两性分别在农村权力机构中所处的位置、资源及行动策略差异^[10];近年,韩国明、齐欢欢在农村民俗基础上讨论了农村女性精英(文中为广场舞领导)向政治精英转变的可能路径,他们认为广场舞这种具有民主意识和民主管理能力训练内涵的自组织将成为农村妇女迈向政治参与的雏形,在一定程度上会逐渐改变村庄政治图谱^[11]。在农村妇女参政研究中,女性权力参政群体及其制度讨论对于提升农村妇女参政质量、建设基层民主政治而言具有其现实意义和价值,但出于对于广义政治参与的集中关注,对农村女性政治精英群体的关注呈现边缘化的状态。

4. 女性干部。学界对女性干部(或称作“女性领导”)的关注从 1990 年代便已开始,但近些年来对其关注度有所下降,在 2014 年后鲜有针对女性干部的研究。女性干部的研究中所涉及的

关键词较为纷杂,本身对于此类研究的称谓都十分多样化,因而从文本内容中对知识图谱进行补充有其必要。

从主体上来看,研究中对女性干部的范畴并未有明确划分,往往将其统称为女干部,但其实研究中涉及女村干部、女县长、女人大代表、党政机关女干部、女市长等不同群体。其中对于县级、村级女干部的实证研究居多,而对于女市长的研究则需要追溯到2001年刘伯红等对中国女市长的调查,其中对中国女市长的基本构成、在各级政府改革和管理中的作用、执政中面临的困难及评价、对男女平等管理地方政府的建议作了定量描述分析^[12]。

从内容上来看,对女性干部的培养选拔路径与制度政策的讨论居多,“培养选拔”作为除了女性参政、妇女参政之外的高频词出现在这类研究中。对女性干部的实证研究则更多关注除女性自身素质之外的制约因素、非正式制度障碍对女干部参政的影响,如农村从夫居住制度对女性政治精英参政的时间限制、父权制下村庄政治对女干部的社会资本积累、政治资源获取、决策行为实施的障碍。也有研究关注了女性干部的职业发展,如瞿超凡对山东省CW县基层女性干部的成长路径和职业归宿进行了分析^[13]。另有少部分研究关注了女性干部的领导素养。

权力参与是女性参政的核心,女干部作为权力参与的高层次群体,更是女性参政研究不容忽视的重要主题。但与之相异的是,对于女性干部的研究仍处于较为边缘的状态,这与政治现实中女性在权力决策核心圈中的状态和地位不无关系。

5. 女性参政制度与政策。女性参政制度与配套政策是支持女性参政权益和机会的重要保障。虽然该主题研究文献数量不比其他主题多,在这两个核心关键词之下还未生发出其他细分词团,但对如何在质和量上推动女性参政一直是学界讨论的重点之一。对于女性参政研究来说不可避免地会关注到如何从制度上、政策上对女性参政做出稳固性的保障。

其中被世界范围内广泛实践的配额制(又被

称作比例制)即是焦点之一,除了对国外配额制的对比分析,国内学界对配额制的讨论则主要围绕“要不要采取配额制”和“配额制如何细化更利于女性参政”展开。对配额制的观点分为三类:强烈反对者普遍认为女性参政比例制违反民主、平等原则,又或者认为配额制是女性参政数量与质量相背离的原因;支持者则认为配额制是实现男女平等、保障女性参政权利的工具和手段;相比于从民主政治或性别平等角度的考虑,李晓广认为,比例制这一强制性制度安排是针对传统性别制度在当今社会中的惯性作用并阻碍两性平等参政的权宜之计与效力选择^[14],他结合国内性别平等历史与制度提出了更贴近实践需求的论断。而对于制度内容本身的讨论则更多关注其在实践过程中的目标偏离,对于比例数字的设置还是围绕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行动纲领》中提到的“至少要有30%”^[15]展开。

值得关注的是,伴随着“公共政策”这一关键词出现了一个更具现实意义的研究视角:学界对公共政策的讨论并不仅仅局限于对促进女性参政或政治领域性别平等的政策梳理,或是对女性参政政策执行结果与目标相偏离的批判,而是转而寻求这一问题发生的根源——从社会性别视角缺失的方面分析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存在的漏洞。鲍静认为,其间社会性别意识的缺失是导致女性参政机会稀少,社会对女性参政能力不认同,并且反作用于女性参政的主要原因^[16],解释了女性参政的刻板印象、女性参政的“玻璃天花板”现象等存在的内在逻辑。

6. 女性参政运动。这一主题以“参政运动”为核心关键词,聚集了“参政权”“女子参政同盟会”“妇女解放”“辛亥革命”“妇女运动”等词团。在该主题下,集中地出现对民国初年参政运动的研究以及辛亥革命时期带来的社会结构转变,其也意味着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妇女参政运动拉开序幕。学者认为以男女政治平权为目标的参政运动对日后中国女性参政历史影响深远^[17],有其研究价值。关注此类主题的多是有历史学、文学或社会学背景的学者。对女性参政运动的研究可分为两类:一是对以唐群英为代表的

妇女运动的历史考察;另一类是将民国初年参政运动作为整体,探讨性别平等斗争与政治民主化之间的联系与碰撞。

(五) 研究特点与趋势

上述的共词分析、知识图谱以及对主题的论述呈现出上世纪90年代至今国内女性参政研究的宏观概貌。下文结合对高频关键词纵向变化及对样本期刊的内容考察,得出国内女性参政研究的整体特点和未来趋势。

1. 女性参政研究前进中有变化。对纵向间每五年的高频词进行统计(如表11所示)可以发

现除了该研究的核心词汇“妇女参政”“政治参与”“参政”等外,2000年前后的研究呈现不同的规律。本世纪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等词汇相继出现在高频位置,研究更加关注妇女参政历史和妇女解放运动,赋予女性平等的政治权利和执政权利;在2000年之后,以上这类词汇先后退出,取而代之的是“农村妇女参政”“村民自治”等,对女性干部的关注也转向“女村官”。近五年来,“农村妇女参政”这一词频又有所下降,“社会性别”“性别平等”出现在较为靠前的位置。

表11 国内刊发女性参政研究文献的关键词统计

序号	1992—1996年	1997—2001年	2002—2006年	2007—2011年	2012—2016年
1	妇女参政	妇女参政	妇女参政	妇女参政	妇女参政
2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妇女	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
3	政治	参政	参政	参政	性别平等
4	参政运动	女干部	农村女性	农村女性	妇女
5	妇女组织	政治	政治参与	村民自治	女性
6	妇女政治参与	中国共产党	对策	女性领导	社会性别
7	妇联	中国妇女	村民自治	妇女	农村女性
8	参政权	参政意识	社会性别	性别平等	参政
9	女子参政同盟会	参政运动	参政意识	辛亥革命	女性政治参与
10	妇女解放	问题	政治	女村官	留守妇女

2. 女性参政研究反映女性参政的时代性。从对样本期刊的考察来看,女性参政研究与国内女性参政实践和国家政策方针紧密结合。20世纪90年代,女性学学科开始受到学界关注。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是国内女性参政研究的契机,它成为国内女性参政研究的重要转折点,同时期研究数量出现了小高峰^①。2007年《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的说明》中明确对女性代表比例作出表述,全国人大代表女性比例不低于22%^[18],妇女的政治权利受到一定保障的同时,诸多学者将目光投注到更广泛、政治权利被虚置的农村妇女群体中。2010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修订引起了农村妇女

在村民自治中地位和权利的热议,高频词的前五名中相应出现了“农村妇女”和“村民自治”。而近年来,国内女性参政呈现一种平稳的“三多三少”状态,在政策导向上并未有突破性进展,相应的研究也呈现平稳甚至热度下滑的状态。

3. 女性参政研究视角的转变带来新的契机。纵观女性参政研究,在研究之初更多是从社会学角度出发对女性参政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政治学视角的加入使得女性参政的研究更富于实用意义。随着实践和研究的发展,以性别平等为基本国策的实践与实现女性参政的政治理想之间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使得学界不得不重新对女性参政问题进行思考,对女性参政现状的

① 由图1“国内女性参政研究历年发表的文献数量(1992—2018年)”可知,1995年的期刊数为13篇,为同时期之最。

社会性别视角进行追问,这不仅是对性别平等现状的重新审视,也将是女性参政研究的重要转折点。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填补各个主题的研究空白,构建女性参政理论,将是研究的现实需求和未来趋势。

六、研究结论与局限

本文以 Web of Science 与中国知网中手工整理得到的 674 篇 SSCI 国外文献以及 342 篇中国核心期刊文献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对国内外女性参政研究的发展脉络和特征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对比。研究发现,对国内外女性参政研究的宏观概况,二者在学科的成熟度上较为相似,但在研究氛围和研究实践上存在一定差异:与国外持续攀升的研究热度相比,国内研究热度近年有所下降,且在研究方法的选择和研究视角的切入上有着偏向基础研究的局限,这也从侧面为我国女性参政研究发展指明了方向。

但单纯追求与国际研究比肩以及照搬照抄并不真正符合中国女性参政的现实需求。为进一步把握国内研究主题,本文在此基础上对国内女性参政研究主题作了内容的厘清和趋势的阐述,运用共词分析等可视化技术描绘了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内女性参政研究的知识图谱,从其中挖掘出六个研究主题:女性参政整体性研究、女性参政实践、女性干部、女性参政制度与政策、农村妇女参政以及女性参政运动,并论述了研究整体呈现的特点。基于现有研究成果,以女性及其内部群体为对象开展女性参政的动因研究,丰富修正女性参政理论研究,是该领域未来研究需要关注的。本文的研究能服务于该领域未来的研究讨论,有助于中国女性参政研究者把握研究

状况与未来发展趋势,共同推进中国女性参政研究与实践的发展。

但是本文研究仍然存在一定局限,从样本期刊的选取而言,由于对女性参政定义的理解有差异,采取的搜索关键词必定存在差异,因而并不足以穷尽该领域所有的期刊文献,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对研究结论的适用性产生影响。在对女性参政定义有普遍共识的基础上进行文献计量研究将是更具价值的。

从技术方法的运用来看,出于操作的可行性考虑,共词分析的前提是在一定阈值之上选取高频关键词,一些低于该阈值的关键词便被排除在研究之外。由于国内女性参政研究的关键词提取结果呈现严重分散化的状态,存在很多频次为 1 的关键词。虽然本研究通过文本解读进一步弥补了对这部分关键词的关注缺失,但这并不能囊括全部的情况,或者降低这些关键词在构建学科研究主题宏观概貌上的价值。通过其他计量方法尽可能囊括所有关键词,无疑是更好地挖掘内容和全面展现研究概貌的途径。在对国内外女性参政研究的比较中,由于关键词频数较低,用词较为分散,未能对国外女性参政研究期刊作进一步的内容挖掘,在研究主题的比较上存在一定的局限。

从研究样本期刊可以发现,对于女性参政研究的关键词选取尚没有统一、规范的标准,随意性、重复性较为明显。这也导致了各个关键词之间关系的错综复杂,增加了辨识研究主题的难度,同样不利于研究各个主题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将重点放在对研究主题的辨识上,对于各个主题之间的联系分析关注较少,这也是未来此类研究需要丰富的。

[参考文献]

- [1] 魏开琼. 妇女/社会性别政治学[M]//王金玲. 中国妇女发展报告 No. 5: 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建设与发展.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 [2] 李宁, 杨银慧. 当代中国妇女参政研究述评[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40(3): 51-55.
- [3] 杜美玲.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女性政治参与研究述评[J]. 山西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 41(2): 125-129.
- [4] 斯坦利·沃瑟曼, 凯瑟琳·福斯特. 社会网络分析: 方法与应用[M]. 陈禹, 孙彩虹,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 [5] 杨静. 试论参政妇女为妇女参政——论述与主体性的建立[J]. 妇女研究论丛, 2013(6): 5-12.

- [6] 范若兰. 父权制类型与女性政治参与模式分析:一个理论思考[J]. 思想战线,2015,41(5):68-74.
- [7] 刘伯红. 国际妇女参政的实践及其对中国妇女参政的影响[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2):48-52.
- [8] 李洪峰,李英桃,张颖,顾蕾. 透视世界城市女性参政问题——纽约、伦敦、东京、巴黎的个案研究及其对北京的启示[J]. 妇女研究论丛,2012(1):71-78.
- [9] 潘萍. 村民自治制度中的农村妇女参与[J]. 妇女研究论丛,2008(1):10-14.
- [10] 柳莉. 改革后中国农村工业化与农村妇女政治精英构成的变化——以浙江省C市T镇T村为例[J]. 浙江学刊,2003(6):202-207.
- [11] 韩国明,齐欢欢. 农村“女性精英”广场舞领导与村委会竞选分析:动机、能力与机会——基于甘肃省16个村庄的实地调查访谈[J]. 贵州社会科学,2017(2):85-91.
- [12] 刘伯红,王荫萍,张学斌. 中国女市长调查[J]. 妇女研究论丛,2001(1):68-72.
- [13] 瞿超凡. 基于政治参与的基层女性领导职业生涯分析——以山东省CW县为例[J]. 理论与改革,2008(1):105-107.
- [14] 李晓广. 比例制:当代中国性别平等参政的效力抉择[J]. 妇女研究论丛,2009(6):5-10.
- [15] 联合国大会. 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行动纲领[R]. 北京:1995.
- [16] 鲍静. 政策过程与女性参政机会分析:以社会性别为视角[J]. 新视野,2010(5):72-76.
- [17] 张军亭. 20世纪初中国妇女参政运动兴起探析[J].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8,61(4):468-472.
- [18] 全国人大.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的说明[EB/OL]. (2018-07-18)[2019-03-03]. http://www.npc.gov.cn/npc/xinwen/lfgz/lfdt/2007-03/08/content_360321.htm.

Research Perspectives and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An Analysis Based on Bibliometrics

HUANG Jun-jie, WANG Jing-we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Women are the actors that can not be neglected in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Based on Web of Science and CNKI system, 674 foreign and 342 domestic journal articles a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bibliometrics is used to compare the research status of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at home and abroad. By using Co-word analysis, this paper draws the knowledge map of domestic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research, and excavates six major themes of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research: the integrity of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research,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ractice, rural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women cadres,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system and policies, and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movement. Combined with the comparison between domestic and foreign studi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we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study the motivation of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and to construct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in the future research from a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Key words: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bibliometrics; co-word analysis

(责任编辑 鲁玉玲)

· 女性与社会发展研究 ·

健康的性别塑造：新情况、新挑战与新议题

姜佳将

(1. 南京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23; 2.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5)

摘要: 妇女的健康状况是衡量一个国家性别平等状况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核心指标之一。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变迁, 妇女健康和健康研究也面临着更多的新情况和新挑战。这主要包括妇女健康方面一系列亟待关注和深入探讨的研究议题: 妇女的主体性健康与独特经验表达; 老龄化、空巢化、照顾者角色所导致的健康损害; 疼痛、慢性病和亚健康的性别根源和社会根源; 日常生活视野下的生活方式与妇女健康; 技术变迁下的社会伦理与妇女健康; 消费主义盛行下的密集性母体照顾; 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妇女健康; 定量、质性与大数据研究等。

关键词: 妇女; 健康; 主体性; 社会根源

中图分类号: C913.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838(2019)05-0036-07

妇女健康是妇女的一大基本人权, 妇女的健康状况是衡量一个国家性别平等状况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核心指标之一, 促进妇女健康是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职责。妇女的健康议题除了一般的议题外, 更包含妇女特有的或更常有的健康议题, 如非正式的医疗照顾角色/多重角色带来的身心负担、堕胎意外/高龄产妇风险等生育/生殖健康、妇女在医学中的刻板印象、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资源分配不均而导致的死亡、整容整形瘦身等所隐含的各种健康问题等。

20世纪70年代, 由于女权主义者对社会学中的性和性别范畴的批评, 医学社会学家改变了他们对妇女健康的研究和概念化, 开始关注性别在健康中的作用。他们放弃了关于男女性别差异的基础人口统计学研究, 开始更多地关注对女性健康的性别分析。最早的社会学对性、性别和健康的探索之一围绕着西方社会的“性别悖论”^[1]展开——尽管男性会早逝, 但女性会经历

更多的疾病和病态 (sickness and illness)。有学者将这一性别悖论比喻为“疾病之冰山”——我们所看见的冰山部分往往是男性所患的如癌症、心血管类疾病、肝硬化等各种致命性重症疾病, 而女性所患的大量非致命性的慢性病或亚健康症状, 如妇科病、偏头痛、失眠、乏力、腰酸背痛、抑郁、贫血等往往被我们所忽视, 就如同水下巨大的冰山体^[2]。尽管总体而言女性可能比男性长寿, 但她们晚年的生活往往充满了贫困、慢性疾病和抑郁——带着病痛活着。社会学视野下的健康的性别差异研究不仅仅是统计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异, 而是需要理解两性的独特社会文化经验, 而不仅仅是医学或身体方面的不同。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变迁, 妇女健康和健康研究也面临着更多的新情况和新挑战, 由此, 不断拓展新的议题、理论和方法就显得尤为必要。因此, 下文主要论述当下妇女健康研究中的一系列亟待关注和深入探讨的议题。

收稿日期: 2019-06-20

基金项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青年项目)“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妇女生活方式的变迁研究”(项目编号: 15CSH034)

作者简介: 姜佳将, 女,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 主要从事社会性别、生活方式研究。

一、妇女的主体性健康与独特经验表达

何谓健康?传统上,“健康”通常被认为“无病即健康”,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的概念从简单注重生理健康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过渡,即:健康不仅是指身体无疾病,即身体健康,也包括心理健康和对社会的适应性。可见,人类的健康至少应包括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性这三大层面。

近20余年来,有关妇女健康的理念发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变化——其理念范畴开始并不断地由“生育健康”经“身体健康”向“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与社会适应性”转变;有关妇女健康的理念核心由“工具性健康(如,作为生育/性/母亲角色的健康)”开始并不断地向“主体性健康(如,作为女人和/或人的健康)”转变^[3]。然而,主体性健康取得的进展仍滞后于客体性健康,如妇女的疾病及时治疗率的增长速度显著滞后于产前检查率、住院分娩率、妇科病治疗率等的增长速度^[4]。当前更为欠缺的是,对于妇女健康的社会适应性尚没有专门、系统的研究和测量。

健康不仅是医学技术问题,更是重大的社会文化问题,是身体与自然、社会、科技、文化等的各种交流、互动方式,是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与社会适应性的完好状态。因此,妇女的主体性健康与妇女独特的健康经验表达应得到未来研究的重视,衡量妇女健康的标准应扩展到妇女生理、心理、社会适应性等各个方面,并关注到阶层、城乡、年龄、文化传统等多维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即推进妇女健康的整体性发展和整体性研究也应进一步成为今后妇女健康的一大重要关切点。

二、老龄化、空巢化、照顾者角色所导致的健康损害

随着人口老龄化、家庭小型化和性别螺旋现象的产生,“老年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later life)”和“老年妇女空巢化”的现象不断显现。

生育率下降和寿命延长造成人口老龄化现象的产生,而老龄化往往会伴随着慢性病的来临,使得妇女成为健康照顾的主力军——由于其妻子、媳妇、女儿等角色,使她们易成为长期的家

庭照顾者。另因年轻女性就业率及双薪家庭的增加,也使得有些老年妇女必须义务性地在家中照顾第三代的儿孙。这些老年妇女在“爱的劳动”中无声地扮演着“主要照顾者”的角色,而这“照顾者的角色”也使她们不断遭遇病痛和健康风险。“老年妇女空巢化”现象的产生,使得老年妇女在其生命历程中经历“照顾生病卧床的老伴”“送终的哀伤”甚至“独自面对死亡”,而被美化的“三代同堂”所导致的“照顾者角色”所造成的健康损害等问题,更加深了此种迷思与陷阱^[5]。

“性别螺旋(gender spiral)”现象是指年轻男性人数大于女性,而到了较年长人群,女性人口数则高于男性。根据联合国全球人口统计显示,0~49岁男性人口多于女性,50岁及以上女性的人数则超过男性,呈现显著“性别螺旋”现象^[6]。在中国,0~59岁男性人口多于女性,而60岁及以上女性的人数则超过男性(见图1)。“老年女性化”是女性平均预期寿命长于男性的结果,但是,女性的平均健康寿命往往较男性短,女性在老龄后期身体机能失能的时间也较男性长,严重影响了老年妇女的生活质量。这可能是疾病发生率和患病类型不同所造成的——老年妇女容易罹患骨骼肌肉疾病等与死因无关却影响日常生活的慢性、温和性疾病,此种温和性的不易痊愈的病症长时间困扰老年妇女,再加上其较男性长寿的因素,可能累积造成老年妇女多数处于残障与多病的不健康状态。

许多研究已经表明,长寿并不意味着生活质量的提高,老年妇女需要解决生理、心理和社会方面的特殊需求^[7]。随着高龄老年妇女的增加,特别是超过85岁妇女常伴有失能的情况,例如听觉、视觉、日常生活功能等障碍,超高龄妇女的长期照顾服务和失能医疗照护将是社会和政府面临的重要议题。因此,老年人口问题将更多地是老年妇女问题,将老年妇女的健康与生活质量列为妇女发展的重大关切领域,已势在必行。在未来政策研究中,针对老年人的政策和服务需要考虑到妇女往往比男子长寿的事实,更需要考虑到妇女作为主要照顾者所存在的健康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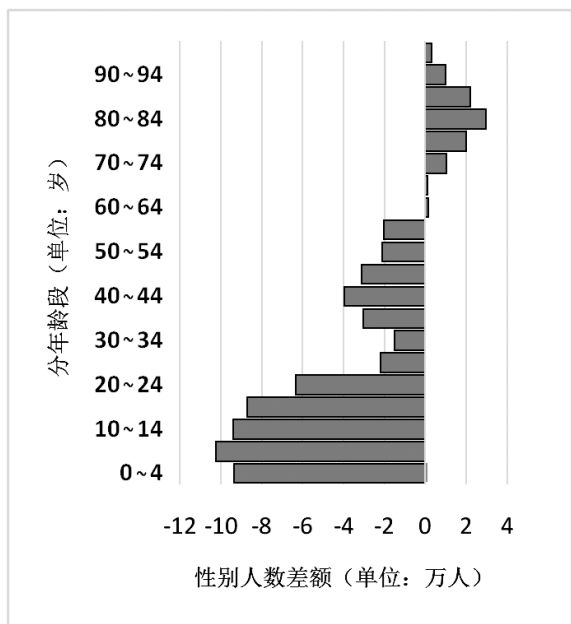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男女性人口数分布呈现“性别螺旋”现象图
(2015年)

数据来源: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样本数据,抽样比为1.55%。

三、疼痛、慢性病和亚健康的性别根源和社会根源

在我们的调研中,在“健康自评”一栏中,大部分妇女认为自己健康状况“良好或较好”,但在自感所患疾病类型一栏中,同一批被访者往往会陈述诸多健康问题,包括便秘、偏头痛、风湿类疾病、宫颈糜烂、子宫脱垂、贫血、尿失禁等等。人一生中有许多时候处于健康与疾病之间,即亚健康状态。亚健康状态是指无器质性病变的一些功能性改变,因其主诉症状多种多样,又不固定,也被称为“不定陈述综合征”,在主观上会有许多不适的症状表现和心理体验。由于女性长期背负“脆弱”之刻板印象,女性往往被认为痛感更低、承受痛苦能力更弱,并且往往夸大病症。对于她们所述的亚健康、慢性疾病等疼痛问题,人们常常只依赖药物和手术解决问题,而忽视了疾病背后所蕴含的社会文化原因。如在妇女更年期的诊断和治疗上,医学上常利用荷尔蒙替代疗法“治愈”。虽然有大量的临床及患者证据可以证明荷尔蒙替代疗法能够缓解绝经期的身体症状,但是几乎没有证据显示它有助于应对女性更年期的心理问题,且很少强调其潜在的长期性严

重副作用,比如增加患子宫内膜癌和乳腺癌的风险,而此疗法最直接的影响是导致水肿、体重增加、乳房胀痛、腹部绞痛、易怒烦躁、恶心呕吐等^[8]。事实上,生活带给她们的焦虑和压力远比更年期激素水平变化对其身心健康的影响大,妇女的健康问题往往与性别、婚姻、养育、工作、生活方式等各种交错的社会关系有关,而单纯的药物治疗无法解决女性身体上的社会压力和社会适应问题^[9],她们疾病与苦痛的性别根源和社会根源到底是什么?病痛可能是身心失调问题,同时更是妇女的社会适应性问题——妇女的痛苦感受并不是个体性的。我们通过追溯妇女所寄居的社会、文化、家庭环境,可以发现其苦痛与疾病的社会性根源。可见,探索和挖掘造成妇女疼痛和疾病的社会性根源,是未来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和关注的问题。现代医学往往执着于对疼痛进行精细的研究,却对疼痛从何而来漠不关心。医学诊视必须结合整个社会—心理—文化总体来综合考虑,如性别、收入、生活方式、习惯、就业、教育和家庭结构等,才能正确了解和应对苦痛与疾病的社会根源。

四、日常生活视野下的生活方式与妇女健康

生活方式是社会学领域中与健康相关的重要概念。韦伯、布迪厄等社会学家都有相关论述。韦伯认为造成不同地位群体之间差异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特定的生活方式,一个人的生活机会由社会经济环境塑造。布迪厄分析了饮食习惯和运动倾向,阐述了“惯习”的概念,并进而阐发出“必需距离”来解释生活方式中的阶级差异。在总结了韦伯和布迪厄的研究后,考克汉姆设计了一个更为复杂和系统的模型来解释健康生活方式,这个模型显示了特定的社会结构怎样影响了健康生活方式的选择,而个体所处的阶级境遇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10]。随后的诸多国外研究也发现,社会经济地位作为衡量一个个体在社会中所处位置最为重要的因素,对健康问题方面存在的差异有着强有力的解释力。但社会经济地位从社会距离上来说是最远端的影响因素,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健康行为是最近端的影响

因素,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影响生活方式进而导致不同的健康水平。国内相关研究也发现,与欧美主要发达国家一样,中国也存在明显的健康不平等。社会经济地位主要通过健康生活方式影响个体的健康水平^[11]。社会经济地位高的群体更可能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譬如不抽烟、适度喝酒或不喝酒、经常锻炼、维持正常的体重等。那么,生活方式是不是与高度可预防疾病导致的死亡有更强的相关关系?性别在其中产生什么作用?生活方式,如居住方式、婚姻方式、社会关系、健康行为、照顾角色、日常生活习惯等,对于妇女健康状况到底有多大的解释力?其中的解释机制与西方有什么不同?导致性别间寿命及健康状况差异的潜在机制到底是什么?这就需要我们从妇女的日常生活史和生活方式中去探求个人病痛的内喻。

此外,生命历程视角逐渐成为研究健康、健康行为和死亡风险的重要分析框架。如有学者进一步考虑生活方式的时间维度,将生命历程理论纳入健康研究,并结合健康累积优势/劣势,强调早年的不幸经历和事件如何使人们面临更高的健康风险,而有利的经历如何能够创造机会提高其健康状况^[12]。妇女在童年期、青春期、孕产期、更年期等生命周期的日常经历和事件,如何产生健康累积优势/劣势,如何影响其健康状况,存在怎样的健康风险,也是未来研究的方向所在。

许多医学研究认为健康问题与遗传、基因、抗压性与调试有关,事实上社会环境结构、社会技术变迁及日常生活方式对于健康亦有莫大的影响。健康问题常隐涵于日常生活中的医疗、科技、角色、权力的社会变迁之中,性别不平等在健康机会(Life Chance)上的本质亦是深植于社会生活之中的。因此,对于妇女健康,我们应该跳脱出单纯的医疗空间而回归日常生活,更多地从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社会空间和社会维度来看待妇女健康,强调文化和社会环境对健康的制约。因此,在未来的健康研究上,应倡导“重返日常生活”的方法论,寻找一种理解中国转型社会中普通人的更接地气的方式,将女性主义视

角与探索底层人的日常生活实践的现代性的“社会学的想象力”结合起来^[13],从生活方式的角度来管窥妇女健康。随着研究领域的日益扩大,对生活方式、社会紧张与疾病的关系的研究,对妇女所生存的生活世界的追溯,对预防性健康行为^[14]及有益于健康的生活方式的研究,将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五、医疗技术变迁下的社会伦理与妇女健康

科技发展与性别平等是近年来的前沿议题,技术对于性别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技术可以给妇女带来解放,也可以带来阻碍和风险。

辅助生育技术(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ART)于20世纪70年代晚期被发明,之后,全世界试管婴儿的数量“呈指数式递增”,目前已超过800万^[15]。一方面,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不仅可以帮助原本无法生育的人群实现为人父母的可能,还能被用于产前遗传异常或染色体异常诊断以及婴儿性别检测;另一方面,将生育从婚姻家庭中剥离出来,导致了传统家庭模式和亲子关系的变革,因其涉及到各种新型伦理问题,辅助生育技术又饱受争议。辅助生育技术的出现亦促使女性主义者和支持失能人士权利者开始讨论这些发展所带来的伦理问题和健康风险,女性主义者也将注意力转向所谓的“新型”生殖技术上。女性主义者指出,虽然辅助生育技术可以帮助女性达成生育愿望,但许多生殖技术存在缺陷且其安全性也值得怀疑,技术的安全性、潜在健康风险以及妇女对于新型技术的知情与否、自主决策能力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我们必须认识到,虽然科学可能有益于妇女,但是其控制权和决策权往往不在妇女手中。事实上,对于新型技术及其潜在健康风险的知情权,以及技术使用与否的选择权和决策权,才是妇女更好地进行知情决策和自主选择的关键^[16]。

此外,代孕、冻卵等作为一种新型生殖技术,涉及法律、伦理等复杂关系。目前我国立法虽禁止代孕,但现实中代孕市场却暗流汹涌,简单的禁止性规定并不能抑制代孕现象的出现,反而使不孕妇女和代孕妇女的权益裸露在立法的保护

范围之外,间接上造成了地下代孕市场的畸形繁荣。有学者认为,代孕现象造成代孕母亲“子宫工具化”,也有学者认为,这是妇女“身体自主权”的体现^[17]。因此,除了有关法律、伦理的探讨,代孕将会导致的社会后果、权力关系和妇女健康等社会学因素也是未来健康社会学研究的方向和挑战所在。

总体而言,目前,关于医疗技术与健康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医学、法学、伦理学、卫生学等领域,而未来妇女健康领域的社会学关切应结合上述学科的研究成果并聚焦于如下三个方面:一是重视技术发展进程中的潜在健康后果,如生殖技术导致的远期健康风险、代孕母亲的健康后果、多胎妊娠对母婴的危害等;二是技术运用背后的各种性别权力关系和性别伦理,如家庭/夫妻权利关系、妇女的健康主体性和身体自主权、生育自主权、知情决策权、性别伦理等;三是放弃治疗后的家庭婚姻关系、妇女心理健康、生活质量等^[18]。

六、消费主义盛行下的密集性母体照顾

消费主义的盛行和互联网技术与新媒体的发展,也给妇女健康带来了新的挑战和风险。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当下,医疗服务也具有了消费品的一般特点,有学者揭示了医疗服务中的“诱导需求”现象和“虚假需求”现象^[19]——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传统性别角色期待、医学技术的工具理性与资本合谋的结果,是由外在社会制造并强加给人们的各种对“现代生活方式”的想象和欲望。美国学者格布纳(Gerbner)曾与其同事在观看了十年美国电视上有关健康与医学的信息后发现,电视上有诸多被扭曲及偏颇的相关内容,于是力劝健康照护专家检视电视节目中的健康信息,以了解健康议题如何地被描绘和误导^[20]。如,就妇女产后健康而言,在“密集性母职”之外,流行一种“密集性的母体照顾”^[21]——媒体中关于孕产期妇女整形塑身、美容美体、子宫紧缩、阴道紧致等的宣传和诱导,将母体禁锢在客体的论述位置,使得孕产期妇女的身体(包括外在容貌、身材、性器官与内在气质等)都被关注、被监控,

这亦成为妇女产后身体焦虑和社会紧张的因素所在。此外,日常生活中的科学育儿、婴幼儿消费品、母职经验、化妆品、保健品、形象塑造等广告的存在,以及各类教育广告的陡增并呈现出一种“母职经纪人化”的新特征^[22],都给妇女身心健康带来诸多影响和风险。

福柯曾指出,身体本身就是权力作用的场所。在消费主义盛行下,女性的身体经验在信息不对称之下的各种权力、市场与资本的合谋下,成为身体规训和刻板印象的客体性母体。因此,改变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和观念、建构科学合理的市场监管机制、规约引导媒体“把关人”的性别意识、警醒被蒙蔽的医疗消费者、引导妇女的正确健康观并提升其健康素养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七、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妇女健康

城镇化进程中家庭的离散化、亲属网络的碎片化和人的拆分式再生产^[23]给妇女的健康状况带来了深刻影响。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妇女工作—家庭平衡以及精神压力负担将会加重,其工作角色与家庭照顾角色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更为明显,这些既有力地推动了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生活方式的转型与发展,同时又以一种非常深刻的方式重构妇女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性。

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已有较多学者分析了“农业的女性化”和“女性的农业化”、农村留守妇女身心健康、女农民工身心健康与社会适应等问题。有学者利用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检验了我国人口流动过程中的两种健康选择机制——“健康移民”(healthy migrant)效应和“三文鱼偏误”(salmon bias)效应。一是城乡流动通过流出和返乡的选择机制,从农村地区不断选择健康的年轻劳动力流向城镇。二是城乡流动经历对流动者的健康状况具有明显的不利影响^[24]。疾病和受伤往往会迫使农民工返乡,沉重的医疗负担被转嫁到农村家庭。对于妇女来说,其一,她本身是外出流动的农民工的一员——流动妇女;其二,她往往是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照顾者——

留守妇女;其三,她往往成为照顾这些“病人”的照顾者——家庭健康照顾者。

我们的相关研究也发现,农村妇女的健康处于性别和地域双重不利的地位,就健康水平、疾病及时治疗率、健康服务和健康意识而言,农村妇女的健康位次均是属于低位的^[25]。这告诉我们,农村妇女尤其是农村老年妇女应成为健康促进活动中最重要的目标人群。随着国家战略和规划——《“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是否可以促进妇女的健康发展,提升妇女的健康水平和健康保障?如此看来,具有社会性别意识的健康政策促进就显得尤为重要。

八、定量、质性与大数据研究:新方法探索

第一,进一步完善指标测量和定量研究。不断探索更为科学的健康测量方法,并不断完善健康的测量维度。一是将社会适应性这一重要维度纳入妇女健康考量,从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性等维度全面测量妇女健康。二是探索更为客观、科学的测量方法,如哈佛大学加里·金等研究人员提出的虚拟情景锚定法(Anchoring Vignettes)^[26],这一方法不仅收集自评结果,还加入虚拟情景题,使得健康测量更为客观、更具有可比

性。第二,不断增强质性研究和疾病叙事研究。质性研究和疾病叙事能够为健康研究提供较为微观、独特而细致的研究,医疗人类学家创造性地以疾病叙述作为研究的重要视角与方法,将病人的身体体验置于其个人生活史中理解,不仅可以从病痛者视角诠释疾病的意义和社会生活背景,还突出了病痛者的主体性^[27]。通过疾病叙事,妇女可以细致地描述本就不可分割的身心感触与经验,进而发现其苦痛的社会文化隐喻。第三,加强妇女健康医疗大数据的应用研究。抽样问卷调查具有局限性,而医疗大数据则有助于我们清楚地了解什么人(不同阶层、群体、年龄等)患病,患何种疾病,疾病变化的未来趋势如何,并对呈现全生命周期的健康——如孕产期、儿童期、青春期、更年期、老年期等关键时期和关键事件至关重要。因此,加强妇女健康医疗大数据的应用研究就显得尤为急迫和重要。

社会性别是在时间/历史的过程中建立的一种脆弱的身份和角色,它通过生活方式、程式化的重复行动在一个规训的空间里建制,从而产生健康的性别塑造与性别惩罚。因此,对于妇女健康的研究和探索,也应将致力于进一步结合社会文化环境,不断探索新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

[参考文献]

- [1] VERBRUGGE L M. Females and illness: recent trends in sex differences in the United States[J].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1976, 17(4): 387-403.
- [2] VERBRUGGE L M, WINGARD D L. Sex differentials in health and mortality[J]. Women & health, 1987, 12(2): 103-145.
- [3] 王金玲. 中国妇女发展报告(妇女与健康)[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22.
- [4] 王金玲, 姜佳将. 转型与发展: 福建妇女社会地位研究(2000—2010)[M]. 北京: 中国妇女出版社, 2013.
- [5] 胡幼慧. 三代同堂: 迷思与陷阱[M]. 台北: 巨流出版社, 1995.
- [6] 世界卫生组织. 关于老龄化与健康的全球报告[R]. 瑞士: 2015.
- [7] AUERBACH J D, FIGERT A E. Women's health research: public policy and sociology[J]. Journal of health & social behavior, 1995, 35: 115-131.
- [8] ABBOTT P, WALLACE C.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feminist perspectives[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 [9] 郭戈. 愉悦与病痛——女性身体话语的两种路径[J]. 贵州社会科学, 2016(5): 90-94.
- [10] 德吕勒. 健康与社会[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9.
- [11] 王甫勤. 社会经济地位、生活方式与健康不平等[J]. 社会, 2012(2): 125-143.
- [12] 石智雷, 吴志明. 早年不幸对健康不平等的长远影响: 生命历程与双重累积劣势[J]. 社会学研究, 2018(3): 166-246.

- [13] 吴小英. 回归日常生活:女性主义方法论与本土议题[M].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1.
- [14] 沃林斯基. 健康社会学[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 [15] 全球试管婴儿已超800万[N]. 人民日报,2018-07-16(22).
- [16] ABBOTT P, WALLACE C.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feminist perspectives[J]. Science, 2005, 107(2771): 146-147.
- [17] 孔德猛, 常春, 左金磊. 从子宫工具化的视角对国外代孕生育的研究[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18(7): 84-91.
- [18] 姜佳将. 妇女健康研究的三大新议题[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9-01-09.
- [19] 路绪锋, 张珊. 让医疗服务远离“虚假需求”的陷阱——马尔库塞“虚假需求”理论的启示[J]. 医学与哲学, 2015(3): 65-67.
- [20] MARY S. LARSON. Health related-messages embedded in prime-time television entertainment[J]. Health communication, 1991, 3(3): 175-184.
- [21] 陈婷玉. 当妈妈真好——流行妇幼杂志的母职再现[J]. 女学学志: 妇女与性别研究, 2010, 26.
- [22] 杨可. 母职的经纪入化——教育市场化背景下的母职变迁[J]. 妇女研究论丛, 2018(2): 79-90.
- [23] 金一虹. 流动的父权: 流动农民家庭的变迁[J]. 中国社会科学, 2010(4): 151-165.
- [24] 牛建林. 人口流动对中国城乡居民健康差异的影响[J]. 中国社会科学, 2013(2): 46-63.
- [25] 王金玲, 姜佳将. 中国妇女发展与性别平等面临的五大挑战——以福建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为例[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30(5): 64-69.
- [26] KING G, MURRAY C J L, SALOMON J A, et al. Enhancing the validity and cross-cultural comparability of measurement in survey research[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03, 97(4): 567-583.
- [27] 克兰曼. 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M]. 上海: 三联书店, 2008.

Gender and Health: New Situations, New Challenges and New Issues

JIANG Jia-jiang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Zhejia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Hangzhou 310025, China)

Abstract: The health status of women is one of the core indicators to measure the status of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level of social welfare in a country.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economy, society, biology, technology and research environment, women's health research also faces more new situations and challenges. Such as, women's subjective health and unique expression of experience; health damage caused by aging, empty-nest and caregiver role; gender and social roots of pain, chronic disease and sub-health; lifestyle and women's health in the perspective of daily life; social ethics and women's health under technological change; intensive maternal care under the prevailing consumerism; rural women's health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quantitative, qualitative and big data research.

Key words: women; health; subjectivity; social roots

(责任编辑 赵莉萍)

· 女性与社会发展研究 ·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编委会换届会议综述

赵莉萍

(山东女子学院, 山东 济南 250300)

摘要:2019年5月30日,《山东女子学院学报》编委会换届会议在山东女子学院成功举办。编委会委员听取了《学报》最近四年的工作总结,并通过了《学报》新一届编委会委员名单。新一届编委会委员从不同的角度和学术视野出发,为《学报》发展建言献策,从《学报》的方向定位、专题策划、栏目设置、作者队伍建设、编辑队伍建设、学术和价值引领作用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此次会议的召开对凝练学校办学特色、推进学校学科融合发展、打造学校高端学术平台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山东女子学院学报》;编委会;发展;综述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9)05-0043-04

2019年5月30日上午,《山东女子学院学报》编委会换届会议在山东女子学院召开。此次会议是在山东女子学院凝练办学特色、推进学校学科融合发展、打造学校高端学术平台背景下举办的重要学术活动。来自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中华女子学院等科研院所和知名高校的编委就如何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办好《山东女子学院学报》(以下简称《学报》)进行了深入探讨。学校党委书记郭翠芬、校长兼编委会主任盛国军,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各院部行政负责人、妇女研究与发展中心全体人员参加了编委会会议。会议由郭翠芬主持。

郭翠芬首先对出席会议的专家表示了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并向与会专家介绍了我校的基本情况、建设“百年女大”的发展愿景,以及“12345”总体发展思路。郭翠芬说,今天召开《学报》编委会换届会议,也是想借助《学报》这个平

台和载体集中全国知名的专家学者,希望专家们能在《学报》发展、女性研究、女性教育等方面给予我们指导,这对我校的特色发展将有重要促进作用。

盛国军从学术影响力、服务学校发展、工作举措、存在的问题、改进措施等五个方面对《学报》(2015—2018年)工作作了总结。他特别强调,《学报》四年来的影响因子显著上升,社会影响力逐步扩大。根据知网统计,《学报》复合影响因子2017年比2014年增长20.9%;期刊综合影响因子2017年比2014年增长53%;Web即年下载率2017年比2014年增长194.7%;人文社科影响因子学科排序2017年比2014年提高了267个名次。

随后,郭翠芬宣布了《学报》新一届编委会委员名单,并向与会者介绍了编委委员:华中师范大学王俊教授,中国妇女研究会副会长、我校“特聘教授”叶文振,厦门大学朱孟楠教授,复旦大学

任远教授,中华女子学院刘伯红教授,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副所长杜洁研究员,我校宣传部部长李君教授,我校科研处处长李缨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杨菊华教授,北京大学佟新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宋少鹏教授,南京大学陈友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郑真真教授,厦门大学胡荣教授,南开大学侯杰教授,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副所长姜秀花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夏吟兰教授,上海师范大学董丽敏教授,西安交通大学靳小怡教授。盛国军为与会编委姜秀花、叶文振、刘伯红、侯杰、佟新、杨菊华、任远、李缨等分别颁发了聘书并合影留念。

新一届编委会委员对《学报》在夯实学报质量、培育作者队伍、推进性别平等进程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并结合《学报》现状展开了热烈讨论。各位编委从不同的角度和学术视野出发,为《学报》发展建言献策,从《学报》的方向定位、专题策划、栏目设置、作者队伍建设、审稿专家库建设、编辑队伍建设、学术和价值引领作用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

我校“特聘教授”叶文振从个人的角度向百忙中远道而来的各位编委表达了诚挚的谢意。他说,自己作为“特聘教授”在学校工作了一段时间,感受到了山东女子学院发展的巨大潜力、良好的氛围,全方位地感受到了学校的特色。学校的办学理念是走特色发展之路,这是很好的战略选择,学校也具备了办好女子高校的基础和实力。针对办刊,他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要对《学报》发展有信心。《学报》已经有了很好的办刊基础,我们要在此基础上作梳理以总结《学报》的优势和短板,并对《学报》的发展方向进行更准确的定位。全校教职工都应关心《学报》的发展并参与到它的建设当中,用各种资源来支持《学报》发展,因为它是学校非常重要的窗口,通过这个窗口可以让更多人认识学校。二是要将《学报》工作纳入学校特色发展战略中来进行统筹规划,整合全校各种力量来助力其发展。《学报》可以凭借特色发展来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并实现三大对接:首先是对接当前的性别研究热点,及时参与并作出反应;其次是对接并引领女性学

的学科建设,特别是要关注其理论和方法论的讨论,要对女性学学科建设的每一步都有所反应;再次是与多学科进行对接:与传统学科进行友好的合作和融合。希望女性学能够融入到各个传统学科中去,而《学报》应该在女性学和其他学科的融合方面作出努力。三是坚持开放办刊的思路,《学报》可以与其他研究机构进行合作,形成多渠道支持下的融合办刊模式。在《学报》办刊中,不仅邀请校外的专家做编委,也可以考虑实施稿件外审制度;同时也要加强与相关业务部门的联系;要向名栏名刊学习,汲取其办刊经验并获得专业指导。

姜秀花结合其在《妇女研究论丛》编辑部的办刊经历分享了宝贵的办刊经验。她认为,办好刊物需要多种力量的共同参与。她强调“内容为王”,内容是办好刊物的主攻方向,刊物内容是其实现规划目标的坚实基础。总之,要从刊发文章的质量入手来提升办刊水平,《学报》内容质量提高之后自然会被学术界和期刊评价机构注意,所有的办刊机制都是服务于刊物内容的。关于怎样做好内容,她指出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一是要明确编委的职责。编委可以每年帮助《学报》提出有关选题计划并策划组稿。另外,稿件质量的把关也可以充分让编委参与进来,把编委的作用发挥到最大。二是《学报》要形成自己的特色。要在对其他女性学术刊物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寻找适合本刊发展的议题,考虑在栏目设置方面进行突破,这方面可以结合当今有关重大事件和妇女的重大诉求等新的增长点来设置。将研究领域新的增长点作为《学报》的一个着力点来打造,在这方面发挥其学术引领、价值引领和政治引领的作用,体现学校和《学报》的特色;另外也应该结合学校的有关学科来设置议题以形成《学报》的特色。三是要充分听取刊物学术评价机构的建议。刊物应与外界建立多向联系,除了向其他优秀刊物学习以外,还可以向期刊评价体系的专家请教,听取他们的意见,并与其建立稳固的联系,这对达成办刊目标至关重要。

刘伯红从读者的角度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刊物内容上要有国际视角,要在全球化视角和

框架下来设置议题。在全球化背景下,全人类都在探索可持续发展和推进性别平等的路径,刊物应该关注国际方面有关的争论并和国际上形成对话。国际上的性别热点议题都应该在国内有所反应,刊物可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我们办刊不应只是为了办刊,而应该有情怀和追求,要思考怎样通过刊物促进学科重建和文化改革。二是要考虑怎样引领社会热点问题。关于选题,她认为,虽然学科间的交流、交融、对话都非常重要,但《学报》要有自己明晰的理论框架和价值取向,以及明确的办刊目标,这直接影响刊物的学术质量。三是要对相关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进行专题策划。组织专题和议题前期应该有充分的讨论,要提前做好策划,甚至可以召开研讨会深入讨论。《学报》要有立场和底线,而不是被别人牵着走。四是建议近期设立“北京+25”专题栏目,从不同角度切入来研究性别问题。

佟新谈了四点看法。首先,她同意姜秀花副所长所说的“内容为王”的观点,《学报》首先要做好内容。在当今互联网时代,刊物如何利用新媒体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践行。网络版及时、快捷,非常方便阅读,也方便编委把摘要等推送给相关研究人员,利于《学报》扩大影响,所以,《学报》应加强网络版建设。作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专家委员会的专家,她建议《学报》首先要努力进入参评期刊的名单。其次,将特色栏目进行重点培养。要抓住机会使有关研究者注意到《学报》并投稿给我刊,这对他们而言也是一个发表学术成果和进行学术交流的平台。再次,有一个现实存在的矛盾,虽然《学报》是一个很好的学术阵地,但是因为不能进入一些评价体系,就影响了某些学者的投稿热情。从学校角度来说,是否可以考虑先给它地位,比如学校是否可以先将其认同为C刊。最后,《学报》要充分调动编委的积极性并给其提出任务,比如编委要每期向有关转载期刊推荐稿件。

任远认为,期刊建设是学校一体化发展的一部分。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刊物的内在追求应该是什么,而不应该因为去追求成为核心期刊而丧失了对刊物本身的内在追求。他认为,刊物建

设的核心问题是要把刊物打造成现代女学的平台。而要使其成为现代女学的平台,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怎样利用这个刊物来推进学科建设,并整合已有的学科来形成有特色的现代学科。学校学科建设需要摆脱原来学科框架下的分兵作战模式,把本校的学科进行整合,并通过整合来重新构造出一个知识生产链。二是学科共同体可以依靠刊物来建设,并且刊物本身有责任使学界的共同探讨形成研究力量。三是刊物要组织丰富的学术研讨活动,为青年学术新锐力量搭建展示成果的平台,而学术平台同时也可促进人才的成长和刊物的成长。另外,站在更高的角度上来说,更要考虑刊物为中国的妇女发展甚至为中国的社会发展作出怎样的贡献,树立怎样的研究理念。如果刊物的理念是引领学科的发展,引领有特色的学科建设,那么它成为核心期刊也是水到渠成之事。

侯杰认为,女子学院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最近十几年,全国妇联一直在推动妇女/性别研究的主流化。一方面,对学校来说,学校的重点是发展特色学科,女性学其实也是我们学校的生命线。所以我们可以借助《学报》的平台扩大学校影响,并且把海内外的优秀成果集中到我们《学报》和学校;另一方面,要使《学报》和学校的发展紧密结合。《学报》要精心设置栏目,并通过笔谈或对话的方式紧跟热点议题;《学报》要成为学校发展的内在动力,要动员学校教职工一起把研究作好。从《学报》角度来讲,要引领学术的发展,只要是适合《学报》发展并符合中国国情的内容,就可以做适当的规划来予以关注。关于国际领域的学术成果,可以就不同议题做综述,把《学报》变成国际研究成果的发布源。同时,也可以组织相关的学术活动,就一些议题展开讨论、付诸实践,并转化成我们的栏目内容。同时,也要对相关学术期刊作系统分析,学习其宝贵的办刊经验。编辑队伍的建设也很重要,要团结编辑队伍以形成合力;在新媒体时代,要为编辑营造更好、更宽松的成长环境。

盛国军在总结时指出,这是一次很有价值和意义的会议,具有超越性和前瞻性,各位专家的

发言都非常具有启发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有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色彩,令人感受到学术交流的愉悦。他认为,专家学者们提出的意见、建议,从不同的角度带给我们启发和思考,甚至专家们看法不完全一致的一些思想、观念、方法,也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们一定要认真、仔细、全面、客观地去分析。有一些问题我们当前可能暂时解决不了,但它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也非常大。比如,《学报》刊发的文章在我们学校能否算作核心期刊,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不同的学术价值观就会在这里碰撞:学校从事女性研究的教师可能会赞成,而与妇女/性别研究距离比较远的,比如理科的教师,可能认为这样做不太合适。这种讨论虽然有争议,却非常有意义。这启发我们要从一种科学的、合理的,而且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的,符合学校长远建设发展的角度去解决这个问题。关于我们这个层次的《学报》应该怎么办刊,刚才专家都提了一些非常好的建议,我们应尝试多种模式的办刊方式。《学报》在层次定位、目标、学术风格,以及语言的表达方式上,都应该追

求自己的风格,这样才能形成刊物的特色。盛国军也赞成“内容为王”,认为没有好的内涵和学术基础,一篇论文就没有刊发的价值。《学报》发展要避免重点大学学报,办符合我们自己层次的特色期刊。他说,会后我们还会根据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把妇女/性别研究思路和学校的学科建设、科学研究结合起来,凝练出自己的办学特色。学校要通过特色来强化它在社会上的影响,学校最重要、最核心的还是学科和专业,离开了学科和专业,特色只能是纸上谈兵,不会得到社会的认同。他强调,编辑部要把会上专家的意见分别整理出来并加以研究,贯彻到下一步的具体办刊行动中,该修正的修正,该重新定位的重新定位。

此次编委会的召开,为《学报》的未来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学报》将在各级主管部门的正确领导下,在新一届编委会委员的关心支持下,进一步提升办刊质量,尽快实现既定目标,为促进全省乃至全国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Summary of the Editorial Committee's Reelection Meeting of *Journal of Shandong Women's University*

ZHAO Li-ping

(Shandong Women's University, Jinan 250300, China)

Abstract: Aiming to ascend our university's educational characteristics, proceed the combin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various disciplines, and build a high platform of academic research, the reelection meeting of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of *Journal of Shandong Women's University* was held successfully in Shandong Women's University on May 30, 2019. The last four year's work summary of the *Journal* was presented and the list of new editors of the *Journal* was pronounced at the meeting. Members of the new editorial committee proposed lots of constructive, specific and feasible suggestions in terms of the Journal's development, including the Journal's direction and orientation, designing and setting of special columns, cultivation of writers and editors, and its leading function in research and values.

Key words: *Journal of Shandong Women's University*; editorial committee; development of the *Journal*; summary

(责任编辑 赵莉萍)

· 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专题研究 ·

娜拉与五四文学中的现代女性范式建构

栾荷莎

(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1918年,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被引入中国,对中国现代女性范式的建构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五四大背景下的社会政治与意识形态有利于该作品在中国的接受;该作品也为五四时代的妇女解放思潮增添了重要的话语和行为范式。在文学创作领域,中国现代作家尤其是女性作家从《玩偶之家》中汲取灵感,对“娜拉为何出走”以及“娜拉出走后怎样”这两大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入观察与思考,建构了不同的本土化的“娜拉”范式,为现代妇女解放揭示了不同的路径与困境。

关键词:五四文学;娜拉;现代女性范式;妇女解放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9)05-0047-07

一、娜拉与五四妇女解放思潮

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直接导致了五四运动的发生,从最初的学生爱国运动迅速蔓延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并与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融合在一起,成为对中国社会影响极其深远的一次文化领域的革命,标志着现代中国的开端。五四运动并非简单的父代与子代之间的观念冲突,而是已经成气候的“子”的文化试图废黜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父”的文化^[1]⁴,是青年中国与老旧中国激烈的对抗,它虽然没能彻底撼动旧制度与旧思想,但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五四运动的主要目标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同时也揭露传统思想对女性的压迫。现代女权思想在这一时期空前高涨,妇女解放成为贯穿整个五四时期的重要主题。青年领袖们发起了对女性问题的讨论,并开始系统地宣扬女权思想。1918年,在新文化运动的阵地《新青年》杂

志上,胡适开设了一个“易卜生专号”,并且跟罗家伦一起翻译了亨里克·易卜生(Henrik Ibsen)的《娜拉》(其后来一般被译作《玩偶之家》)。这部作品在中国大热并开启了一个“娜拉”时代。《娜拉》的女主人公娜拉是一位年轻女性,婚后育有三个子女。她深爱着丈夫海尔茂,并未意识到丈夫仅仅是把自己当作玩偶。海尔茂得过一场重病,娜拉为了治好丈夫的病,背着他冒用垂死的父亲的名字借了一大笔钱。海尔茂的身体彻底痊愈后,娜拉要继续背着他慢慢还这笔欠款。一天,海尔茂得知了此事,对娜拉大发雷霆,辱骂她和她已经过世的父亲,责备娜拉毁了他的名声,并且要剥夺她对孩子的教育权。而当问题很快被解决后,海尔茂立即换了一副嘴脸,声称原谅了娜拉,并且愿意以后好好教育她。娜拉原本天真地以为,如果借款事件败露,他的丈夫会愿意承担一切责任,而她不愿意连累丈夫,早就打算好了由自己来承担一切后果。事情发生后,丈

收稿日期:2019-06-18

作者简介:栾荷莎,女,黑龙江大学西语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女性主义与海外汉学研究。

夫的态度令她震惊和失望。她终于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自私伪善的丈夫的玩偶而已,于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离开家庭。

娜拉最后摔门出走的一幕大快人心,因此也深入人心,它恰好满足了五四一代叛逆青年对于挣脱传统家庭禁锢的期待。娜拉的宣言“我首先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2],与娜拉的出走一道,为五四以来的妇女解放思潮提供了强有力的话语范式和行为范式。娜拉在中国迅速成为妇女解放和个性解放的象征。一时间涌现出众多的“娜拉剧”。为了逃脱包办婚姻,众多五四青年男女叛离父亲的家庭,“出走”成为一种社会风尚。

胡适作为《娜拉》的译者和易卜生研究专家,亲自操刀写了一个剧本,名为《终身大事》(1919年)。该剧本的情节较为简单,女主人公田亚梅是一名留过洋的现代女性,她爱上了陈先生。但她的母亲出于封建迷信思想,首先反对这门亲事。她的父亲虽然不迷信,但却固执于祖宗祠规,认为“田”与“陈”本是同姓,因此也反对二人结合。最后,田亚梅跟陈先生离开家,留下了一张字条:“这是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该自己决断,孩儿现在坐了陈先生的汽车去了,暂时告辞了”^[3]。《终身大事》明显受到《玩偶之家》的影响,同时也具有鲜明的本土化特征,尤其揭露了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在中国社会的根深蒂固。另外,这部作品的细节之处用意颇深,比较典型的是两个家庭的姓氏,“田”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意义上都意味着封闭,代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农业文明,是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老旧中国的象征。当时的个体若想获得解放,似乎只有像娜拉一样出走才能突围。

二、死者“娜拉”

五四时代的作家们一方面鞭笞老旧中国,揭露旧社会对当时的妇女犯下的滔天罪行,另一方面,他们也建构了为自由、尊严而抗争的新女性形象。孟悦和戴锦华在《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一书中把五四文学概括成“两个死者,一个镜像”:其中一个“死者”是鲁迅笔下的旧

女性祥林嫂;另一个“死者”是鲁迅笔下的新女性子君;镜像是娜拉^{[1]8-13}。祥林嫂可以说是最典型的中国传统妇女受害者形象,她生平遭遇诸多不幸,只知道一味顺从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最后落得个悲惨的结局;而子君则是五四一代新女性的典型,虽然也曾反叛过,追求过自由爱情,还发出宣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4]但与爱人涓生同居后陷入经济与生活的窘境,仍不免英年早逝。可见当时社会留给女性的生存空间仍然十分狭窄,无论是顺从还是叛离,女性的生存都充满艰辛。

五四时期,中国出现了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女性作家,其中有庐隐、冯沅君、陈衡哲、凌叔华、冰心、石评梅等。这些女作家直接受益于20世纪初女子教育的制度化,她们接受了现代教育,拥有中国或西方大学文凭。“娜拉出走”是贯穿整个五四女性文学创作的一大主题。女性作家们关切当时女性的解放路径与困境,建构出多种本土化的“娜拉”范式。

冯沅君的三部曲《旅行》(1923)、《隔绝》(1923)和《隔绝之后》(1923)是作者根据表姐的婚恋经历以及自己的某些经历而进行的创作,讲述了一个女青年为反抗包办婚姻和追求自由恋爱而进行的生死抗争。这三部作品虽然各自独立,但放在一起则成为“同一对男女主人公的一部情节连贯的有头有尾的五四青年爱情三部曲”^{[5]30}。在《旅行》中,一对叛逆的青年男女私自去旅行;在《隔绝》中,出走多年的女儿回家看望年迈的母亲,母亲却把她囚禁在房间中,逼她嫁给刘家财主的儿子;在《隔绝之后》,刘家迎亲的日子到来,一对恋人被迫自杀殉情。事实上,冯沅君的表姐进行过绝食反抗,最后家人答应了她的婚姻自主要求。但在《隔绝之后》,作者给一对恋人安排了惨烈的结局,是对传统礼教更有力的控诉,表达出捍卫婚恋自由的决心。这几个文本充斥着五四时代典型的宣言式话语,如“身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牺牲,不得自由我宁死。人们要不知道争恋爱自由,则所有的一切都不必提了。这是我的宣言。”^{[6]2}“我们要立志实现 Ib-

sen, Toltoy 所不敢实现的……”^[6]7 值得注意的是,在作品中,父亲是缺席的,母亲代替父亲成为封建礼教的执行者。母亲向来何等慈爱,但是在女儿的婚恋问题上却变得异常残酷。女儿在新思想和旧风俗之间被撕裂,在男女之爱和母女之爱间被撕裂,在逃离计划未果的情况下只好以自杀来成全爱情与孝道。

值得注意的是,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年轻女性自杀潮成为贯穿整个民国时期的突出的社会现象。在此期间,女性自杀人数明显超过男性。自杀女性中既包括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女性,也包括传统妇女;既有城市女性,也有农村女性。其自杀的原因主要是婚恋不自由、家庭问题以及生计问题^[7]。在五四文化激烈变革时期,年轻女性们接受了先进的思想,而家庭观念和社会结构却严重滞后,导致了其无法化解困境,从而选择自杀^[8],这是“五四”女性自杀潮产生的深层社会根源。

女性离家出走在当时的西方也是一个重要议题,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就这一议题发表过看法。在1929年出版的《一间自己的屋子》中,伍尔夫提到16世纪西方女性的绝境。她假设莎士比亚有一个妹妹,跟莎士比亚有一样的天赋和热情。桀骜不驯的哥哥去伦敦寻求出路,最终因为才华而出人头地。妹妹从小没有像哥哥那样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十六七岁时家人就给她指定了婚姻,她拒绝了。父亲为此打了她,逼她结婚。于是她离家出走来到伦敦,渴望成为一名戏剧演员。但女性在当时不能成为演员,演员经理对她动了怜悯之心而接纳了她。但随后,她发现自己怀孕了。最后,她在一个冬夜自杀。伍尔夫悲叹道:“在16世纪出生的任何一位具有了了不起的天赋的妇女都必然会发狂、杀死自己,或者在村外的某个孤独的茅舍里了结一生。”^[9]在伍尔夫时代,女性在家庭中的传统角色并未有实质性的改变。女性仍然无法拥有自己的一间房间。社会对女性仍然持排斥态度,这从伍尔夫提到的大学图书馆不允许女性进入这一事实中可略见一斑。可以说,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女性的出路问题是当时的一个普遍问题。

三、独身者“娜拉”

中国的“娜拉”们叛离了父亲的家庭,这只是走向自由的第一步。中国传统“三从四德”(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惯性力量在五四时期仍是阻碍妇女解放的桎梏。在逃离了父门之后,中国的“娜拉”们或在父权社会中迷失,或在婚姻中迷失。事实上,父权仍然强大且绝不仅仅体现在父权制家庭当中。“娜拉”们要想获得真正的解放就需要突出重围,而多数新女性在追求解放道路上都止步于婚姻。

然而,女作家们笔下的“娜拉”仍在跌跌撞撞地开辟新的可能性。如果说冯沅君的《旅行》和《隔绝》均是第一人称叙事,经常使用复数“我们”,体现出五四青年男女在婚姻自由的抗争中结成“叛逆之爱的精神同盟”的话^[5]31,那么庐隐和陈衡哲笔下的女性已经不再毫无保留地信任这种脆弱的精神同盟,而是个体意识有了进一步的觉醒,并因此陷入更深的孤独。其中女性人物露沙和洛绮丝是两个选择独身的“娜拉”。

在1925年发表的《海滨故人》中,庐隐揭示了具有现代精神的女青年和依然无处不在的传统力量的不相容,勾勒出受新旧思想撕扯的苦闷彷徨的时代女性形象。庐隐在小说中把几个青年女学生聚集在一起,组成一个封闭的女儿国,但这个小世界最终受到男性入侵并解体。故事一开始,同一个学校的五个女学生正在一起度过无忧无虑的暑假。但很快,她们接二连三地被婚恋问题卷入到愁云当中,她们要获得婚姻自主权并非易事。故事的第一女主人公露沙得了“哲学病”,露沙性情孤僻,人生观很消极。她找不到生命的意义,因此陷入到忧郁与悲观当中;她不信任他人,甚至在唯一的亲人病逝后,仍然拒绝了所爱之人的求婚,宁愿孤身一人。跟露沙一样,故事中的其他几位女孩也被“哲学病”所折磨。她们是受到过良好现代教育的新女性,但她们的的人生观跟父母一辈的人生观相冲突,在生活中仍然没多少选择的自由和权利。她们把这些愁烦归咎于现代教育,发现自己受教育越多,精神越痛苦,越与世界格格不入。值得注意的是,庐隐笔下的年轻女性们不再天真地、义无反顾地把自

已托付给男性,哪怕是自己挚爱的男性。

陈衡哲——五四以来的第一位女作家,也是中国第一位女教授——在《洛绮丝的问题》(1924年)中,虚构了一个西方世界中的女性人物。哲学博士洛绮丝与著名教授瓦德相恋并订婚。但洛绮丝担忧婚后家务劳动和子女教育等会妨碍自己的事业发展,最后与瓦德协商取消了婚约。瓦德理解洛绮丝,很快跟别人结了婚。洛绮丝则独身一人,潜心于学术研究。人到中年的时候,洛绮丝已经是一名享誉世界的哲学教授。但她为牺牲了爱情和婚姻而感到痛苦:“她此时才明白了她生命中所缺的是怎么了,名誉吗?成功吗?学术和事业吗?不错,这些都是可爱的,都是伟大的,但它们在生命之中,另有它们的位置。它们或者能把灵魂上升至青天,但它们终不能润得灵魂的干燥和枯焦。”^{[10]65}最后,她不得不接受生命中的这种残缺。这种家庭与事业之间的撕裂只有在像洛绮丝这样的女性身上才有,而男性无需受此折磨。接受过西式教育的五四女作家认同核心家庭,但即便是核心家庭,仍然把女性封闭在家庭琐事中,妨碍着女性的个人发展。中西方的女性在家庭与事业之间皆有着不同程度的撕裂,选择自身发展的女性最终也难免落入孤独。

四、欲望者“娜拉”

五四期间,很多问题都是第一次从女性视角被探讨。然而,女作家们有意或无意地规避了女性的身体和性欲问题。在冯沅君作品中,叙述者反复强调自己与爱人之间的纯洁。文中省略号的多次出现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叙述者虽然大胆追求自由恋爱,却在男女问题上遮遮掩掩,连诸如“结婚”“夫妻”这样的字眼都需要用省略号来代替,而“接吻”一词则用英文“kiss”来代替。值得注意的是,同时期的女作家凌叔华在短篇小说《酒后》中也是自始至终用“kiss”代替“接吻”。如此看来,无论五四女作家笔下的“娜拉”们有多叛逆,她们仍要保持肉身的纯洁,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抵御外界的攻讦,保持叛逆爱情的神圣性^{[5]34}。根据孟悦和戴锦华的观点,五四的女儿们还没有足够的心理和文化积淀,也没有足够的

勇气来跟童年说再见,因此,她们的反抗是典型的女儿的反抗,她们的文学创作“充满了青春、骚乱、幻想、脆弱、幼稚和肤浅,不具备成人那种老辣坚定的目光。”^{[1]16}

到了五四后期,女性文学的丰富性和深刻性有了显著提升。诸多作家笔下的女性人物变得更加立体丰满,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成为矛盾的统一体。女作家们开始冲破禁忌来展示女性经验,甚至女性性欲。她们笔下的女性在不停地跟自己的欲望和男性的欲望周旋,往往在逃离了一种欲望的陷阱后又陷入另一种欲望的陷阱。

这一时期,丁玲在文坛崭露头角,其作品比陈衡哲一代更为复杂、细腻和成熟。丁玲笔下的女孩们已经不再受到父权家庭的禁锢,而是享有更多的自由,但她们的痛苦和绝望却并未因此而减轻。《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丁玲的一部中篇小说,其体裁是私人日记,通过向私人日记倾诉的方式展现了一名女性强烈的欲望。女主人公莎菲远离家庭,独自一人,身体孱弱,精神萎靡,却充满了激情与矛盾。一方面,她残忍地折磨爱她的弟弟——一个同样软弱而敏感的男孩;另一方面,她受到花花公子凌吉士外表的诱惑,被强烈的欲望折磨着。她明知道自己爱的只是凌吉士的迷人外表,而不是他卑鄙庸俗的灵魂,但她还是情不自禁地对他充满了炽热的情欲。她的日记里充满了她无法对他直言说的欲望:“假使他把我紧紧地拥抱着,让我吻遍他全身,然后把我丢下海去,丢下火去,我都会快乐地闭着眼等待那可以永久保藏我那爱情的死的来到。”^{[11]66}此外,莎菲多次使用精神分析术语“下意识”,莎菲的理性和被压抑的欲望之间进行着激烈的对抗,最后,理性占了上风,莎菲决定离开去另一个城市。

中国现代文学在使用精神分析术语、概念和方法的同时,也从中汲取灵感,把女性性欲内在化和主体化。莎菲的痛苦不仅仅来自被压抑的欲念,更来自她复杂的内心,就如丁玲本人一样。丁玲曾经是理想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创作《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期间经历了政治与人生理想的幻灭,过着贫困、堕落而绝望的生活。莎菲跟丁玲一样是个理想主义者,她的痛苦和绝

望并非完全因为爱情,她所寻求的是生命的意义^{[5]160}。

现代女性文学在日占时期的上海达到一个新高度。由于政治审查,作家们被限制,欲望与婚姻是其书写的重要主题。苏青和张爱玲是佼佼者,她们笔下的女性没有了五四“女儿”式的激烈反抗,而是冷眼洞察一切,以女人的姿态在家庭和社会中求得生存。苏青的小说《结婚十年》(1943年)讲述了一位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现代女性从结婚到离婚的十年历程,展示了一代新女性在婚姻中和社会上的挣扎与无助。女主人公怀青跟丁玲笔下的莎菲一样都是充满炽热欲望的女性。《莎菲女士的日记》采用的是五四时期女性文学常见的私人日记体裁,莎菲只能把全部情欲诉诸日记,而《结婚十年》采用的是自传体小说形式,女主人公怀青多次肯定女性性欲的存在。怀青在有未婚夫的情况下跟另一个同学相恋,充满少女怀春的幻想:“我需要一个青年的,漂亮的,多情的男人,夜夜偎着我并头睡在床上,不必多谈,彼此都能心心相印,灵魂与灵魂,肉体与肉体,永远融合,拥抱着在一起。”^{[12]23}然而,生活在一个半新不旧的社会里,无论女主人公在思想上有多大胆前卫,在行动上仍处处受到传统观念的制约:“我是个满肚子新理论,而行动却始终受着旧思想支配的人。就以恋爱来说吧,想想是应该绝对自由,做起来总觉得有些那个。”^{[12]24}1940年代的女性在思想上显得更为奔放,对旧思想有一种不屑的嘲讽,但行为范式跟1930年代相比并未有实质性的突破。怀青与莎菲在行为上处处体现着传统女性的矜持与被动,而男主人公们则表现出主动性和进攻性。

除了表露女性性心理之外,《结婚十年》也详尽而直白地描写了女性的诸多生理体验,如女主人公怀孕、分娩和哺乳。张爱玲赞扬苏青小说是“伟大的单纯”,而同时代的一些人则抨击苏青的小说是色情小说,还有人辱骂苏青为“文妓”,并对她的私生活有诸多揣测。的确,女性以第一人称书写几乎都会面临这个问题;读者会把小说内容与作者尤其是女性作者的私生活等同起来,甚至直接把自传体小说等同于自传。直到20世纪

末也是如此,林白的自传体小说《一个人的战争》在发表之初就被某些人视作准色情小说,有人对其私生活进行揣测。但危险之处也是其价值所在。过去,女性一直是被男性书写的客体,虽然中国古代的女性写作在近些年被发掘得愈发充分,但毕竟整个历史长河中流传下来的绝大多数是男性的创作。因此,可以说几千年来中国女性几乎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女性通过写作,尤其是用第一人称写作,能够以女性的名义让女性成为观察主体、思考主体和话语主体^{[5]157},夺回被放逐的身体与被压制的主体性。

五、战斗者“娜拉”

早在晚清,《玩偶之家》未被引入中国之前,中国女性文人已经表达了挣脱家庭束缚的渴望及投身革命的雄心。秋瑾女士曾经创作过大量具有强烈的女权意识和革命色彩的著述。她使用的是传统文体,其中弹词《精卫石》创作于1905—1907年之间,表达出对中华民族命运的忧虑以及对中华民族女性处境的羞愤之情,认为只有推翻旧制度才能实现民族解放和女性解放。在书写现实的部分,黄菊瑞和梁小玉等受传统礼教压迫的女性在西方女权的感召下走出家庭,远赴东洋求学并投身于革命。秋瑾揭示了女性命运与民族命运的紧密联系:只有女性强才能国强;反过来,只有建立一个文明的新世界,女性才有可能真正翻身。《精卫石》具有明显的自传性质,秋瑾本人也是一个“娜拉”:她对包办婚姻不满而离家去日本留学,并投身于民族革命,直到英勇牺牲。在很长时间内,秋瑾的榜样仍不失为中国的“娜拉”们的重要出路。受到过易卜生影响的郭沫若在悼念秋瑾的文章《娜拉的答案》(1942年)中写道:

脱离了玩偶家庭的娜拉,究竟该往何处去?求得应分的学识与技能以谋生活的独立,在社会的总解放中争取如女自身的解放;在社会的总解放中担负妇女应尽的任务;为完成这些任务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作牺牲——这些便是正确的答案。

这答案,易卜生自己并不曾写出

的,但我们的秋瑾先烈是用自己的生命来替他写出了^[13]。

秋瑾是中国女性文学从古典向现代过渡期间的重要作家,她奠定了现代女性文学的精神气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经动荡,女性命运不可避免地与国家命运联结在一起。1924~1927年发生了国民革命;1931年日本入侵东三省;1937年日本开始全面侵华。这些革命与战争都在号召中国男女参加战斗。面对民族危机,一些女性自愿放弃五四发展起来的个人主义而参与到战争中。

一些投身革命的女作家记录了战斗中的“娜拉”的形象。谢冰莹在其军旅生涯中写了许多战地随笔和散文,并在报上发表,同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引起了国际反响。谢冰莹一生激荡曲折,她在国民革命爆发后考取了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次年随军北伐。大革命失败后回乡,她为反抗包办婚姻再次离家出走,曾经在上海和北平读大学,并两渡去日本求学^{[14]383}。在日期间,由于拒绝拜见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溥仪而被逮捕,身心受到摧残;被遣返回中国后,她再次赴日留学。抗日战争一爆发,她立即回国参军。她的作品从一个女兵的视角向中国乃至全世界展现了“中国大革命时期如火如荼的战争生活和民众的革命热情”^{[14]383},同时也对女性解放与民族革命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思考。《一个女兵的自传》讲述了一个逃避包办婚姻的女孩参与国民革命的经历。文中提到,女孩子们参军本是为了摆脱封建家庭的压迫,但军装一穿在身上,她们立即有了民族解放的使命感。过去饱受旧礼教压迫的女兵们并没有急切地想谈恋爱,而是急于投身革命。战士们抛弃了狭隘的爱的观念,“代表着的是国家的爱,民族的爱”^{[14]120},“她们把自己的前途和幸福,都寄托在革命事业上”^{[14]120}。

值得注意的是,1940年代的丁玲在其政治立场和文学创作上有了很大的转变。此时的她已经摆脱了梦珂和莎菲时期的忧郁、迷乱与消沉。她投身革命并创作了一系列关于战争中的女性的作品,比较典型的是《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在这些作品中,丁玲塑造

的革命区女性的形象,揭露了女性问题在主张两性平等的革命区的切实存在,同时也揭露了群众对妇女存在偏见的落后思想。在《我在霞村的时候》(1941年)中,农村女孩贞贞被日军俘虏,成了日军的性奴。后来她有机会逃脱,但她选择留下来为中国部队提供情报。她因此染上了性病,最严重的时候肚子里面都烂了。有一次她接到紧急任务,夜里来回走了三十里路,她走一步痛一步,提心吊胆,怕被日本人发现,但她还是坚持完成了任务。当贞贞最终回到霞村后,却受到村民们流言蜚语的困扰。人们因为她性奴的经历和她的性病而把她看作耻辱。有人说她被一百个男人睡过,还做了日本官太太;还有人说她的鼻子都烂没了;而妇女们“因为有了她才发生对自己的尊敬,才看出自己的圣洁来,因为没有被敌人强奸而骄傲了。”^{[11]364}而贞贞却有着小村“娜拉”的特质。她天性活泼开朗,有着很强的个性。她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同情,最后拒绝了意中人的求婚,决意离开家乡去延安。她憧憬到延安后有一番新气象:“我还可以再重新做一个人,人也不一定就只是爹娘的,或是自己的。”^{[11]370}

六、结语

在五四反封建的大背景下,宣扬个性解放与妇女解放的《玩偶之家》为中国青年一代提供了反叛传统的话语和行为范式。“娜拉出走”既成为新女性的生活方式,也是现代文学尤其是女性文学创作的一大主题。然而,娜拉出走后怎样?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文学领域,现代作家们通过构建不同的“娜拉”范式来揭示妇女解放的路径与困境。其中“死者‘娜拉’”既是对封建礼教之恶的揭露和反抗,也体现出女儿“娜拉”的天真与脆弱;女作家们创作的“独身者‘娜拉’”,是对娜拉出走后“堕落”或“回来”这两个出路的拒绝;“欲望者‘娜拉’”进一步突破禁忌,让女性作为主体来展现女性经验并肯定女性性欲的存在;“战斗者‘娜拉’”则放弃自己的女性性别身份,像男人一样投身于革命,以期在民族的解放与制度的重建中获得自身的解放。这四种“娜拉”范式不但是整个五四时代的写照,而且对中国当代的妇女解放运动与文学创作也有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 [2] 易卜生.易卜生戏剧集[M].潘家洵,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87.
- [3] 胡适,施玮.胡适文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53.
- [4] 鲁迅.编年体鲁迅著作全集:插图本(1923—1925)[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416.
- [5] 刘思谦.“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
- [6] 冯沅君.春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7] 袁博.民国时期女性的自杀现象[N].团结报,2015-10-29(007).
- [8] 王晓慧.转型堕距与民国时期青年女性的自杀——以《妇女杂志》的三个案例为分析中心[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2(3):55-61.
- [9] 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随笔全集[C].王义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533.
- [10] 陈衡哲.西风[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65.
- [11] 丁玲.丁玲小说[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
- [12] 苏青.结婚十年[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
- [13] 郭沫若.郭沫若论创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709-710.
- [14] 中国现代文学馆.谢冰莹代表作[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Nor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Female Paradigm in the May 4th Literature

LUAN He-sha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In 1918, the Norwegian dramatist Ibsen's *Doll's House* was introduced to China, which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modern female paradigm. The social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the context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was conducive to the acceptance of the work in China. In turn, the work also added important discourse and behavioral paradigms to the women's emancipation trend during the May 4th period. In the field of literary creation, Chinese modern writers, especially female writers, drew inspiration from *Doll's House*. They expressed in-depth observation and reflection on the two major social issues of "Why did Nora leave?" and "What would happen to Nora after she left?", constructed a variety of localized "Nora" paradigms, and revealed different paths and dilemmas for the liberation of modern women.

Key words: "May 4th" literature; Nora; modern female paradigms; women's liberation

(责任编辑 赵莉萍)

· 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专题研究 ·

中国妇联组织的历史实践、问题与建议

辛 晔, 陈友华

(南京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46)

摘要:长期以来,性别关系处在性别意识与本土实践的强大张力之中。妇女组织在历经五四运动后的中国共产党早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及计划经济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等历史发展阶段后,新时期妇联组织存在“政治性”凸出、妇女问题“政治化”趋向、妇女工作性别“隔离”取向等问题,我们需要推动妇联组织的“社会化”与“去性别化”、妇女问题“去政治化”、妇女权益保障责任“清晰化”、家庭事务“模糊化”,并以此努力影响与改造男性,积极构建性别平等的实践范式。

关键词:妇联组织;性别关系;问题;建议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9)05-0054-06

长期以来,在性别场域下,性别关系处在性别意识与本土实践的强大张力之中。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性别关系经历了传统伦理范式、集体主义范式、市场经济范式和后现代范式四个时期。在传统儒家伦理规训下,中国传统社会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模式,塑造了贤妻良母的家庭女性形象。随着妇女解放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政治口号被用来解构传统的性别关系,颠覆传统儒家思想中男尊女卑的性别关系,与此同时,也用阶级斗争掩盖了性别关系。到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时期,女性被商业文化利用而迅速被收编为欲望化的主体,被塑造为劳动者和消费者,被鼓励从事以往以男性为主导的职业。新时期以来,性别意识继续从传统的牢笼中解放出来,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和后现代女权主义的先后兴起使得性别关系平等实现了从观念到实践的

发展。

作为在中国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组织,妇联有着有别于西方妇女组织的特点,在本土实践中,逐渐实现了从政治性部门向女性组织的转变,从妇女运动向妇女发展的转变,从妇女解放向社会性别平等与社会福利的转变,从妇女运动与妇女发展向“保护妇女的生活福利”的转变^[1]。作为嵌入于历史时代背景的妇联组织,其转型也在深刻地影响着性别关系。比如,在妇女解放运动时期,妇联推动了《婚姻法》等相关法律的出台,使得妇女从传统的性别分工中解放出来,并延伸到社区和农村,形成了社区妇联组织和农村妇联组织等基层组织。随着西方性别解放思潮的影响和激进女权主义的兴起,对性别平等关系矫枉过正,使得在部分妇联组织中出现了妇女工作性别“隔离化”“政治化”等问题,影响了婚姻家庭和性别关系的和谐稳定。

收稿日期:2019-06-22

作者简介:辛晔,女,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家庭社会学、城市社会学研究;陈友华,男,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社会学、人口学、社会工作、公益与慈善研究。

诚然,妇联组织在处理性别关系时,应致力于促进男女平等,而在本土实践中,往往是注重“妇”而缺乏“联”,过多地强调妇女的权益,而相对忽略了对男性权益的关注与保护,无益于平等性别关系的构建。为此,本文通过分析妇联组织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逻辑,探讨妇联转型的路向性问题。

一、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妇女组织

1919年五四运动后,国内各种反封建主义运动兴起,爱国主义情怀夹杂着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妇女解放对于反抗封建主义传统和集聚社会力量的重要作用日益引起关注,《新青年》上刊发了中华女界联合会的改造宣言,“纠合我们中华要求解放的女子,使我们要求的声一天一天高起来,使我们的奋斗一天一天强大起来”^[2]。1922年以后的几年间,中国共产党制定并通过了《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将妇女解放运动同民族解放运动和劳动解放运动紧紧地联结在了一起^[3]。同时,在组织领导层面,中共中央于1922年设置了妇女部,并逐步在全国8个省300个县的范围内普遍建立了妇女解放取向的妇女部、妇女工作委员会、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及女工农妇代表会^[4]。在不同的解放区也成立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妇女组织。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妇女组织,其主要呈现以下几方面特点。

第一,妇女解放运动同反抗封建主义运动相结合。这时的妇女解放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捆绑在一起,共同形成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图景。1925年发布的《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中描绘道:“处在半殖民地地位的中国妇女,包含在整个的被压迫民族之中,受帝国主义和其工具——军阀的宰割。”在1939年发布的《中央妇委关于目前妇女运动的方针和任务的指示信》中,将妇女解放运动置身于抗战建国的巨大洪流中,“在坚持抗战,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下,目前妇女运动的基本任务是:动员与组织更广大的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各方面的工作”。如果

把妇女解放同民族解放的结合作为思想指导层面的话,那么,具体实践层面则主要是妇女解放同劳动生产的珠联璧合。在1943年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就明确了发动妇女参加生产的妇女工作核心任务。

第二,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妇女早期联合组织。1922年成立了中共中央妇女部,1928年通过的妇女运动议决案中要求“自中央直至支部,必须至少有一人负妇运之责,或视相当情形组织妇女委员会”,而且要求在农民组织中也要建立妇女委员会^[3]。在1948年发布的《关于目前解放区农村妇女工作的决定》中要求“妇女代表会议是更广泛、更民主地联系妇女群众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各地各级均应有此种组织。”可见,新中国成立前,自上而下的早期妇女组织逐渐铺开,形式也不断丰富完善。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及计划经济时期的妇女组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进一步强化了对妇女组织的顶层设计,一股自上而下的妇女组织建设热浪扑面而来。1949年成立了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的妇女组织——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并于第一次全国妇代会上发布了《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章程》,将妇联定位为“争取废除对妇女一切封建传统习俗,保护妇女权益及儿童福利,积极组织妇女参加各种建设事业,以实现男女平等,妇女解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妇女组织不同的是:此时的妇联作为妇女组织的政治性明显加强,妇女解放运动同国家政治运动联系起来,将消灭封建残余思想作为解放妇女的必由之路。如195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旨在建立婚姻自由、一夫一妻和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并将这种制度作为反对封建婚姻制度的有力武器。到了计划经济时期,妇女解放又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建设和国家发展再次联姻,在第二次全国妇代会上,妇联的中心任务调整为发动广大妇女参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

国家建设^[1]。可以看出,计划经济时期妇联的发展呈现出如下两大特点:

第一,妇女解放同国家政治运动结合起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将妇女解放运动与继续反封建主义传统相结合到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建设相联结,妇联作为发动妇女的一个政治性组织,成为党和政府方针政策的落实者、执行者和得力助手^[5],妇联工作的政治化、组织化特征凸出,保护妇女权益被置于较低层次,远没有达到争取妇女权益的层面^[6]。

第二,性别平等意识初露端倪。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还是计划经济时期,尽管妇女解放运动的政治色彩浓重,以争取和维护妇女权益为出发点的工作模式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但不可否认的是,较之之前松散的妇女组织,这个时期的妇联已经从结构发展、法规建设等层面开始探索构建性别平等意识。如前面提到的《婚姻法》的颁布和妇联章程的出台,均出现了意欲实现性别平等的美好愿景,将性别平等意识的追逐藏匿在推动国家政治运动的历史背景之后。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妇联组织

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大江南北,妇联组织也进入了全面转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如何处理国家、市场和妇女的关系成为这个时期妇女工作的核心问题。动员、组织广大妇女积极参加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在提高生产力过程中寻求妇女发展成为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6]。1990年,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成立,标志着妇联组织建设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实现了妇联组织的性质由单纯的“群团组织”转变为兼具“群团组织”与“国务院行政议事、协调”双重身份的机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也更加凸显^[1]。市场经济时期,妇联组织主要呈现以下三方面特点:

第一,妇女解放运动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这一时期的妇联组织以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建设为中心工作,把争取妇女解放和维护妇女利益同发展社会生产力有机地结合起来^[6]。1978年,第四次全国妇代会工作报告确立了妇女解放与“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联系,把妇联组织定位为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后勤兵”^[1]。在之后的全国妇代会上,均把妇女工作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系作为会议主题,通过提高妇女素质解决妇女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在第十一次全国妇代会上,更是明确提出了妇联组织的“国家政权重要社会支柱作用”的新职能。

第二,性别平等实现了从意识形态到国家实践的长足发展。1988年,第六次全国妇代会就妇联的基本职能作了进一步明确,指出:“妇联应代表和维护妇女利益,促进男女平等”。把妇联重新定义为具有女权主义性质的团体^[7]。1993年第七次全国妇代会将“大力提高妇女素质,依法维护妇女权益,全面提高妇女地位,以行动谋求平等和发展”作为新时期妇女运动的内容。1998年第八次全国妇代会进一步将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作为到2010年妇女发展的总目标。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性别平等进入了具体实践阶段,妇联在广泛参与中实现了妇女的进步。

第三,妇联组织实现了从政治性向社会性的转型。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城乡经济体制改革、国营企业改革等导致的妇女就业、收入水平与婚姻家庭等社会结构紧张关系大量涌现^[1],妇女问题被定义为一项重要的国家政策议题。改革开放初期的妇代会上将发展妇女儿童事业、解决婚姻家庭矛盾、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等社会问题作为重要议题。第七次妇代会也明确要求“各级妇联要在改革中探索群众化、社会化的工作方法”,并印发了《中国儿童发展纲要》与《中国妇女发展纲要》等指导性文件,工作范式实现了从“妇女儿童工作”到“妇女儿童发展”范式的转变^[1]。与此同时,妇联组织的角色也实现了从动员妇女参与社会向呼吁社会关注妇女的转型^[8]。

四、新时期妇联组织存在的问题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妇联组织的雏形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妇联组织的建立,再到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时期它的发展壮大,可以清晰地发现,妇联的发展总是同国家的发展紧密结合,妇女的解放被裹挟在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潮流中,具有独特的历史时代特性。在新时期,随着妇女群体的日益分化、网络社会和消费社会的兴起,妇联组织存在的问题也日益凸出。

第一,妇联组织“政治性”属性凸出。纵观国内妇联组织的发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松散的妇女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立的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再到更名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联一直以国家行政组织的角色呈现,“政治性”属性凸出,尽管在市场经济时期其性质逐步转变成为非政府组织,但政治性色彩依然浓重,妇联工作的内容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均是围绕国家发展和经济建设,具有工具性职能,而争取和维护妇女权益的属性始终处于弱化地位,从“解放妇女”到“劳动妇女”,再到“消费妇女”,社会历史背景下的妇女群体的需求日益多元化、多样化,妇女问题日益多样化、复杂化,而一致性较强的妇联组织治理手段针对性较弱,不利于妇女群体诉求的有效解决。

第二,妇女问题存在“政治化”趋向。有别于国外自下而上发动的妇女组织工作,国内无论从妇联组织的建立,还是从妇女工作的开展,均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生成模式和工作模式。在工作内容上,从最初的反对封建主义传统,到后来的同国家政治运动和计划经济建设相结合,均将妇女解放作为同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作斗争的政治工具。无论在妇联组织定位还是国家实践上,都有较强的政治性色彩,在处理妇女问题时有较强的“政治化”趋向。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虽然妇联组织实现了从政治性向社会性的转型,但处理妇女问题时的路径依赖明显,妇女问题政治化而非社会化的问题依然突出。

第三,妇女工作有性别“隔离化”取向。从妇

联的发展脉络中可以看出,性别平等实现了从意识形态到政策实践的缓慢嵌入,并在反抗封建主义传统、推动国家政治运动和经济建设过程中得以推进,形成了包括《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章程》《婚姻法》《中国妇女发展纲要》等有益的国家尝试。但妇联组织成员多由女性组成,很少有男性加入,且妇联的主要领导清一色由女性担任,使得妇联所维护的不仅是女性利益,而且妇联也变成了纯粹的女性成员组织,将男性排除在了政策和制度制定之外,不利于性别平等和两性关系的和谐。

五、新时期妇联组织发展的路径建议

如前所述,新时期女性意识不断觉醒,在消费主义和新技术革命的双重催化下,妇联开展妇女工作存在的问题日益突出,不仅不利于女性的发展,更不利于性别关系和婚姻家庭的和谐,需要在推动“社会化”“去政治化”和性别平等实践等方面不断努力。

第一,妇联组织的“社会化”。前已述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妇女群体的内部分化更加剧烈,传统的“政治性”属性较强的妇联组织已无法满足妇女日益多样和复杂的需求,不同妇女群体的自我意识有较大增强,但又不完全同步,谋独立、求发展的主动性显著增强,但又存在较大差距^[8]。在此情形下,构建“社会化”的妇联组织已迫在眉睫。要逐步建立多元性妇联组织,针对不同利益群体逐步建立如农村妇联组织、基层社区妇联组织、医院妇联组织、学校妇联组织等多元组织,开展独具特色的妇女工作。同时,要根据多样性的工作内容,及时调整工作重点、思路和方法,满足不同利益群体的多样需求。

第二,妇联组织的“去性别化”。男性与女性的思维方式不完全相同。男女在很多问题上的认识差异有些是源自于性别歧视,有些是源自于男女间沟通交流不够。在性别隔离逐渐消解与性别融合不断增进的今天,单一性别组织本身导致的事实上的性别隔离,不仅不利于男女两性取长补短,而且不利于性别平等意识的培养。要意

识到妇联不仅仅是做妇女工作的,也是做家庭工作的,还是做与女性相关联的工作的。因此,要对妇联组织进行去“性别化”改造,努力吸引男性加盟妇联组织,特别是在妇联领导职位上要配备男性领导干部,努力改变目前妇联领导干部清一色女性的状况。

第三,妇女问题的“去政治化”。妇联组织孕育于早期的共产党妇女组织,历经国家政治运动时期和经济建设阶段,在处理妇女问题时存在“政治化”趋向,将妇女问题界定为政治问题,而在消费主义和新技术革命的催化下,这种粗犷的解决问题的方式给婚姻家庭和性别关系的和谐带来了阵痛。新时期妇联组织在处理妇女问题时树立性别平等意识,尊重不同性别的合法权益,实现男女双方的相互理解与相互支持。要做好处理问题的有序“入场”,在调节婚姻家庭和性别关系矛盾时,放弃妇女问题“政治化”处理的立场,以协调解决男女双方的诉求和矛盾。

第四,妇女权益保障责任的“清晰化”。性别平等与妇女权益保障不仅牵涉到男性,更牵涉到国家、市场、社会、家庭与个人在内的多个责任主体,因而需要明晰国家、市场、社会、家庭与个人在性别平等与妇女权益保障方面的责任定位与责任边界。妇联在推动性别平等与妇女权益维护工作中不仅要敦促男性、用人单位等履行相应的责任,更要进行政策倡导,努力推动国家尽责,对女性权益的保护是建立在国家尽责的基础之上的。“男女平等”基本国策需要国家财政来保障,否则就是一句空话。妇女权益维护中类似的“国家请客,企业买单”等现象,应该尽早走向终结。

例如,国家、市场、社会、家庭与个人在妇女生育中的责任定位与责任边界问题。把生育与养育的责任完全推给国家与社会,或者完全推给家庭与个人,实际上都是不合适的。生育的受益者主要是微观层面的家庭与宏观层面的国家。本着谁受益谁担责的原则,家庭与政府都应该承担在妇女生育与养育方面应尽的责任。而市场

恰恰因女性生育而受损,要求市场承担部分生育与养育的责任是不合适的。国家通过公权力把生育与养育的部分责任转嫁给用人单位特别是企业也是不合适的。中国女性在就业市场上面临的各种歧视部分带有制度构建的成分,如果女性权益保障方面的国家责任继续缺位的话,性别歧视现状将难以改变。

第五,家庭事务的“模糊化”。婚姻与家庭属于“私领域”。家庭内部更多的时候不是一个讲理的地方,而是一个讲情的地方。因此,婚姻与家庭内部的很多事情不能分得太清楚,更不能斤斤计较,而是要模糊化处理。目前,有学者反复量化并不断强调女性对家庭的贡献,暂且不论这些结果的科学性,笔者也不否认女性对家庭的巨大贡献,但仅就对家庭关系的影响而言这可能会带来很多的负面影响。因此,两性之间要更多地相互理解与支持,而不是相互指责与埋怨,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两性关系的和谐与稳定。

第六,性别平等的工作重点同时影响男性和女性。男女平等的过程实际上是男女不平等状况被打破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男性的权力与权利在某种程度上被消减,同时被要求承担更多的包括育儿与家务劳动在内的责任等,这自然会遭致部分男性或明或暗的抵制,而女性的权力与权利却在不断增长,自然地会受到女性的欢迎。因此,男女在性别平等促进中的态度不完全相同,男性可能相对消极,而女性则可能相对积极。鉴于男性在当今世界上仍处于主导地位的客观现实,妇联在促进男女平等工作中,不仅要努力去影响与改造女性,更要积极地去影响与改造男性,只有男性在思想上认同并在实践上践行性别平等,男女平等才有可能真正实现。

第七,积极构建性别平等的实践范式。传统的妇女工作有着女性弱势地位的理论预设,长期以来形成了保护女性而非维护性别平等的实践范式,随着性别意识的觉醒,这种传统的“性别隔离”的工作手段影响了婚姻家庭和性别关系的和谐。新时期妇联工作应构建性别平等的实践范

式,创新制度建设,明确国家在性别平等关系构建中的责任,为推进性别平等建设提供必要的人力保障、资金支持和基础设施建设。要实现组织结构转型,实现从“妇联”到“男女共联”的转变。传统纯女性组织的“妇联”往往将男性排除在政策和制度制定之外,不利于建立全面的维护性别平等和婚姻家庭关系和谐的政策制度,因而应当

吸纳更多的男性加入妇联组织,强化不同性别群体在政策和制度制定过程中的互通有无、互补交流,在男女共联共识的基础上推进制度和政策建设。要将男性与女性的解放共同纳入性别平等的实践之中,要实现女性解放与男性解放的共生共荣,在社会政策、制度和文化建设方面不断推动性别关系的平等和谐。

[参考文献]

- [1] 刘继同.当代中国妇女工作的历史经验、结构转型与发展方向[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7(6):80-92.
- [2]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0.
- [3] 赵明.定位与功能:转型期中国妇联组织角色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09:1-152.
- [4] 吴宝丽,吕频.中国的妇女组织[J].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1996(3):22.
- [5]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妇女运动重要文献[Z].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2-38.
- [6] 付春.性质转型、功能演化与价值变迁——建国以来我国妇联组织的转型分析[J].兰州学刊,2004(4):200-203.
- [7] 仪纓.不同的声音——一次别开生面的中国妇女组织研讨会[J].妇女研究论丛,1999(3):50-53.
- [8] 马焱.妇联组织职能定位及其功能的演变轨迹——基于对全国妇联一届至十届章程的分析[J].妇女研究论丛,2009(5):38-47.

Historical Practice, Problems and Suggestions of the All-China Women's Federation

XIN Ye, CHEN You-hua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6, China)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the gender relationship is under the powerful tension of gender consciousness and localized practice. Through analyzing the historical stages of the All-China Women's Federation: the period of early Chinese women's organization of Communist Party, the initial period of China's foundation and planned economy, and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is paper finds that All-China Women's Federation is facing problems of overemphasis on "political nature", "politicization" of women issues, "gender segregation" of women's work.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All-China Women's Federation to promote the organizational "socialization", "de-politicization" of women issues, and to construct a practice model of gender equality.

Key words: All-China Women's Federation; gender relations; problems; suggestions

(责任编辑 赵莉萍)

· 妇女史研究 ·

论华中根据地对传统婚姻习俗的改造

吴云峰

(黄山学院, 安徽 黄山 245041)

摘要:在华中根据地创建之前,该地盛行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念,主婚权在父母或长辈,婚姻程序较为复杂,彩礼成为民众的重要负担,妇女地位较低,并存在种种婚姻陋俗。根据地创建后,倡导自主婚姻,简化婚姻仪式,提倡适当的彩礼,打破门户观念,树立新型的择偶观,革除种种婚姻陋俗,保护了妇女权益。通过对婚姻习俗的改造,妇女地位得以提高,家庭关系变得更加和谐,妇女积极参加抗战、拥军和生产。根据地在改造婚姻旧俗与提高妇女权益的过程中,并不仅仅是向父权制宣战,解决性别矛盾,更注重动员妇女投身革命,改变旧的社会制度与婚姻观念,从而在大的社会变革中从根本上提高妇女地位。

关键词:女权;华中根据地;婚姻习俗;妇女地位

中图分类号:K26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9)05-0060-16

华中根据地是指由新四军创建的苏北、苏中、苏南、淮北、淮南、皖江、浙东和鄂豫边区等八个抗日根据地的统称,在解放战争时期称为苏皖解放区。在根据地创建之前,该地主要盛行的是传统婚姻。华中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颁布了一系列的新政策及婚姻法令,推动了当地的婚姻习俗变迁。关于根据地婚姻习俗的变迁,近年主要的研究成果有:杜清娥、岳谦厚的《太行抗日根据地女性婚姻家庭待遇及其冲突》(《安徽史学》2016年第3期)、江沛、王微的《传统、革命与性别:华北根据地“妻休夫”现象评析(1941—1949)》(《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第3期),以及作者的《冲突与调适——华中根据地婚姻习俗变革中的国家与乡村社会》(《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7年第5期)等。已有的成

果大多关注传统婚俗的弊端及推行革命婚姻政策的必要性,但是对于传统婚俗的积极因素及婚姻陋俗的社会、经济、思想根源关注不多,对根据地妇女解放与西方女权运动的斗争目标、方法有何差异论述不祥。西方的一些女权主义者如卢蕙馨等将儒家学说描述为一种男权至上主义和父权制意识形态,并将其视为中国女性受压迫问题的根源所在。然而,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伦理和“性别歧视”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革命的婚姻政策如何革除传统婚俗中的消极因素,保留并改造其积极因素,并做到与民众的经济生活相适应?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究。本文运用华中根据地的档案、当时的报纸等所反映的民众婚姻生活的史料,对根据地建立前后婚姻习俗变化的过程作一考察。

收稿日期:2019-06-3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革命、女权与传统视域下的华中根据地婚姻习俗变迁研究”(项目编号:17YJC770031)

作者简介:吴云峰,男,黄山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一、根据地创建之前的婚姻习俗

在传统乡村社会,婚姻习俗沿袭着流传已久的惯例。陈顾远先生就认为,婚姻是传统伦理的本原,是儒家伦常的重要内容。“《中庸》‘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云云,视现实夫妇为伦常之本原,婚姻乃万事之基点也。”^[1]近代以来,从西方传入的新式婚姻除了对少数沿海城市有影响外,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微乎其微,农民大多遵照旧的婚姻习俗举办婚礼,并恪守传统的家庭伦理关系。

(一)主婚权

传统社会婚姻的主要目的在于保证家族血脉的延续,根据《礼记》的解释:“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男女的主婚权在于父母或长辈,如江苏武进等地“父母为子择室,通媒妁,行六礼”^{[2]464}。在父权制社会里,婚姻往往较少考虑夫妻双方本人的感情,更多体现的是家族的利益,婚姻类似于契约。俗语中所谓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前者表现为婚姻行为是以家庭为单位通过婚姻关系建立的社会联系,后者则具有明显的传统契约的特征。“媒”的意思为中介,据《说文解字》解释:“媒,谋也。谋合二姓者也”“妁,酌也。斟酌二姓者也”。婚姻中的彩礼往往意味着双方家庭财产的转移,具有契约的性质,而媒人则起着中间人的作用。在江苏灌云县:“妇女们除和男人一样遭战争、饥饿、病痛、寒冷之苦,脖子上还多套着一副封建枷锁。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扁担,拖着就走。’抢寡妇、童养媳现象比比皆是。婚姻不能自主,人权没有保障,有多少刚毅的妇女为抗婚和不堪忍受虐待而上吊、投河身亡。”^{[3]27}在传统农业社会,家庭的财富主要由男性家长掌控,结婚需要支付大笔的费用,单靠年轻男子往往难以承担,因此,父母在子女择偶中起主要作用是必然的。然而,在父母主婚的情况下,子女的择偶意愿往往被忽略,这就给夫妻双方日后的婚姻生活带来一定的隐患。在传统社会,不仅女性无法做到婚姻自主,男性同样无法自由掌控自己的婚姻大事,在结婚对象的选择过程中也要遵从父母或长

辈的意志,并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男女之别”还是要服从“长幼之序”的。正如罗莎莉所言:“中国性别压迫的根源必须从家族传统中找寻。在家族传统中,家族姓氏延续、孝道和祖先崇拜等三种文化因素共同融汇成儒家所倡导的家庭美德。它们成为酝酿、支撑和论证社会虐待女性行为之合理性的强大基础。”^{[4]138}

(二)婚姻程序

在传统社会,婚礼大致要经过“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礼。如《含山县志》记载:“婚礼中男家遣媒妁通言,尝至再三。女家允之,书女生年、月、日、时于贴,以付媒妁,然后纳礼,名曰‘定礼’。及娶妻纳礼,名曰‘娶礼’。其礼称家之有无。亲迎之日,以兄弟送女归,或以叔伯代之。”^{[5]386}对传统婚姻中结婚之前要算生辰八字的原因,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一书里解释道:“用理智选择儿媳妇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没有一个女孩子是完美无缺的,但每户人家都想找最好的。因此很容易出错。如果找不到其他出错的原因,那就要归罪于挑选的人了。因此,算命先生不仅是充作作出决定的一种工具,同时,也被用作把错误责任推卸给上天意志的一个办法。如果婚姻不美满,那是命运。这个态度实际上有助于维持夫妻关系”^[6]。在传统社会男女的婚配过程中,双方直接了解对方的渠道并不多,婚姻美满与否只好听天由命。

在安徽无为,婚礼包括“纳彩、纳币等礼,并依朱子《家礼》行之,令男女婚姻各有其时;或有指腹割衫襟为亲者,并行禁止。今凡纳彩、问名,大抵从宜从俗,称家有无焉。”^{[5]31}据《泰州志》记载,当地的婚礼大致经历以下程序:“始议婚,或姻戚作伐,或用媒妁。初聘定,次请期,次纳采,女家亦有回赠。于归妆奁丰俭,各称其家。俱设宴延宾迎送。合昏夕,花烛交辉,聚观如堵。三日拜见翁姑及家众,以分大小。女家备仪物,名曰‘做朝’。婿随往拜女之父母。遍及亲族,名曰‘回门’,仍留宴。满月,婿偕女归宁。”^{[2]506}在安徽萧县“古有纳采、问名、奠雁等礼,绅士家多仿行之。至于聘仪丰啬,妆奁厚薄,亦多量力。乡

城嫁娶必亲迎。嫁女之后,父母暨亲属三日内各俱饭以饷之。三日早迎女,午陈妆奁之属,花币鼓乐送婿归。”^{[5]437} 传统的婚姻礼仪较为繁琐,但在民间普通家庭,并不一定完全按照六礼,而是结合当地的习俗及家庭经济情况有所删减和变通。

(三) 婚姻花费

传统婚姻需要支付一定的彩礼,彩礼的多少视家庭经济情况而定。支付彩礼意味着男方财产向女方家庭转移。民间的彩礼往往存在着攀比的情况,导致婚姻花费过高,人们不堪重负。因此,历代封建王朝也经常倡导改革婚姻陋俗。如在含山县,雍正年间,朝廷曾下谕旨,要求婚礼从俭。彩礼不完全是男子给女子父母的钱财和礼物,也是夫妻双方父母为子女成立新家庭准备的物质基础,是财产继替的重要形式,传统社会在彩礼的准备上量力而行,还是值得肯定的。

彩礼是中国传统婚姻的组成部分,但是,关于彩礼的多寡则无明确标准,它是随着经济发展程度而变化的。如南通县,据《康熙通州志》记载:“凡结婚姻,两情相好,儿女相配,此诚百年缘分。聘娶礼不必较其厚薄,量力行之。尝见平日相好,后因计较财礼反伤情义。女家需索者固为可恶,男家力可为而吝鄙,俗尤为薄(劣)。若盛时结亲,或后一贫一富,男家力歉,女家颇过,即量力自备衣物以完儿女之债。倘两家力乏不能成亲,其至厚亲友当相助之。无使有怨女旷夫,此亦厚道也。”^{[2]518} 彩礼在婚姻中固然重要,但不是唯一的标准,过度地索取或逃避彩礼都不利于婚姻家庭的正常运行。婚姻类似于契约,一旦订婚,双方都有遵守契约的义务,否则就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

(四) 择偶标准

在传统社会,门第是最重要的择偶标准,讲究门当户对,也就是男女双方家庭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要大体相当。华中根据地所在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婚姻论财问题上并不十分看重,大体是根据家庭具体经济情况而定,但对门第却非常看重。如江苏睢宁县“邑人多以襦裤时联

姻,论门第,不计聘。及婚,婿行亲迎礼。入门,拜天地,夫妇交拜,饮合卺杯。三日,谒祖先,拜见翁姑,名曰‘分大小’。余亦略如古制。而六礼之行,则视贫富为奢俭矣。”^{[2]552} 《泗阳县志》记载:“婚用媒妁,重门户,聘仪不责多寡,甚有爱好指腹,不征聘币,无需庚帖者。”^{[2]531} 人们在结婚的时候,往往选择经济条件、家庭地位大致相当的对象。如逃荒到涟水县高沟镇的张凤兰在媒人的介绍下与一个雇农结婚。“我原是山东阴平人,八岁跟父亲逃荒出来,一路要饭到清江,住在大桥孔里四五个月。有一天,晚上发大水,一家四口子站在水里过夜,第二天搬到窑洞里。连铺草都没有,睡在光地上有几个月,后又被人驱逐出去,至高沟南徐永华家破屋里,还是要饭过日子。有年余,爷爷就被雇到人家做伙计,我被卖给地主家做小丫头,几年当中就如一只牛,从朝到黑总不息,时常是遭鞭子打。十五岁那年,我再不愿意干下去了,就偷偷地到爷爷那里,后来有个邻居来说媒,把我嫁给姜南善,穷人还对穷人,姜南善只种一点街上和尚的地,闲时推推小车子,我自己靠挑菜拾草过生活。”^[7] 在传统社会,由于界限分明,阶层流动的渠道相对较窄,因此门当户对成为最重要的择偶标准,目的是确保家族社会地位的巩固。

(五) 家庭关系和妇女地位

在传统的封建家庭关系中,长幼有序、男尊女卑、嫡庶有别。年轻女性的地位低下,甚至在日常的衣食待遇上,不同的家庭成员间亦界限分明。如东台县的一个雇工反映东家儿媳妇的饭食仅比长工略为好一些:“在老板家中过的生活单是吃饭就有好多样,沙稻米饭老爹老太吃,粳白米饭老板和奶奶吃,小春老红米饭相公姑娘吃,玉米粳子饭媳妇吃,大麦糝儿饭才轮到长工吃”^[8]。

受封建家庭伦理观的束缚,贫苦家庭的年轻媳妇,往往受到虐待与压迫。在淮北地区,一些妇女“受丈夫、婆婆打骂比较厉害,迫切要求解除压迫”^{[3]17}。盐阜区华安镇的杨大龙媳妇,受到婆家人的种种虐待,生活十分痛苦。《盐阜大众》曾

刊登过一首民歌,反映了此媳妇的生活遭遇:“华安镇,有杨家,杨大龙的媳妇实可夸,终日卷着烟,赚钱来按家。丈夫不讲理,时常会拷打。公公口水嘴,混名又叫二果瓜。婆婆坏死人,没事当街骂。可怜杨嫂子,苦到底头啦。自己没办法,回去告诉她妈妈。妈妈上门来,杨家不睬她。丈妈来把女婿劝,女婿拿刀砍丈妈,一家不讲理,真是坏人家”^[9]。在淮北地区,传统社会的妇女经济不独立,“妇女没有经济权,平时买针线的钱都被控制”^{[3]17}。由于年轻妇女的家庭地位较低,家庭成员之间缺乏民主、平等的关系。

(六)婚姻陋俗

在根据地创建之前,传统婚姻陋俗较为普遍,如买卖婚姻、指腹为婚、早婚、纳妾等等。男尊女卑,男女不平等现象十分普遍。还存在落后的贞操观念,干涉寡妇再嫁事件时有发生。家庭暴力和虐待也对女性身心造成严重伤害。

江彤在《回忆淮北苏皖边区妇女工作》一文中谈到了传统社会该地区的婚姻陋俗:“买卖妇女非常盛行,特别是孀妇完全无处理自己婚嫁的自由,丈夫死后,娘婆两家商量妥当,偷偷地就出卖了,由另一家突然于夜晚抢走,谓之‘嫁后婚’。在偏僻地区,也常有抢劫行路妇女强迫成婚的。”^{[3]16} 江苏淮安地区也存在指腹为婚的陋俗:“指腹为婚,换杯为聘,不待年而童养者,星巷陋俗,猥不足述。”^{[2]528} 指腹为婚是指父母为未出生的胎儿订立婚约,只有双方互生男女的指婚才能成立。由于双方男女尚未出生,其相貌、性情、才干乃至命运都不可把控,子女长大以后,往往弃信负约而导致婚姻纠纷。

传统社会早婚现象极为普遍,其根源在于农民的贫困及农业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贫困使得女孩的家长无力承担抚养的费用,不得不早就将其送往婆家。对于婆家来说,早婚意味着增加了劳动力,并寄托了他们对子嗣的期待。早婚也使男方在挑选媳妇时有更多的选择。但是早婚的弊病也是显而易见的,夫妻双方身心尚未发育健全,不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或者夫妻双方年龄差距过大,为日后的婚姻生活埋下隐患。

因为贫困,男方无力按照正常的婚姻礼仪娶亲,而女方家庭无力养活女孩子,由于男女双方并非完全自愿,这就为日后的婚姻生活带来隐患。由于男方家庭本身就贫困,童养媳的生活境遇则往往更为悲惨。比如启西县源勇乡的施竹英诉苦说:“我今年卅四岁,出生九个月给陆仁郎家做小养媳妇,五岁起就学穿锭,一天到夜要给婆打几次哩。有一天,天色冷,穿锭慢了一些,给婆用穿锭针钉在大指甲里,血直淌下来”^[10]。

纳妾、重婚也是传统社会的婚姻陋俗。富裕之家的男子往往三妻四妾,纳妾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传宗接代、延续家族血脉。“在体现男性至上主义的诸多社会行为中,孝道、祖先崇拜和血脉延续这三种文化因素实际上汇聚成一个强加于女性的基本要求。”^{[4]145} 也有男性是为了满足自己穷奢极侈的欲望,如伪清江(淮安)县政府财政科长李玉书,“李逆号叫‘七条半人命’,又叫‘七个半老婆’,所谓‘七条半人命者’,就是说有七条人命他应该负完全责任,一条人命是他和另外一个汉奸负责。所谓七个半老婆者是他除有七个公开的老婆外,还有一个半公开半秘密的姘头,这个姘头就是他的妻侄女。”^[11]

还有的地主纳妾是为了剥削其劳动力。如江苏海安县仇湖区地主石月生糟蹋了女雇工还让她下乡收租。“新西乡地主石月生,有田四百多亩,反动派来了之后,他就上了海安,去年还收了一年租,今年不敢下来,就在本月十一日,派他的女雇工陈细吉下乡收租(陈细吉已被他诱奸,怀孕四五个月)。一到佃户家,佃户就来告诉了工作同志,工作同志随后将陈细吉找来,经过我们的教育,陈细吉说:‘地主石月生坏啦,我替他用活计不算,还把我糟蹋得这样子,这次叫我下乡收租,实骨子是我赶出门。我现在不上海安去了,我哪怕讨饭,也不离民主村。’”^[12]

传统婚姻伦理还维护片面的贞操观念,在江浙一带,民间有资助寡妇的清节堂,目的在于维护封建伦理纲常,但是其经费往往难以保证。如江苏淮阴伪县长周公望、伪县政府财政科长李玉书曾克扣清节堂的粮食。“周保长大声说:‘周公

望不问老百姓,这还事小,连鳏寡孤独身上都要敲。’这话引起了寡妇老奶奶的共鸣:‘我们清节堂有廿三顷地,李玉书七年没有发给粮。’”^[13]传统社会提倡的贞操其实是一种片面的贞操,目的是维护男性财产,使其不至外流,并且维护男性的颜面和权威,但对妇女来说并不公正。

在传统社会,妇女对于封建礼教并非一概遵从,她们会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儒家传统关于女性的道德规范应该理解为一种男性精英话语或理想典范,而不是绝对的教条。比如宋儒程颐主张“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但他的侄女和侄媳都选择了再嫁,而他本人也是认同的。儒家伦理也非常讲究变通。实际上民间非传统的婚姻习俗不能一概斥之为“陋俗”,它是由民间的经济生活条件决定的,是农民应对生存的一种方式。

二、华中根据地对传统婚俗的改造

为了推动妇女解放,推行新式婚姻,华中根据地在施政纲领和婚姻条例中颁布了改造传统婚姻习俗、提倡新式婚姻的条文。妇救会等团体也积极帮助女性解决婚姻家庭问题。

(一) 倡导自主婚姻

华中根据地的婚姻法令体现了婚姻自主原则,订婚和结婚都要遵循当事人的意愿。如《淮海区婚姻暂行条例》第三条规定:“婚约应由男女当事人自行订定,无论何人不得强迫或代订。”^[14]¹⁵⁹ 第五条规定:“男女于未成年以前,由家长代订之婚约,于成年后,如不同意时,得申请撤销之。”^[14]¹⁵⁹《苏皖边区婚姻暂行条例》第二条规定:“婚姻之缔结,以男女双方自愿自主为原则,实行一夫一妻制。”^[15]⁸⁴ 第五条规定:“婚约应由男女当事人自行订定,任何人不得代订,其已经他人代订者一律无效。”^[15]⁸⁴《苏皖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提出:“实行一夫一妻的自愿婚姻制度,严禁蓄婢、纳妾、溺婴、强婚。”^[16]

根据地流行的民歌、宣传材料也积极宣传婚姻自主政策。江苏睢宁县妇女宣传材料有一首歌叫《糊涂》,讲的是一个糊涂妈妈包办女儿的婚姻,结果使女儿的生活十分痛苦的故事。“人家夫妇多和睦,提起他来我就哭,妈妈娘,你好糊

涂,哎哎哟,婚姻要自主。”^[17]在苏中根据地如皋县,流传着一首反映婚姻自由的《“三八”五字句》:“恭喜解放区,妇女有自由,不做小媳妇,没得女二流。恭喜解放区,男女得平等,事情一样办,选举有他份。”^[18]苏中根据地的东台县有一首童谣《自己当家》,反映了女性要求自己当家的愿望:“姊姊今年才十八,脸儿胖,脚儿大,下湖就种地,来家纺棉花;她的劳动实在好,谁个见了谁个夸。”“老媒婆,上我家,要给姊姊说婆家;可恨我妈妈,做事理太差,又算命,又抽卦,姊姊婚姻她要来当家。”“姊姊听说心烦恼,又是哭,又是骂!‘恨今妇女都解放,为何不让自己来当家?’全家开个批评会,劝说我妈妈:‘儿女婚姻要自主,老的不该胡当家。’”^[19]经过婚姻自由政策的宣传、推行,在华中根据地,婚姻自由原则已逐渐为普通民众接受、认可。

首先,订婚、结婚要符合当事人意愿。传统社会包办婚姻较多,根据地建立后,随着婚姻新政的推行,妇女逐渐觉悟,纷纷要求废除由父母包办的婚约或者解除不合理的婚姻关系。

如江都县兴桥区的黄桂英登报否认婚约:“我年幼时由父母作主与兴士元订婚,现已依政府的婚姻法否认婚约,特此登报郑重声明。”^[20]苏中抗日根据地如东县栟丰区南楼乡的黄佩贞早年由叔伯作主许与曹家楼戴子远之子为婚,并未征得其本人同意,且戴某家境及人才与媒妁所言不符,因此,黄佩贞提出解除婚约^[21]。海门川流港的王琴自幼由父母作主,与奚文才之子奚克明订婚,未得本人同意。1944年,她向海东区署提起否认该项婚约,请求给予解除^[22]。在传统社会,很多由父母或其他长辈订立的婚约并未征得当事人的同意,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后,婚约的对象如果不符合本人的意志,他们则可以依据新式婚姻法令、政策予以否认。江苏省东南县的民运工作队曾帮助婚姻不自主的女青年解除婚约,如海东区民本乡的何桂芬,就是在民运工作队的帮助下,解除了旧婚约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一些年轻人逐渐掌握了主婚权。1944年5月,苏中根据地的盛勤珍登报与杨崇道结婚。

“缘余年龄二十有余,因家庭环境恶劣,父亲终年在外图谋生涯,关于余之终生问题丝毫不理会,不得不邀请潘学桂、杨九财(为)介绍人,(嫁)杨崇道为终身伴侣,于本月二十三日在三仓乡正式举行结婚典礼,特此声明。”^[23]

苏北抗日根据地沭阳县沈集有位能干的姑娘叫换姐,当选为妇救会长,被她二奶奶介绍给一个侄儿做媳妇。“村里妇救会也开始组织了,大家看换姐心巧人巧,做事又能干,于是就选她做村妇救会长,换姐自参加工作后,又负责,又认真,遇巧还学会几个字,现在村里老百姓、干部,没有一个不知‘能干姑娘’换姐的,她的二奶奶特别喜欢她,把她说给娘家侄儿做媳妇。”^[24]传统乡村社会,年轻女性的活动范围十分有限,自主选择偶的机会不大。抗日根据地建立后,妇女被动员起来参加救亡活动,妇女通过参与社会活动,增加了人际交往,了解了婚姻新政,见识自然增加,让她们再就范于包办婚姻就很难了。换姐的未婚夫虽然也是长辈介绍的,但也经过了她本人同意,体现的是她本人的意志。在江苏,有一个地主的女儿叫黄秀芬,与其家的雇工李德相好,两人虽愿结为终身伴侣,但由于不门当户对,不能结为夫妻。1947年5月,黄私奔到李家公开同居,黄的父母向县司法科控告李德诱骗其女。司法科经过审理,认为黄、李二人完全出于自愿,因此批准其为合法的婚姻关系^[25]。

江苏如皋县有个童养媳叫袁美英,在如皋城解放后与雇工季远祥自由结婚。“袁美英同志原名英儿,今年二十多岁,从小在如皋城上人家做小媳妇,公婆死了以后,未婚夫又当伪军,她溜出来讨了两年饭,以后就到何庄周子芹家中做了七八年丫头。她的主人家隔壁就是季远祥的主人家,不多时两人就好起来了,但怕老板知道了不得了,总不敢在一起谈谈说说……去年老板想占美英做小老婆,她哭了三天三夜没有吃饭。老板打她,说她气多,季远祥心里更难过,带她溜,又没得安身的地方。正在没法想的时候,恰巧我军攻克吴窑、沈甸等据点,反动地主逃到石庄,他们两人才如重见天日,从此感情非常融洽。以后在

发动群众中,斗封建,挖浮财,他俩是最积极的。袁美英当选了妇女委员,季远祥当了区农筹委员。村里群众见他俩工作积极,都是雇农出身,感情又好,提出介绍他俩结婚成家,并得到农会的批准。这次到区里来开会,他俩非常开心,季远祥和袁美英说:‘过去在地主家,两人只有好在心里,总不敢表示出来。现在毛主席领导穷人,大家都翻身,我们才能结婚成家,今后要替群众做好工作,永远感谢毛主席这个大恩人。’”^[26]

在传统社会里,袁美英不仅沦为童养媳,而且还差点被逼迫为妾,在封建伦理的束缚下,袁美英与季远祥虽有感情,但却无法结婚,直到民主政府建立后,成立了群众组织,他们才得以结婚成家。由此可见,传统的婚姻陋俗是依附于封建经济的,民主政府成立后,经过土改,地主土地所有制被摧毁,传统的婚姻陋俗也受到严重冲击。

近代中国的妇女解放与西方并不完全相同,西方的女权运动主要向父权制本身宣战,而中国妇女运动的主要矛头并不是性别矛盾,而是不合理的经济、社会制度及文化观念。因为不仅女性,贫苦男性也是封建经济制度和伦理制度的受压迫者。在传统社会中,青年男女自主选择偶的意愿无论是受阻于父母还是地主、东家,除了传统伦理的原因之外,还有孝道、贵贱有别等文化观念。贫苦女性只有与男性一道支持革命,彻底改变旧的社会制度,才能在大的社会变革中改善自身的权益。华中根据地通过减租减息、土改等运动,大大削弱了乡村中地主和族权的力量,这就为自主婚姻提供了可能。

其次,离婚自由,出现了大量的离婚案件。在华中革命根据地,妇女不仅订婚、结婚具备自主权利,而且离婚也为社会所接受和认可。《淮海区婚姻暂行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夫妻之一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他方得请求离婚:一、充当汉奸者。二、违反抗战民主利益,政治思想严重对立,不能维持夫妻关系者。三、重婚者。四、与人通奸者。五、受他方不堪同居之虐待,或被恶意遗弃者。六、有重大不治之精神病或不治之恶疾

者。七、夫妻感情确实破裂，经调解无和谐之望者。八、吸食鸦片毒品屡劝不改者。九、判处三年以上之徒刑，或因犯不名誉之罪被处徒刑者。十、生死不明已逾三年者。十一、不能人道者。”^[14]¹⁶⁰

在华中根据地众多的离婚案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感情不和。如皋县丁东区玉树乡丁忠明、崔氏因意见不合而登报离婚：“兹因我俩意见不合时常口角，今凭双方证人丁忠富、崔广义调解离异，嗣后男婚女嫁各听自由，两不干涉，特此登报申明。”^[27]海门县海中区富中乡的季文才、江官英夫妇因意志不合而登报离异，并申明：他们所领养的女儿杨来虞由江瑛官抚养，将来上学、出嫁等都与季文才无干系^[28]。在苏中三分区，靖江县西来区东来乡的苏俊与赵桐弟因感情破裂而离婚：“我俩自结婚以来，已一载有余，不料中途发生感情破坏，势难偕老，今我俩情愿离婚，自离婚之后，男婚女嫁各听自由，除凭中立凭字外，特此登报声明。”^[28]1944年10月，泰县曲南区张夏乡夏盛如夫妇登报声明离婚：“我俩自结婚以来，感情不合，现在双方自愿离异，永远脱离夫妇关系，今后娶嫁，各听自由，除呈请县署备案外，特此登报声明。”^[29]1948年，在苏中根据地海启县，有个叫邱安康的人在报纸上登离婚启事，与妻子离婚：“本人在去年和北园乡东平村龚朝品的女儿龚兰如结婚，现因意见不合，双方都同意离婚，特此登报声明！启事人邱安康^[30]。”

一些妇女因不堪受家庭虐待而提出离婚。妇女干部鲁毅在《我的革命生涯》一文中讲到金坛县礼何区一名妇女因不堪受虐待而离婚。“太平村有一户人家，丈夫的夫权思想很严重，对于妻子任意打骂，女方虽受不了，但不敢讲，我们听到反映后，将他们夫妻叫来，向男方宣传男女平等的道理，指责他歧视、虐待妇女的行为，后在女方的坚决要求下，为他们办了离婚手续。”^[31]

有严重的精神疾病或其他恶疾，无法维持夫妻关系也是导致离婚的原因之一。在鄂豫边区“有一个势力大的地主之姑娘，很小即得了精神病，婆家原想接过来，过几年，精神病许会好，谁

知，结婚后四五年仍如此，婆家气不过，但无办法。休妻吧，不敢！不休吧，娶了一个‘活死人’。后经妇救会与政权配合批准方脱离关系。”^[31]

此外，还有因丈夫投靠敌伪而提出离婚者。李桂英之女，配于城黄区毓秀乡李秀河村周群儿为妻，周群儿投伪三年未归，李桂英为其女儿向县府申诉离婚。

华中根据地虽然确定了离婚自由的原则，但是对离婚问题采取了慎重的态度。如1948年华中支前司令部参谋处、华中地委、华中工委制订的《妇女问题讨论意见》对离婚问题作了一些限制。如“干部家属妇女，如干部机动到外省工作，如干部已另外结婚，必须通知其老婆另行出嫁，本地干部如果与家庭老婆在感情上、政治上、生理上实在不和，可得到双方家长同意，并得到党委与政府批准，方可离开。一般的如家庭老婆并不拖腿阻止本人革命，政治上亦不反动，不得随便离婚。”^[32]¹⁸⁷该意见还规定：“群众离婚，如果双方年龄不合，身体不健全，神经不健全，可根据情况，适当准予离婚，如感情不太好，男方有一方有其他意图必须以调解形式，若实在不行，可以离开。”^[32]¹⁸⁸

根据地的婚姻习俗，一头承载着过去，一头担负着未来。抗战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有赖于根据地基本生产单位——家庭的支持，中共在从事婚姻习俗改造，保护妇女权益的同时，还需要维护家庭的稳定。华中支前司令部参谋处制订的《妇女问题讨论意见》指出：“所谓婚姻自由问题，是反对一切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今天我们的重点是发动农村广大青年妇女，婚姻自主，反对封建买卖婚姻，对目前存在的婚姻问题，亦应当适当处理，群众男女离婚，须经农会之同意，党员干部不独是经过当地农会之同意（当地干部党员）亦须经党同意，不能一方强迫一方。”^[32]¹⁸⁸传统的婚姻习俗并非简单的一纸婚姻法令所能改变的，它依赖于政权、法令及教育的共同作用。

（二）简化婚姻仪式，提倡适当的彩礼

传统的婚礼程序繁琐，花费巨大。对普通农民来说，女方准备嫁妆，男方筹备彩礼都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情。根据地倡导新式婚礼,减少婚姻花费。《淮海区婚姻暂行条例》第六条规定:“订婚时男女双方均不得索取金钱或其他财物,但纯纪念性质之物品不在此限”。《淮北行政公署关于开展生产建设的决定》提出了节约公约四条“①不吃纸烟;②不喝酒;③不赌钱;④婚丧喜事一概从俭。”^[33]

1946年1月20日颁布的《苏皖区婚姻暂行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婚约得请求解除,但不得以对方贫寒影响生活为理由。”^{[15]85}根据地不赞成在婚姻关系中施行嫌贫爱富的做法。彩礼是几千年来中国人中流传下来的婚姻礼俗,也是新的家庭成立的物质基础,因此,适当的彩礼是必要的,也是合乎风俗民情的。

华中根据地民众积极响应婚姻新政,举办节俭的婚姻。如“盐城徐黄乡有个姓张的佃户,他儿子今年结婚。看到春荒严重,没钱花费,要节省些,就跑到丈人家,一商量,不花一个小钱,把女人带家来了。庄上人都说:‘带女人不用轿子了,也不用船,真能节省多少花费啊!’”^[34]在根据地的倡导下,民众逐渐改变了奢靡的婚姻礼仪,这对于战胜饥荒、恢复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伍千平、洪波在《有关淮南路东地区妇女工作的一些情况》中谈到了淮南抗日根据地婚俗改革的做法:“提倡婚姻自主,禁止买卖婚姻或变相的买卖婚姻,反对虐待妇女,提倡勤俭节约办婚事,订婚时不要彩礼,树立移风易俗的好风尚。”^[35]

华中根据地靖泰县孙庄乡的妇联代表孙齐荣在结婚时主动简化了婚礼:“于三月二日夜出嫁,贺送的妇女很多,当时大家感到我们妇女现在得到了解放,结婚就不能再像过去老一套,把新娘子用被子包起来,用绳子绑在车子上推,活像犯了什么罪,不能见人似的。经讨论后,大家一致意见,认为这次孙齐荣出嫁,横竖离公婆家不远,不过一二里地路,不要再把她绑在车子上推了,她们已准备了花匾,可以一脚送她到那边,顺便恭贺男家。举行结婚仪式,不要随过去弄什么‘关门坐富贵’,只要他们夫妻先向祖先三鞠躬,公婆三鞠躬,哥嫂一鞠躬,然后夫妻对行一

礼,就可以出来做主人,招待来客,这样礼貌既不缺少,同时也使我们妇女真正得到解放。”^[36]传统的婚礼要选择良辰吉日,而在华中根据地,战争不仅要求婚礼从简,而且婚礼也必须服从于战争与革命需要。如“世明区港南村有一民兵同志单汝文,他父亲已看下三月初二日子(旧历)替他娶亲,准备办喜事,但是单汝文同志,对革命有认识,在村民大会上自动报名,跳出要参加主力,并且说:‘鬼子一天不打走,一天不回来带女人!’”^[37]

彩礼经常是困扰农民的难题,很多乡村农民由于贫困娶不起老婆,根据地一方面倡导节俭的婚姻仪式,避免给家庭造成沉重的负担,另一方面,倡导他们努力生产,创造财富,从而成家立业。如淮北陈圩乡按户订立了兴家计划。“随时解决各种个人家庭之间的矛盾,把生产情绪增高:如因为没有女人,青年男子生产情绪低落(一般没有女人的青年或中年男子生产情绪是较低落的),则启示以远见,说明在努力生产致富之后,是不会没有女人的,且举例子以兹证,而提高了他的生产热情(如陈登其)”^[38]。由于光棍汉没有什么负担,所谓“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因此生产积极性不高,而有家室的男子则承担更多的义务,否则无以养活家小,因此,结婚是生产发展的动力之一。苏北涟东县在实行减租增资后,贫农和佃户的生活水平有所上升,也为结婚成家提供了条件。“老解放区实行减租增资后,佃户雇工纷纷典田盖屋。涟东北集区六堡村佃户徐贯海,种地主三十亩田,从前一年苦到头,只落得两手握空拳,自民主政府建立,他坚决执行减租交租法令,勤耕苦做,便收入增加,目前已买秋田六亩,旱田八亩,典田八亩,买耕牛半条(与别家合买),生活得到改善。同时雇工李桂钱,从二十岁离家雇大工,现已四十多岁,在实行增资以后,每年将工资典进二亩地,并讨了一个老婆,今秋还准备盖两间房子,他说:‘我的老命好,得亏新四军和民主政府帮助咱们穷人。’”^[39]

传统社会,由于结婚彩礼负担重,一旦发生悔婚或解除婚约的情况,彩礼纠纷往往容易激化

成为男女家庭之间的矛盾。华中根据地对彩礼纠纷也规定了处理办法。《淮海区婚姻暂行条例》第23条规定:“订婚之女方曾接受男方之彩礼者,如女方要求解除婚约,应将彩礼返还,无力返还者,得按普通债务关系处理之。”^[14]《苏皖边区婚姻暂行条例》对婚约解除时彩礼的处理进行了规定:“解除婚约时,应双方退聘礼,互负因婚约上所受之损失。自愿自主婚姻,在解约时,除有过失之一方退还聘礼外,并得赔偿无过失之一方因婚约上所受之损失。”^[15]⁸⁵对于高额彩礼,一味地禁止是不能奏效的,而通过教育提倡适当的彩礼,通过法律的形式对婚姻中的彩礼纠纷进行调解,有利于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秩序。

(三)打破门户观念,树立新型择偶观

华中根据地建立后,对旧的婚姻观念进行了变革。根据地的减租减息政策也引起了阶级关系的变动,拥军优抗政策的实行,使得军人的地位显著提高,成为女性青睐的对象。随着土改等政治运动的进行,地主被打倒,政治取代了门第、财富成为择偶时首先要考虑的因素,劳动能力和个人素质受到更多的关注。

在华中根据地,有一首小调反映了男性择偶观的变化,叫《黑牛与二婆》:

“王黑牛,李二婆,
两下遇到笑呵呵,
二婆问黑牛;

为何娶个傻老婆,
斗鸡眼儿大脚板,
满脸麻子一大窠,
说起话来啾啾鼻,
三根黄毛不像样。
黑牛开言道:

这会世道改了样,
过去娶妻看漂亮,
如今娶妻要做活,
别看媳妇长得丑,
做起活来赛几个,
不管长得丑不丑,
能做生活就算好老婆。”^[40]

在东台县也有一首民谣:“蝴蝶双双采花忙,小妹妹低头相情郎,不要浪荡摇手汉,只要农家勤俭郎。三耕六耙九锄田,一季收成抵一年。要是懒汉不出力,金田也要变荒田,车水水泥好下秧,过去都为别人苦,今年收粮自己尝。”^[41]这说明,男性的劳动能力成为女性择偶的重要标准。

根据地对抗日军人家属实行优待的政策,军人也成为女性结婚的理想对象,在根据地有很多反映拥军的歌曲。如在盐阜区就有一首歌叫《送丈夫上前线》:“送君送到运河堆,运河堆上春风吹,春风吹着英雄面,祝你胜利在前线。愿你安心在前线,家中的事情莫挂念,庄上代耕组织好,政府照顾都周全。”^[42]拥军优属政策使军人配偶的生活得到基本的保障。

在华中根据地,民众的择偶观念出现的最大变化是:门第,或者说是男女双方的家庭出身、经济地位不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婚姻可以跨越不同阶级和阶层,择偶过程中考虑的因素更加多样化,青年男女在择偶过程中可选择的余地更大。要打破传统婚姻伦理门当户对的准则,除了法令、政策以外,还需要靠宣传、教育及模范的塑造。

(四)革除婚姻陋俗

对于传统的婚姻陋俗,华中根据地进行了大力革除。《淮海区婚姻暂行条例》第二条规定:“重婚、早婚、抢亲、纳妾、童养媳、买卖婚姻等陋习,一律禁止。”^[14]¹⁵⁹关于婚龄,该条例规定:“男未满十八岁,女未满十六岁不得结婚”。《苏皖边区婚姻暂行条例》第三条规定:“重婚、早婚、抢婚、买卖婚、纳妾、童养媳等一律禁止。”^[15]⁸⁴该条例第九条规定:“男未满廿岁、女未满十八岁者不得结婚。”^[15]⁸⁴

皖江抗日根据地无为县的妇救会积极改善童养媳的处境:“过去群众都有收养童养媳的习俗,个别农民还有虐待童养媳的,妇救会总是关心这方面的问题,不允许虐待童养媳,要求农民对童养媳像对自己的亲生子女一样来看待。”^[35]¹³⁵童养媳是民间贫苦百姓应付婚姻问题的无奈选择,如果一味采取送返娘家的做法,并

不能改善其生存处境,对男方来说则是人财两空。因此根据地一般的做法是要求善待童养媳,等童养媳成年后根据其自身的意愿决定其去留。这样的做法既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又体现了婚姻自由的原则。

淮海抗日根据地处理过一起抢婚的案件,解救了一名周姓女子。“一所狭窄的房子,里面塞满了人,门外还拥挤着许多妇道家,一张矮小的桌子旁坐着一个年轻的同志,旁边坐着一个仅有二十来岁的女子。油灯,跳动着黄昏的火焰,人们都一声不响地静听着这奇怪的审讯。‘我家在王集附近,是淮阴的。’‘我今年二十岁。’‘娘家姓周,未婚夫姓王。’‘今年的三月间我就被这群狼心狗肺的土匪绑去了,当时爷爷就去赎,这些狠心的狼子不但不给赎,而且要割爷爷的耳朵。×日的晚间,鲍小三子就勒逼我做他的女人了,他还骗我,说抢好东西给我吃,抢好衣服给我穿。’‘不从,鲍小三子那付凶恶的面孔可把我吓坏了,他要打死我又要活埋我。’‘跟着鲍小三子以后,天天就忙着奔波躲藏,也不知吃了多少苦头’。”^[43]在抗日民主政府的审讯和干预下,该女子得以解救。抢婚违背了婚姻自主的原则,也违背了妇女的意志,根据地反对抢婚,坚持了婚姻自由原则,维护了妇女权益。

根据地还反对纳妾,积极解救被强迫为妾者。比如江苏涟水的陈玉兰被地主逼迫为妾,又被地主卖给他人,最后在民主政府支持下得以解救。“‘我是山东济南人,哥哥被抽了丁,我跟母亲逃荒到涟水,吃了许多苦,娘儿俩到一个大地主家做工,这个地主的屋子,有八进天井,母亲替他家做苦工,我十三岁替他家带孩子,一天只吃一小块煎饼,从来没吃饱过肚子。地主想我做小婆子,把我母亲在前面天井里用枪打死,不许我哭一声……太爷六十多岁了,要我跟他做小婆子,我吓得求他,我年纪太小,不行,又叫我帮他洗澡,自己是年轻幼女,实在难受,逼住无法,只好闭着眼睛去洗,他逼我跟他,我无论如何不愿意,他就把我卖出去,卖了四家子,最后卖给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头子。这天晚上带了一个马来拉

我,我知道了,就偷偷地爬过几丈高的围墙,跳下来,脚和手跌坏了,几天不能动,我找到乡公所去报告(这时八路军已经来了),乡里送我到区里,所有的人看了我身上的伤痕,全哭了,可惜,那地主以后却逃走了,大仇没有报,不过,我以后就解放了。’”^[44]在传统社会,许多妇女在婚姻问题上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并不完全是因为父母的干预或父权制本身造成的,而是由于生活贫穷迫不得已,家庭条件尚好的父母,自然愿意为女儿选择理想的佳婿。昆山理学家朱柏庐在其《治家格言》中就讲到:“嫁女择佳婿,毋索重聘;娶媳求淑女,无计厚奁。”这说明,中国传统的婚姻文化中也包含着许多积极的因素,这也为现代文明婚姻习俗的推行提供了前提条件。

根据地反对片面的贞操观念,离婚和再婚自由,反对干预寡妇再嫁。如《淮海区婚姻暂行条例》第13条规定:“孀妇有再嫁与否之自由,无论何人不得干涉,或借以索取财物。”^{[14]160} 根据地传统的贞节观念进行改造,将其构建为革命的、光荣的气节。如针对国军的奸淫,“阜宁益林等地妇女更坚持气节,曾组织剪刀队向蒋匪进行反强奸斗争”^[45]。传统家庭庶子女的地位相对于嫡亲子女地位低,权益无法保障,华中根据地政策对再婚所生子女及非婚生子女一视同仁。如《淮海区婚姻暂行条例》第12条规定:“女子再嫁,所携来之未成年子女,新夫有共同抚养之义务。”^{[14]161} 第21条规定:“严禁杀害非婚生子女,违者以杀人罪论处。非婚生子女得经其生父认领,或经其生母提出证明要求其生父认领者,生父应负担抚养之义务。非婚生子女之法律上地位,与婚生子女同。”^{[14]161}

近亲结婚违背了优生优育的科学原则,华中根据地禁止近亲结婚。《苏皖边区婚姻暂行条例》第十一条规定:“下列亲属不得结婚:一、直系血亲及直系姻亲。二、旁系血亲及旁系姻亲之辈分不相同者,但旁系血统在八亲等之外,旁系姻亲在五亲等之外或姨表姊妹之结婚,不在此限。”^{[15]85} 对婚姻陋俗的革除保护了女性的利益,化解了社会矛盾,对于提高人口素质,改善民众

的健康水平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五)保护妇女权益

为了打破旧的家庭伦理,推动妇女解放,根据地的施政纲领中规定了保护妇女权益的做法。如1944年颁布的《苏中区施政纲要》第十条要求:“依据男女平等之原则,从政治经济文化上提高妇女之社会地位,发挥妇女在经济建设上之积极性,保护女工产妇及儿童,提倡剪发放足,实行自愿的一夫一妻婚姻制。”^[46]根据地采取了种种措施,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提高其家庭地位。

首先,反对家庭暴力,提倡家庭和谐。在传统社会,妇女经常遭受打骂等家庭暴力,根据地反对打骂妇女的行为,提倡家庭和谐。妇女干部徐伟在《东南县妇女运动情况》一文中讲到“1941年,我们得悉正原乡成臣村韩家新媳妇经常被婆婆、丈夫打骂,娘家为女儿申冤多次无效,新娘子哭诉无门。妇抗会就发动一大群妇女上门进行说理斗争,宣传男女平等,使她婆婆、丈夫检讨了错误,并请了保人,从此后,他们再也不打骂新媳妇了。”^{[3]81}

家庭矛盾的产生,大多数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或者说是贫困,如婆媳间对家庭有限权利的争夺、生活的重压而导致夫妻间关系的裂痕等。华中根据地在妇女运动中,也曾采用斗争的办法,比如通过妇救会,发动媳妇斗婆婆、妻子斗丈夫,但却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反而会激化家庭矛盾。家庭是根据地主要的生产单位,也是革命战争赖以持续的基础。因此,华中根据地反对家庭暴力与虐待,既反对虐待媳妇,也反对虐待老人。1945年在泗沭十区“严先生儿媳妇,樊苏村樊家儿媳妇等均各个说理会上诉苦,并谋得解决,各家长均保证不再虐待。同时陈碾村庄施氏,逼死八十三岁老婆婆;周和村周××与妻子虐待老娘等也遭到了斗争,这把一般认为妇救会单纯解决儿媳妇痛苦的错误观点完全打破了,更促进了妇女工作的开展。”^[47]性别矛盾、家庭矛盾是从属于阶级矛盾的,只有稳固家庭关系,才能促进根据地生产的正常进行,从而促进革命的顺利开展。

其次,反对男尊女卑,主张男女平等。传统

的家庭性别秩序是男尊女卑,妇女对家庭、社会的贡献几乎被无视。华中根据地通过宣传,使民众认识到妇女对家庭和社会的贡献,并指明妇女争取权利的办法。如在盐阜根据地有一首秧歌调——《婆妈要翻身》写道:

“谁说乌盆不算盆,婆妈妈的不是人,我要问他这句话,他的根据是什么?这全是,封建话,说出来,欺婆妈,各位父老想一下,假使没得婆妈妈,哪块有他说这话!

婆妈本事实在大,吃饭穿衣全靠他,针头线脑不算数,锅头灶脑事情多。天一亮,就起身,煮茶饭,弄针线,麻烦事情全他做,直上一天忙到晚,要想闲也不得闲。

婆妈要得不受罪,赶快参加妇女会,自己起来求解放,读书识字学道理,婆妈们,要翻身,反封建,反迷信,反对把女人不当人,反对男女贵贱分,从今后讲平等。”^[48]

在盐阜地区,妇女没有地位,许多人连名字都没有,未婚妇女有的叫“小丫”“大丫”,有的叫“小二子”“小三子”,已婚妇女则把娘家和婆家的姓合起来,叫“××氏”。妇救会建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帮助妇女们起名字。如一个小姑娘原名叫周小丫,妇救会给她起了个名字叫“看花”。还有个年轻的媳妇原来叫王刘氏,妇救会给她起名叫刘玉兰,她在回家的路上一直念着自己的名字,生怕忘了。回到家中,丈夫见她嘴里不停地叨咕“刘玉兰”,就奇怪地问:“刘玉兰是谁呀?”她眉飞色舞地说:“刘玉兰就是我呀!我今儿有了名字了,是妇救会给我起的!”。妇女起名字不仅是为了方便,也是其地位提高的象征。

再次,鼓励妇女提高劳动能力,增强经济独立性。传统社会女性一般从事家务劳动,参加农业劳动的较少。根据地注重动员女性参加生产劳动,提高其在家庭经济上的贡献。1943年3月18日通过的《中共苏皖区党委苏南施政纲领》第十三条要求:“依据男女平等原则,从政治经济文

化上提高妇女在社会上之地位,奖励妇女参加生产,发挥妇女抗战与生产的积极性,保护女工、产妇、儿童,坚持自愿的一夫一妻,妇女依法有财产继承权。”^[49]

相对于华北和陕甘宁地区来说,华中根据地的妇女有较好的劳动习惯。江彤在《回忆淮北苏皖边区妇女工作》一文中提到淮北妇女参加劳动的情况:“妇女参加主要的农业劳动——一般农村妇女都参加农业劳动,除耕地由男子负担外,其他如锄地、插秧、割麦、担麦、扬场、打场等,妇女统统和男子一样操作。家庭吃用担水,喂牛养猪也多是妇女的事。因此负担之重,超过男子”^{[3]16}有的妇女还从事商业贸易劳动,“农闲期间,集镇妇女和农村妇女,都有做买卖的。如贩卖粮食、食盐,跑估衣(收集半新半旧的衣服出售)等等。”^{[3]16}

淮海根据地大力提倡纺织运动,以增强妇女的经济自主性。“纺织运动的开展不但解决了穿衣问题,妇女还改变了原来依赖丈夫的从属地位。龙圩乡的张二嫂,是个出色的纺织积极分子,丈夫去世也很早,她带着四五个孩子,最大的只有十六岁,生活特别困难,每次到县里开会,衣着破烂不堪,连顶头巾也是借来的。她家大人小孩首先响应纺织号召,可是买不起纺车。会长陆先进就向妇救会借了两台纺车,给她家用了一个冬天,不仅贴补了全家开支,还买进了六台纺车(当时纺一斤棉花的纱,纺工费是一块白洋,快手一天可纺一斤)。1943年初夏,县妇救会为了动员参军,在召集全县妇女干部和积极分子开会时,张二嫂带着大女儿笑哈哈地走进会场,看见熟人就说:‘上次我到县里开会,全身上下没有一根布纱是自己的,这次我与女儿两人,从头到脚没有一根布纱是借别人的。’”^{[3]40} 妇女通过参加生产劳动,不仅拓展了活动的空间,增加了自主婚姻的可能性,更创造了财富,减少了对家庭的经济依赖。

三、婚姻变革的影响

(一) 妇女地位的提高

随着根据地婚姻新政的推行,妇女在婚姻上

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放,其活动空间也得以大大拓展,担任的性别角色逐渐发生改变,地位得到明显提高。

首先,妇女的家庭地位有所改变。皖江抗日根据地的无为县对于农村中存在的男女不平等、丈夫打老婆的现象一般由当地妇抗会进行调解和干预。刘芳在《抗战时期无为县妇女工作与根据地建设》一文中提到:“哪家的男人打老婆,妇抗会就出面到哪家去讲理。到四五年我们北撤之前,整个根据地妇女都扬眉吐气,在家里不窝窝囊囊的,说话算数,夫妻和气,婆媳和睦,很少吵架呕气,这些涉及妇女切身利益的问题都是在妇女参加实际斗争过程中解决的。”^{[35]135}

其次,妇女的政治地位有所提高,参政意识增强。如在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殿发乡,妇女积极参加乡选的选民登记。“当天有一个村子快要登记完时,一个头发半白的老太婆,从人丛中挤到主席桌旁来说:‘同志啊!我家新媳妇再过几个月要来了,请你帮我替她登记在红纸上吧’。旁边的人都笑了起来,主席就笑嘻嘻地向她解释说‘既然没有娶来,那不忙!以后再登记好了。’这个老太婆是听了公民如何光荣的宣传后说这番话的。”^[50]

再次,妇女的经济地位也得以改善。华中根据地确立了妇女的财产权,在土改中,妇女纷纷立契。如盐东清恩区合尖村妇女陈俊英,“从小父母全死了,也没得兄弟,跟着叔爷过日子。现在陈俊英成人了,向叔爷要田。起先她叔爷狡赖,后弄到区政府,区政府批评她叔爷不对,她叔爷才认错,当下签了字,把七亩田,房子二间,家中用物平分。陈俊英感动地说:‘想来过去我们妇女罪真受够了,终年踩在脚底下过日子,没有出头,现在如不是共产党民主政府在此地,帮助我们妇女出了头,怎能分到产业呢?’”^[51] 华中根据地的婚姻法令中也体现了保护妇女权利的原则,《淮海区婚姻暂行条例》第17条规定:“妆奁为妻之特有财产,离婚时准其取回。”^{[14]161} 第18条规定:“男女一方因判决离婚如陷于生活困难,他方虽无过失,亦应酌给相当之赡养费”^{[14]161}。

在农村,寡妇的财产权往往受到男方家族的侵占,江苏东南县保护妇女的合法财产不受侵犯。如“大兴区静成乡沈秀贞,丈夫病死后,夫家的兄弟要夺她的家产,赶她走。妇抗会出面据理力争,帮助她得到应得的继承权”^[38]。在传统社会,由于土地分配制度极不合理,贫苦农民家庭财产极为有限,女性财产权根本不可能实现。民主根据地建立后,经过土改,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的土地、家庭财产都有大幅增加,广大妇女不仅在土改、清算浮财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在这个过程中为自己和家庭争取了更多的财产。

(二)家庭关系的变化

传统的家庭关系中男尊女卑,婆婆压迫媳妇、丈夫打老婆是家常便饭。根据地倡导建立平等的家庭关系,主张家庭和睦。如阜宁马集区周门镇组建了妇女秧歌队,经常调解家庭纠纷。“因为她们经常演出,影响了较落后的三马村的妇女,她们也组织起秧歌队来。其对本镇工作,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解决了妇女的实际问题:如裴庆思的妈妈,为人很毒辣,她家的小媳妇今年才十六岁,常被她母子打骂,简直不得安身,庄上人都说这媳妇可怜。秧歌队知道了,就派裴新华、裴学裘去她家劝说,她婆婆满口支吾,不讲情理。后来,去开会斗争她,才把理说清,小媳妇从此得到了解放。又有一回,卞炳元要在夜里害女人,秧歌队知道了,就集体不睡觉,伏在卞家周围听候。当卞炳元要杀女人时,她们喊开门,同卞炳元讲道理。这样,又救了一条人命。所以,地方上有人说:‘秧歌队真能干,她们比修行还慈悲呢!能关心人家的痛苦。’”^[52]

所谓“家和万事兴”,家庭成员之间需要展开必要的分工合作,才能使家庭正常运转。在传统社会,男性主要承担生产劳动的任务,而女性更多地承担育儿、料理家务等功能,此外,家庭副业也有赖于劳动力的合理分工。由于人均土地资源十分有限,家庭副业往往能弥补农业收入的不足,从而维持家庭的日常运行,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家庭成员之间要和睦,才能在经济和养育后

代等活动中开展合作。淮北抗日根据地的陈圩乡提倡家庭和睦,提高家庭的生产效率。“因家庭不和而消极怠工生产不力的人,则解决家庭矛盾。用‘家庭不和,只能喝汤,不能吃馍’来说服批评,并用群众力量嘲笑他。”^[38]华中根据地通过评选模范家庭来提倡家庭民主、家庭和睦。模范家庭的标准为:积极参加工作、学习,积极生产兴家,家庭成员团结和气。如淮安的三个模范家庭:“淮安嘉树区王庄,有三个是全区的模范家庭。第一个是王坤,家里有五亩田,夫妻两个,五个小孩子,一共七口过活。王坤是农会会长,姑娘参加秧歌队,老婆陈叔英是妇救会会长,一家子有什么工作全出力,没有一次落人后。有一次,他们夫妻两个一块开会,陈叔英当主席,王坤不开口,人家问他:‘你为什么不作声?’王坤说:‘我老婆当主席,我直行不好意思向她报告。’她姑娘动不动就拉住王坤,欢迎陈叔英唱歌,王坤说:‘我同意呀!’她姑娘又说:‘我们家选一个组长吧!’陈叔英说:‘好呀!就选你当组长!’第二天她妈妈叫她去拾草,她说:‘我是组长,怎么要你分配工作?’王坤一家都很勤劳不怕吃苦,在村上威信很高。第二个是王德亮,家里七亩田,四口子过活,他本人是村指导员,老婆参加妇救会,妈妈参加老人指导团,弟弟是秧歌队队长,一家人很和气,斗争很大胆积极,生产也很勤苦。第三个是王照能,他家只有四亩地,四口子过活,他本人参加农会,老婆和妹妹都上识字班,参加秧歌队,妹妹还是队长,纺织在全区比赛得第一,老婆参加剧团。一家的工作和生产也都很出名。”^[53]根据地新式家庭的主要特征是:妇女、子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上升,家庭成员之间在家庭事务上讲民主。根据地的家庭关系逐渐平等,父权制的影响逐步减小。

(三)妇女积极参加抗战、拥军、生产事业

华中根据地婚姻习俗的变革,使被传统婚姻陋俗束缚的妇女身心得到了解放,她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活动空间,被解放的妇女纷纷投入抗战、拥军、生产事业,成为中共革命的重要推动力量。如淮南路东马圩区的妇女与男子一样参加

农业生产劳动,为巩固根据地作出了贡献。“马圩区妇女劳动英雄高三姑娘能和男子一样登上高树采桑,一样耕田挑粮。”^[54]苏北抗日根据地沭阳的姑娘换姐不仅参加妇救会,当上了妇救会长,而且还想动员她的未婚夫参军。“换姐和衣躺在床上,心里非常不舒服,心里想,‘我家不就没有办法光荣了吗?父亲年纪大了,我是女的。’她正恨自己为什么是一个女的呢,忽然想起了他——她的未婚夫——去年到他姨母家来时,看见过的,黑黑人,很强壮的小伙子,一定很够条件的吧!可是,怎么办呢?一个姑娘,去找未过门的丈夫,是要被人家笑话的,不去的话,成年安稳地过日子,再没有一个人去参加,这就是忘了本了。而且,冯大娘还不是向我笑吗?人家的丈夫能去参军,我呢?人家还叫我是‘能干姑娘’呢,虽然是未婚夫也是丈夫呀,不去参军不是丢死人吗?我就怕冯大娘向我那样笑。凭良心说,我也要找他去参军呵。”^[24]盐阜根据地的毛改英动员未婚夫参军:“张马乡妇女会长毛改英同志保证动员未婚夫参军,两天来一共批准了廿三个参军英雄,其他还有哥哥送弟弟、姐姐送兄弟、女人送丈夫、叔子送侄子的十三人。”^[55]中共中央东南局妇女干部章蕴回忆:“得到解放的妇女有不少要求参军,特别是在家受压迫的年轻媳妇,对包办婚姻不满的姑娘们,经我的手就收下了好多人,后来不少人锻炼成为骨干,成为能干的女干部。”^{[3]4}妇女解放与革命事业相互借重,从传统婚姻、家庭中解放出来的妇女在抗战和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结语

由于华中根据地的主要任务仍是军政建设,再加上推行婚姻新政的时间尚短,在婚姻习俗变革中仍存在问题与不足。婚姻自由、妇女解放在一定程度上还要服从于革命的整体利益,因此,婚姻自由的实行是有限度的。乡村的传统观念也制约着婚俗改革的力度,一些基层干部受父

权制观念影响较深,未能正确执行新式婚姻政策;妇女的财产权未能得到完全的尊重,其活动空间也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在一些民众中存在对婚姻政策误解与滥用的情况。如苏中抗日根据地如皋第一区的李芷英在姘夫亡故后又与前夫洪龙春纠缠,索要生活费,因此洪龙春登报进行了申明。李芷英与洪春龙结婚后感情不睦,“芷英私姘配国桢为室之后,龙春亦与康氏结婚,后经登报周知,迄今十数年无异议,近因芷英姘夫亡故,与春龙发生争议,经亲邻调解,由春龙津贴芷英生活费银壹仟叁百元以为彻底解决离婚手续,且后男婚女嫁各听自由两不干涉,关于芷英生前赡养生后殡葬概与春龙无干”^[56]。李芷英以私逃的方式抗争不和谐的婚姻本无可非议,但在双方都已再婚的情况下仍纠缠前夫,实为不明智之举,也不符合婚姻新政的精神。

在华中根据地建立之前,该地流行传统的婚姻习俗。根据地创建后,在施政纲领和新式婚姻政策、法令中规定了婚姻自主、男女平等、一夫一妻等原则。通过妇救会等团体的推动,传统婚姻观念和形态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新式婚姻开始出现,婚姻仪式和择偶观念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化,妇女的家庭地位得以提高。在华中根据地,女权的争取并不仅仅是通过动员女性向父权制宣战实现的,妇女只有积极投身于民族、民主革命,在大的社会变革中才能从根本上提高自身地位。革命为妇女解放提供了重要的契机,从传统婚姻、家庭关系中被解放出来的妇女在革命与根据地建设中也逐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力量。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华中根据地的婚俗改革并非尽善尽美,但成效是明显的。当前,在民间的婚姻习俗中,闹婚、天价彩礼等婚姻陋俗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由婚姻纠纷引起的社会矛盾也是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之一,华中根据地对传统婚姻习俗改造的经验仍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 [1] 陈顾远. 中国婚姻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2.
- [2] 丁世良,赵放. 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第8册[Z]. 北京:国家图书出版社,2014.
- [3] 江苏省妇女联合会. 妇女运动史资料:4[M]. 内部编印,1983.
- [4] 罗莎莉. 儒学与女性[M]. 丁佳伟,曹秀娟,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 [5] 丁世良,赵放. 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第9册[Z]. 北京:国家图书出版社,2014.
- [6] 费孝通. 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31.
- [7] 张凤兰. 我被选为新农会委员[N]. 新华日报,1947-03-12(2).
- [8] 殷如春,王一鉴. 三十年的雇工不曾翻身[N]. 东台大众,1947-05-12(2).
- [9] 刘道记. 坏人家[N]. 盐阜大众,1946-03-12(4).
- [10] 大会报导组. 启西妇代筹备会开幕[N]. 复查,1947(37).
- [11] 清江民众控诉周李两逆罪行[N]. 新华日报:华中版,1945-12-18(1).
- [12] 糟蹋了女雇工还叫他下乡收租[A]. 南京: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GB-015-014-024.
- [13] 敲竹杠无孔不入,刮到清节堂寡妇头上[A]. 南京: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GB-004-001-007.
- [14]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志编辑室. 江苏革命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1941—1949[Z]. 内部编印,1988.
- [15] 朱耀龙,柳宏为. 苏皖边区政府档案史料选编[Z].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 [16] 韩廷龙,常兆儒.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Z].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 [17] 睢宁县妇女联合会. 睢宁县妇女运动史料:1919—1949[M]. 内部编印,1991:112-113.
- [18] “三八”五字句[N]. 如皋大众,1948-03-13(3).
- [19] 自己当家[N]. 东台大众,1947-03-01(2).
- [20] 黄桂英. 否认婚约启事[N]. 苏中报,1944-05-17.
- [21] 黄佩贞. 黄佩贞解除婚约启事[N]. 苏中报,1944-05-29.
- [22] 海门川流港王琴否认婚约启事[N]. 苏中报,1944-06-13.
- [23] 杨崇道、盛勤珍结婚启示[N]. 苏中报,1944-05-29.
- [24] 路. 能干姑娘[J]. 生活,1945(7).
- [25] 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江苏省志:审判志[Z].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222.
- [26] 沈玉齐,李一洁. 靠毛主席翻身成了家[N]. 新华日报:华中版,1948-03-29(1).
- [27] 季文才、江瑛官离异启事[N]. 苏中报,1944-05-29.
- [28] 离婚启事[N]. 江潮报,1944-10-7(3).
- [29] 离婚启事[N]. 江潮报,1944-10-7(2).
- [30] 离婚启事[N]. 海启大众,1948-03-05(2).
- [31] 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 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第六辑群众工作专辑[Z]. 内部编印,1985:225.
- [32] 安徽省妇运史资料编纂委员会. 安徽省妇女运动历史资料选编(一)[Z]. 内部编印,1983.
- [33] 江苏省档案馆. 红色记忆——江苏省档案馆馆藏革命历史报刊资料选编(1918—1949)[Z].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517.
- [34] 徐超. 春荒要节省,带女人不用花轿[N]. 盐阜大众,1946-03-21(1).
- [35] 安徽省妇运史资料编纂委员会. 安徽省妇女运动历史资料选编(二)[Z]. 内部编印,1984.
- [36] 孙庄乡妇女结婚新仪式[N]. 新华日报:华中版,1948-03-17(1).
- [37] 鬼子打走再娶老婆[A]. 南京: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G13-017-006-002.
- [38] 陈圩乡按户兴家计划及劳动互助[J]. 拂晓杂志,1944,1(9):35.
- [39] 徐延康,王莲芳. 减租增资,使佃户雇工生活上升[N]. 苏北报,1945-11-6(1).
- [40] 黑牛与二婆[N]. 生活:创刊号,1945-03-10.
- [41] 民谣[N]. 东台大众,1947-05-12(2).
- [42] 马云,梁磷. 送夫上前线[N]. 盐阜大众,1949-03-5(3).

- [43] 哲明.她得救了[N].淮海报,1941-12-25(4).
- [44] 在三八妇女节的大会上,陈玉兰同志诉苦[A].南京: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GB-009-072-010.
- [45] 张鸿志.我们怎样纪念“三八”妇女节[N].新华日报:华中版,1948-03-8(1).
- [46]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苏中抗日根据地[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338.
- [47] 泗沭十区一个月的妇女运动[N].苏北报,1945-12-26(1).
- [48] 董国忠.婆妈要翻身[N].盐阜大众,1946-03-12(4).
- [49]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苏南抗日根据地[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246.
- [50] 曾山.淮南路东段发乡乡选实验的成功[J].淮南党刊(15):31.
- [51] 妇女该派有产权,陈俊英分到七亩田[A].南京: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GB-009-010-003.
- [52] 两个妇女秧歌队[J].江淮文化,1941(创刊号):101-102.
- [53] 三个模范家庭[N].盐阜大众,1946-03-12(4).
- [54] 淮南路东各县举行群英会[N].解放日报,1944-12-15(1).
- [55] 尚正春,祝书高.提高觉悟弄通时事,新街区竖起廿四面旗帜,兄送弟妻送夫大家争报名[N].参军快报,1948-12-9(1).
- [56] 洪春龙、李芷英离婚启事[N].苏中报,1944-05-17.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Marriage Customs in Central China Base Area

WU Yun-feng

(Huangshan College, Huangshan 245041, China)

Abstract: Before Central China base area was established, traditional marriage customs were popular in this region: the right of presiding wedding belonged to parents or seniors; the marriage procedures were relatively complicated; betrothal gifts became heavy burden of the people; equal matches in social and economic status were strived for; women's position was fairly low, so on and so forth. However, we can't attribute gender discrimination to traditional ethics. After the foundation of base area, it advocated the right to decide marriage for oneself, simplified marriage ceremony, proper betrothal gifts, elimination of the status division, establishment of new values in choosing a spouse, abolishing of undesirable marriage customs, and protection of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By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rriage customs, women's position was improved; the family relationship became more equal; women actively took part in the war against invasion and supported the army and production career. During the process of reforming old marriage customs and improving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the base area not only declared war to patriarchy, resolved gender conflicts, but also paid attention to arouse women into revolution, changed old social institution and marriage norms, thus improved women's position along with social change.

Key words: women's right; Central China base area; marriage customs; transform

(责任编辑 文向华)

· 妇女史研究 ·

唐代女医群体研究

徐艳芹

(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 100081)

摘要:唐代女医、女巫均为当时妇女的健康照顾者。唐代女医既是男医治疗女患疾病的辅助者,又是直接为女患提供医疗帮助的医者。她们的产生和存在解决了儒家男女有别观念所造成的男医接触女患时的不便。女医医学技术的获取有官方机构教育和民间经验传授等途径。对唐代正史和传奇小说中所记载的女巫形象,我们需从书写者、被书写者、受众、写作背景等多种角度进行分析。

关键词:唐代;女医;《天圣令·医疾令》;女巫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9)05-0076-06

一、引言

在中国古代医患关系及疾病治疗中,儒家男女有别的两性观念逐渐划定了男女各自的生活空间,使男医与女患之间产生了隔阂。医人群体以男性为主这一情形导致女性患者疾病治疗的延误,最终对女患身体健康造成一定程度的危害,这也就为女医的产生提供了可能和必要。太医署作为封建王朝正规的医人教育与培训机构,其始设于隋代。之后唐承隋制,亦设置太医署,又命医学博士教授宫廷女医医疗之法。另从唐传奇小说及相关医书记载中可知,唐时民间也存在部分掌握医治技术的女医和女巫:女医多以正规医学知识和医疗技术为病患治疗疾病;而女巫多以符箓、咒术等手段为患者解除病痛。从两者的职责来看,女医、女巫均为当时妇女的健康照顾者,都在本文所要论述的女性“医”的范畴之内。又考诸正史及相关文献,其间较多使用“医人”“医者”两词,均可指称古代社会中的“医”。本文所讲女医,即为医人或医者中的女性群体,

她们掌握部分医学知识和技术,并为古代妇女提供医疗帮助。

学界关于古代医者的研究成果颇丰,涉及文中所要探究的女医的学术著作也不在少数。关于唐代医者的考察,以台湾学者李贞德的著述为多,如其创作完成的《女人的中国医疗史》^[1]及其主编的《性别、身体与医疗》^{[2]79-158}两部著作。另有《唐代的性别与医疗》则从《外台秘要》中的一则妇女生产故事探究唐代的生育文化和女性医疗照顾者的作用^[3]。具体的唐代医者研究,包括了医学教育、人员选取、医人仕进及其社会地位等问题^[4-8]。再有从唐代士人等知识阶层的文学作品分析医者的文本书写、叙事和形象塑造^[9-10]。笔者开始关注唐代女医这一群体则是从李志生的《中国古代妇女史研究入门》一书开始,“中国古代的妇女医护”一讲中讲述了四类女性医护者,并分析了男女有别观念下男医与女患身体接触中的矛盾^{[11]259-283}。

《天圣令》是近二十年间学界探究唐宋政治、

收稿日期:2019-06-29

作者简介:徐艳芹,女,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隋唐史、妇女史研究。

经济、医学等问题不可忽略的史料。上世纪末,戴建国教授在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发现了残十卷本的《官品令》,目录上标明为“明抄本”。而后众多学者开始将此册古籍记载与唐宋正史、会要等文献作对比探究,其中尤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着力最甚,进而推动了唐宋研究的进程。与本文所要论及的唐代女医有关的记载为《天圣令·医疾令》唐令第9条“女医”条。近些年关于《天圣令·医疾令》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如程锦从“女医”条考察唐代女医制度和女医教育^[12-13]。于赓哲从《医疾令》中发现官方医学对民间医学的尊重与采纳以及当时医学体制的开放与包容^[14]。楼劲在程锦论述唐代女医的基础上作出进一步探究,他分析了太医署女医的来源及其特殊身份,女医学习内容和唐代“女医”制度的缘起等问题^[15]。

针对中国古代巫医的讨论,宋镇豪认为在商代鬼神崇拜的社会风气下就有巫师作医的历史现象,巫术与医术结合,巫医掌握一定的疾病治疗术^[16]。赵容俊从甲骨卜辞记载探究了先秦时期“巫医不分”观念下巫医的医疗活动,即为医疗巫术和逐疫除凶两种^[17]。秦卿根据文献记载分析认为,魏晋时期巫与医出现职能分工,巫主要从事占卜及治病救人,而医趋向科学化的救治,进而导致其社会地位的差异和变化^[18]。王晓玲探讨了唐代女巫的交往圈,其通过女巫通鬼神的手段及社会职能和女巫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等问题,窥探了唐代民众的鬼神观念^[19]。李小红则主要对宋代巫觋群体生存方式、社会地位及职事等进行了深度考察,又通过对巫觋群体与宋代社会相互影响的关系分析,评估了宋代在古代巫觋发展史上的地位^[20]。

本文在以上唐代医者、《天圣令·医疾令》和古代巫医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析唐代女医产生原因及其社会地位,考察唐代宫廷女医的受教育情况,探析此时期女巫的文本书写和形象塑造,进而实现对包含宫廷女医和民间女巫在内的唐代女医群体的全面了解。

一、唐代女医的产生及其社会地位

(一)女医的概念界定

正史记载最早的女医为汉武帝时的义妯,据《汉书》卷九十《酷吏传》载:“(义)纵有姊,以医幸王太后。”^{[21](卷90)3652}此处的义纵之姊即为义妯,她凭借自身医术得到武帝之母王太后的赏识。汉宣帝时,又有“女医”淳于衍,《汉书》卷八《宣帝纪》记载:“(霍)显前又使女侍医淳于衍进药杀哀后。”^{[21](卷8)251}卷六十八《霍光传》记载:“显爱小女成君,欲贵之,私使乳医淳于衍行毒药杀许后。”^{[21](卷68)2952}颜师古注曰:“乳医,视产乳之疾者。”^{[21](卷68)2953}卷九十七上《外戚传》记载:“明年,许皇后当娠,病。女医淳于衍者,霍氏所爱,尝入宫侍皇后疾。”^{[21](卷97)3966}《古列女传》卷八《霍夫人显》又载:

会宣帝许后当产疾,显乃谓女监淳于衍曰:“夫人乳大故,十死一生。今皇后当乳身,可因投药去之,使我女得为后,富贵共之。”^[22]

由上述关于淳于衍的史料可知,其身份为“女侍医”“乳医”“女医”“女监”,尽管称谓有所不同,但其职责应当都是为宫中女眷提供生产、疾病医疗等帮助。因此,义妯、淳于衍均为当时的女医。“十死一生”也表明当时妇女在生产时将会遭遇极大生命危险,可见女医们担负着重要的助产职责。

王慧芳、楼绍来在《中国古代女医初探》一文中提及:“宫廷女医的设置,直到汉代的‘少府’机构中才有。”^[23]但据《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第七上》记载:“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供养,有六丞。属官有尚书、符节、太医、太官……东园匠十〔六〕官令丞。”^{[21](卷19上)731}又载:“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六令丞。”^{[21](卷19上)726}两处均无女医的明确记载,故汉代或许并未明确设置女医这一宫官,女医也有可能包含在太医群体中。宫中妇女需要女医提供医疗服务,因此当时如义妯、淳于衍等女医大抵有责而无职。故可推测,古代女医多为男医治疗女患疾病的辅助者,也是直接为女患提

供医疗帮助的医者。

(二)唐代女医的产生原因及其社会地位

唐代女医缘何产生?是当时的男医不能治疗女性患者的疾病吗?是男医的技术性问题,还是男医与女患之间的观念隔阂?佟新教授认为,与西方宗教从身体结构的角度论述男女关系不同的是,中国则是基于防范所谓的“男女之患”而强调“男女有别”^[24]。

《礼记·郊特牲》中有言:“执摯以相见,敬章别也。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义生,义生然后礼作,礼作然后万物安。无别无义,禽兽之道也。”孙希旦认为,执摯相见是宾客与主人之间的礼节,夫妇之间讲究执摯之礼是为实现互相恭敬的相处之道,也是一种彰显男女有别的方式,以避免男女之间苟且之事。在社会秩序中,父子之亲由男女有别衍生而来,君臣之义又是从父子之情发展而来,君臣高下便造成“义生而后礼作”。这样“由男女有别,而递推其所致如此,所以深明男女之别之重也。”^[25](卷26)708《礼记·内则》篇也有类似的男女规范:“男不言内,女不言外,非祭非丧,不相授器。……外内不共井,不共湔浴,不通寝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内言不出,外言不入。”孙希旦解释为,男女之间有内外的职责差别,家事留于家内,家外之事亦不会影响家内的秩序,以使内与外间有严格的限制^[25](卷27)735-736。“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25](卷28)768由上可知,男女之间的差别体现在生活中的各处细节,如教养方式、饮食、寝居、沐浴及内外职责分工等。并且男女之别也是父子、君臣关系稳定和“义”与“礼”兴起的重要基础。

由男女之别生出男尊女卑,这是男性在古代王朝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并拥有话语权的結果。“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孙希旦解析为,夫妇出行时须由丈夫带领,妇居于其后,表明夫妇尊卑、夫唱妇随之义^[25](卷26)709。其中提及“大门”,古有女子不出中门,可见古代妇女多被限制在家之内,操持家庭事务,自由性受到一定的限制。又有:“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25](卷27)736孙希旦分析为,此处所说“道

路”为宫中道路,宫中之路以右为尊,男子行于右,女子行于左,一方面是为规定男女之间的相处距离,另一方面也是区别男女尊卑的途径。

因此,男尊女卑观念使古代女性多为男性的私有物、附属品,这也导致女医附于男医之后。男女有别观念则是两性之间距离产生的原因,“男女有别的另一层含义,即男女身体或空间上的隔离”^{[11]259},这便是当时男医在处理女患问题中难以跨越的障碍,而女医正好可以弥补男医的这一缺憾。但“中国医学是‘以文本为核心’的医学”^{[26]6}，“强调读医书以习医的风气,使医学变为士大夫之业”^{[26]15}。当读医书成为医人必备技能后,女医便难以自立;当经验性的医学变成一门需要系统学习的知识后,女医的医疗技术发展便很难进行。

李志生在《中国古代妇女史研究入门》中提出“女性医护者的被边缘化”^{[11]259}的观点。但笔者认为,女性医护者自产生之初便是为男医服务的,是男医在治疗女性患者不便时的辅助者。因此,在医疗技术、医典理论大多掌握在男医手中的情况下,因为原初文化水平和后天受教育条件的限制,女医不可能从辅助角色成为核心,也就不存在边缘化的情况。她们只是在男医与女患的观念隔阂中发挥医人的作用。

二、由《天圣令·医疾令》看唐代的宫廷女医教育

据《天圣令》卷二十七《医疾令》唐令第9条“女医”条记载:

诸女医,取官户婢年二十以上三十以下、无夫及无男女、性识慧了者五十人,别所安置,内给事四人,并监门守当。医博士教以安胎产难及疮肿、伤折、针灸之法,皆按文口授,每季女医之内业成者试之,年终医监、正试,限五年成^[27](卷26唐令第9)319, [28]。

可见当时宫中已有专门培训女医的程序和方法,宫廷女医主要学习安胎分娩和治疗疮肿、伤折、针灸的方法,大多是在男性医生不方便治疗的妇科疾病方面有所学习。

关于“官户婢”一词,李志生将此处女医身份

解读为“官户和官婢”^{[11]263},属于贱民。李贞德认为是指官奴婢,“女医一如乳母,选取自官奴婢,惟年纪较轻”^{[2]430}。程锦则理解为“官户和官奴婢中的女性”^[29]。楼劲在《释唐令〈女医〉条及其所蕴之社会性别观》一文中通过辨析“官户”“户婢”等的身份,论证“官户婢”并非官户之女,而是官户和官婢,故应句读为“官户、婢”^{[15]96}。故而可知所选女医的文化素质大多不高,对于医书典籍及医学理论不甚精通,宫中医学博士便采取“按文口授”的方式。这样一方面女医只懂行医之术不通医典理论,保证了男医在医疗和医学文化中的主导权,另一方面女医习得部分行医之术,可辅助男医治疗女性患者的疾病。

关于“按文口授”中的“文”指何种医典,据《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三》载,太常寺下有太医署,太医令掌医疗之法。“其属有四,曰:医师、针师、按摩师、禁咒师。皆有博士以教之。其考试登用,如国子之法。凡医师、医工、医正疗人疾病,以其全多少而书之以为考课。……博士掌以医术教授诸生。”^{[30] (卷44)1876} 此处的“医术”,意为学习《本草》《甲乙》《脉经》。《新唐书》卷四十八《百官三》中所载与之相同^[31]。又参考《天圣令·医疾令》,“诸教习《素问》《黄帝针经》《甲乙》,博士皆案文讲说”,“医生试《甲乙》四条,《本草》《脉经》各三条。针生试《素问》四条,《黄帝针经》《明堂》《脉诀》各二条”^{[27] (卷26唐令第5.7)318}。由以上两条令文可知,医生、针生所学内容有所差异,这与其医疗职责不尽相同有关。医生侧重学习唐《本草》等理论性医典,针生则倾向具体针灸操作技术的获取。推及唐代女医的学习内容,医博士多是传授自身所学知识,因此可推测当时女医学习内容大多为《本草》《甲乙》等医学典籍,又因宫中妇女对针灸术的需要,女医也兼习部分《素问》《脉诀》等技术。

三、唐正史及传奇小说对女巫的形象塑造

唐代正史及传奇小说中记载了一些民间女巫。她们或可受召出入宫廷,参与宫廷妇女的医疗照顾,服务于宫中贵族;或可进入官宦之家,为朝廷官员和家属提供医疗帮助。但其大多数游走于平民家庭之间,以所学巫术和医疗经验帮助妇女解决一些疾病痛苦。因此,女巫是介于巫与

医之间的复杂群体。在史料记载中,她们不像宫廷女医那样跟随医博士学习正统的官方医学理论和技术,而是学习些经验性的医治技巧。这样的知识获取途径使女巫在唐代正史及传奇小说中多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和被贬低的意味。从以下几则相关材料可以窥见知识阶层对女巫的书写和形象塑造。

《旧唐书》卷五十六《罗艺传》中记载一李氏女子:

曹州女子李氏为五戒,自言通于鬼物,有病癩者,就疗多愈,流闻四方,病人自远而至,门多车骑。高祖闻之,诏赴京师。因往来艺家,谓艺妻孟氏曰:“妃骨相贵不可言,必当母仪天下。”孟笃信之,命密观艺,又曰:“妃之贵者,由于王;王贵色发矣,十日间当升大位。”^{[30] (卷56)2279}

可知李氏女子掌握治癩医术,且有一定的名气,以至被唐高祖召入京中。“五戒”为大乘佛教中的五条行为准则,可知李氏或是信奉佛教并以佛教戒律规范自身行为。“通于鬼物”则表明李氏或为当时的巫。唐朝儒、释、道三教融合,李氏在以佛教为信仰的同时,也掌握了一些沟通鬼神的巫术。在治疗病患的同时,李氏女子也具有相面的经验和能力。在观察了罗艺之妻孟氏的面相后,告知孟氏有“母仪天下”的贵相。后又为罗艺相面,并告知孟氏罗艺“十日间当升大位”。这似乎是与正史记载中的罗艺反叛相吻合,但占卜、相面之说不可尽信。然从此则材料可看出,李氏女子兼懂医疗技术和相面巫术。

又据《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三《吴湊传》载:“湊既疾,不召巫医,药不入口,家人泣而勉之。”^{[30] (卷183)4749} 此处“巫医”两字或作“巫、医”两类人,或作“巫医”群体。若是巫和医,外戚吴湊患疾病,当有宫中太医亲为治疗,也会有巫以其术参与其中。若作为巫医群体来理解,则表明当时仍存在巫医不分现象,巫医便是那些既懂得符咒等巫术又掌握部分医疗知识和技术的特殊医者。

《酉阳杂俎续集》卷二《支皋中》中记载唐宪宗

时李固言与老姥及其女儿女巫董氏之间的故事:

相国李公固言,元和六年,下第游蜀,遇一老姥,言:“郎君明年芙蓉镜下及第,后二纪拜相,当镇蜀土,某此时不复见郎君出将之荣也。”明年,果然状头及第,诗赋题有人镜芙蓉之目。……巫有董氏者,事金天神,即姥之女,言能语此儿,请祈华岳三郎。如其言,诘旦,儿忽能言。因是蜀人敬董如神,祈无不,富积数百金,恃势用事,莫敢言者^[32]。

由上可知,李固言在蜀地遇到老姥为其预言之后的仕宦之路。二十年后,老姥拜见李固言,又告知其有“出将入相”之命。在李固言坐镇蜀地时,外孙九岁不能言语,后寻访老姥之女女巫董氏为其外孙医治。故可推知董氏之术兼及医学治疗之术和巫术祈福鬼神之技。

考察此则故事,主要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李固言的仕宦经历、段成式对李固言的描述态度、蜀地这一地域在唐朝末期的特殊性、女巫在文中的作用。其一,李固言入仕历经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数朝,身处牛李党争之间却不参与矛盾与纷争。其二,李固言于文宗开成二年(837年)“以门下侍郎平章事出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30](卷173)4506-4507}。而段成式之父为蜀中名吏段文昌,穆宗长庆元年(821年),朝廷因为段文昌年少时长于西蜀之地,授予其西川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职。在蜀地为官之时,“文昌素洽蜀人之情,至是以宽政为治,严静有断,蛮夷畏服”^{[30](卷167)4368-4369}。可见段文昌对蜀中之人的情意和在蜀地的卓然政绩。段成式

作为文昌之子,对蜀地之民和政事当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对之后担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李固言也当是一种认可和赞扬的态度。其三,蜀地这一地理区域在秦汉文人笔下多被当作蛮荒偏远之地,但历经东晋、南朝及唐朝安史之乱后人员的大举南迁,蜀地不再是中原王朝的边疆地带,它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等情况逐渐为时人所关注,仅从唐朝中晚期来看便有玄宗、僖宗入蜀躲避战乱,可见蜀地独特的防守优势。又知此时期文人之间掀起一股入蜀热潮,因此唐代文学作品中便有诸多蜀地风光、人物的描绘和呈现。其四,老姥及其女儿女巫董氏的出现似乎是为引出李固言的仕宦经历,将神秘的占卜、巫术运用在朝廷官员身上,又为其政治生涯平添一丝传奇色彩。

四、结语

在唐代社会中,女医既是男医治疗女患疾病的辅助者,又是直接为女患提供医疗帮助的医者。她们的产生和存在是为解决儒家男女有别观念所造成的男医接触女患时的不便。当唐代女医有了活动空间后,医学技术的获取便很重要。《天圣令·医疾令》中唐令第9“女医”条记载了当时宫中女医的选取、教育及考试方式。民间女巫在巫术遗留的基础上,也掌握某些疾病医治之法。然而唐代正史和传奇小说中所记载的“女巫”多为撰写者虚构之形象,我们必须从书写者、被书写者、受众、写作背景等多角度分析“女巫”的形象塑造,进而理解其中的文本书写。另外,从职责和技术上来看,不论是宫中女医,还是民间女医,抑或是女巫,她们都在唐代妇女生产、患病时提供医疗帮助和健康照顾,都可以包含在本文所要叙述的女医群体之中。

[参考文献]

- [1] 李贞德. 女人的中国医疗史[M]. 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8.
- [2] 李贞德. 性别、身体与医疗[M]. 北京:中华书局,2012.
- [3] 李贞德. 唐代的性别与医疗[C]//邓小南. 唐宋女性与社会.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415-446.
- [4] 赵刚. 隋唐时代的医学教育[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0(5):7-13.
- [5] 谢萌. 隋唐时期医人群体研究[D]. 西安:西北大学,2015.
- [6] 于赓哲. 唐代的医学教育及医人地位[J].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料,2003,20:155-165.
- [7] 陈昊. 晚唐翰林医官家族的社会生活与知识传递——兼谈墓志对翰林世医的书写[J]. 中华文史论丛,2008(3):345-392.

- [8] 宋丽华,于赓哲.中古时期医人的社会地位[J].唐史论丛,2011(3):234-249.
- [9] 陈昊.书写的权力与生活的世界——唐代士人笔下医者之诸面相[J].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13,14:51-64.
- [10] 王思瑾.唐代知识阶层笔下的医学叙事[D].哈尔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2016.
- [11] 李志生.中国古代妇女史研究入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 [12] 程锦.唐代女医制度考释——以唐《医疾令》“女医”条为中心[J].唐研究,2006,12:53-71.
- [13] 程锦.唐代的女医教育[J].文史知识,2007(3):66-70.
- [14] 于赓哲.《天圣令》复原唐《医疾令》所见官民医学之分野[J].历史研究,2011(1):36-50.
- [15] 楼劲.释唐令“女医”条及其所蕴之社会性别观[J].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18,37:94-114.
- [16] 宋镇豪.商代的巫医交和医疗俗信[J].华夏考古,1995(1):13+77-85.
- [17] 赵容俊.甲骨卜辞所见之巫者的医疗活动[J].史学集刊,2004(3):7-15.
- [18] 秦卿.魏晋时期“巫”“医”特点与社会地位探析[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1):109-111.
- [19] 王晓玲.试论女巫与唐代社会生活[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4.
- [20] 李小红.巫覡与宋代社会[D].杭州:浙江大学,2004.
- [21] 班固.汉书[M].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
- [22] 刘向.古列女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5:231.
- [23] 王慧芳,楼绍来.中国古代女医初探[J].上海中医药杂志,1982(3):37.
- [24] 蔡洁.女性与史学:概念之争与方法之辩——中外女学者分享“我与女性史研究”[N].中国妇女报,2018-10-23(B2).
- [25] 孙希旦.礼记集解[M].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
- [26] 李建民.生命史学——从医疗看中国历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6.
- [27] 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6.
- [28]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读书班.《天圣令·医疾令》译注稿[J].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2016,10:210-229.
- [29] 程锦.唐代女医选取之制考释[N].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6-11-09(3).
- [30] 刘昉,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31]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244-1245.
- [32] 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M].方南生,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215-217.

Research on the Group of Female Doctors in Tang Dynasty

XU Yan-qin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Female doctors in Tang Dynasty were not only assistants of male doctors in treating female patients, but also doctors who directly provided medical assistance to female patients. Their emergence and existence solved the inconvenience of male doctors caused by Confucian concept of male and female differences when they contacted female patients. The acquisition of medical technology for female doctors included the education of official institutions and the imparting of folk experience. The witches recorded in the official history and some legendary novels of the Tang Dynasty needed to be analyzed in their images and writings from perspectives of the writers, written objects, audiences, writing background and others.

Key words: Tang Dynasty; female doctors; *Decree of Medicine and Diseases*; witches

· 女性文化研究 ·

吉本芭娜娜小说的空间叙事与女性意识

郭燕梅

(山东政法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山东大学,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日本当代女作家吉本芭娜娜以一部特色鲜明的空间小说《厨房》登上文坛,该小说将女性与“厨房”这一家庭空间密切结合,讲述了少女美影重燃人生希望的故事。芭娜娜小说中的空间可能是隐秘的“厨房”,可能是介乎内外空间的“院子”,还可能是虚拟的网络世界。空间不仅是芭娜娜小说的叙事舞台,还是其表征人物性格、编排叙事结构、推动故事情节的有效方式。这在其小说《厨房》《蜜月旅行》《橡果姐妹》等作品中均有很好的体现,以其中的空间叙事为中心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作者对置身不同空间中的女性处境的关照,还可一并管窥其作品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吉本芭娜娜;《厨房》;《蜜月旅行》;《橡果姐妹》;空间叙事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9)05-0082-08

一、引言

小说作为一种叙事文学,其故事情节的展开与人物形象的塑造总是离不开一定的时空背景。所谓时空,即时间与空间。有学者认为,时间与空间的相融之处在于“时间特征在空间中伸展开来,空间由时间维度来衡量,时间和空间共同决定艺术样式的布局、体裁、艺术主旨和审美价值”^[1]。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这二者密不可分,在小说创作中同等重要。在《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一书中,巴赫金写道:“在文学中的艺术时空体里,空间和时间标志融合在一个被认识了的具体整体中。时间在这里浓缩、凝聚,变成艺术上可见的东西;空间则趋向紧张,被卷入时间、情节、历史的运动之中。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

量。这种不同系列的交叉和不同标志的融合,正是艺术时空体的特征所在”^[2]。日本学者和辻哲郎在《风土》中将人的存在阐释为作为个体的“人”的存在和作为人的集合或共同体的社会性存在。他认为要把握人的存在,就必须“空间和时间同时被捕捉在其根本形态中,两者相即不离。仅拿时间来把握人之存在,会导致片面地只从个人意识的深层去寻找人之存在。如果认为人之存在的两面性是人的本质的话,就必须同时找出与时间相对的空间才行”^[3]。基于现代学界对“时空体”这一概念的认识以及对空间这一维度的重视,作家在小说创作的过程中有意识地重视空间维度,在特定的空间背景下展开叙事,利用空间表征人物性格,表达文学诉求,以实现文学的现实意义。

收稿日期:2019-06-1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21世纪日本文学主题研究(2000—2018)”(项目编号:18YJA752003);山东政法学院校级科研项目“都市女性的言说——吉本芭娜娜文学研究”(项目编号:2018Q03B)

作者简介:郭燕梅,女,山东政法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日本近现代文学、日本女性文学研究。

日本当代女作家吉本芭娜娜自1987年登上文坛,至今已逾30年。在这30余年间,芭娜娜发表小说50多部,随笔40余部,合著20余部,可谓多产。以《甘露》(1994年)为界,自《厨房》(1988年)以来的“第一期吉本芭娜娜”结束,芭娜娜坦言“从今往后会判若两人,写出迥异于以往的作品”^[4]。近十年之后,芭娜娜在小说集《尽头的回忆》(2003年)的后记中写道:“或许,我是想在待产期间,尽快把过去痛苦的事情全部清算掉吧?”^[5]缘此,笔者将芭娜娜至今的小说创作梳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与第二期以《甘露》为界,第二期与第三期以《尽头的回忆》为界。芭娜娜在小说创作中巧妙地运用“空间”这一维度,通过空间表征人物性格并推进叙事,关注不同空间中的人,尤其是女性的生存状态。父亲吉本隆明在与芭娜娜的对谈中指出,芭娜娜小说的特征之一不是写人物,而是写一个“场”。芭娜娜就是让小说中的人物在“喜欢”的“场”中出现,如果是十分喜欢的“场”,其中的人物关系会发生改变,甚至会发展为诸如恋爱、同居等亲密关系^[6]。这里的“场”,即空间。在芭娜娜的创作观念中,作品中的人物关系在特定空间中可以形成或改变。正如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 1905—1991年)在《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一文中所指出的,“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7],空间无疑代表着一种社会关系。

本文聚焦其《厨房》(1988年)、《蜜月旅行》(1997年)、《橡果姐妹》(2010年)等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中的空间书写,运用空间叙事等相关理论,分析其中的空间叙事以及不同空间所承载的丰富内涵,并尝试探讨芭娜娜小说的空间叙事特点。同时,将小说中涉及的厨房、院子、网络等空间与女性结合,分析置身于不同空间中的女性对成长、家庭、婚姻、爱情等问题的思考,揭示芭娜娜小说中的女性视角与女性意识,并进一步管窥其文学的现实意义。

二、隐秘与开放的空间——美影的厨房

关于日本人生活空间的“内”与“外”,芦原义

信在《街道的美学》中指出,“内”即家,家以外的空间就是“外”。他从建筑空间领域上重新认识“家”的内涵,这里的“家”不仅指住宅本身,还指那些即便不属于私人住宅,但依旧能够脱了鞋进去,穿着便衣自由阔步的舒畅空间,例如日本的温泉观光旅馆^[8]。厨房作为内部空间,为家庭成员提供一日三餐,是住宅中必不可少的构件,属于“内”的部分。在传统建筑中,厨房往往被置于住宅的角落,是一个隐秘的空间。关于物理性空间的住宅与住宅所承载的“家”的抽象意义,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为了突出住宅与“家”的密切关系,将住宅称作“家宅”,“家宅是我们在世界中的一角。我们常说,它是我们最初的宇宙。它确实是个宇宙。它包含了宇宙这个词的全部意义”^[9]。“家宅”是“最初的宇宙”,“宇宙”一词本身就具有包罗万象的开放意义。而在芭娜娜笔下,厨房成了这个“最初的宇宙”的核心,因此芭娜娜小说中的“厨房”兼具隐秘与开放之特性。此外,制作一日三餐的工作主要由妻子、母亲等女性成员承担,厨房里流动着女性气息,是女性主要的活动空间。

小说《厨房》是芭娜娜的早期代表作之一。主人公樱井美影失去所有至亲后倍感孤寂,只有在厨房的冰箱旁方可安睡。幸运的是,曾受她祖母关照的田边雄一与他的变性人母亲惠理子将她收留,并给予她重振旗鼓的勇气。

小说开门见山地叙述了主人公对厨房的依恋。“在这个世界上,我想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厨房。”“即便是一间邈邈得不行的厨房,我也难抑喜爱之情。”^[10]“厨房”成了小说叙事的“舞台”。由于祖母的离去,倍受重创的美影仿佛进入了“宇宙黑洞”,被悲伤、不安、虚幻等不良情绪笼罩着。“这所房子,我生于此长于此,而时间是这样无情地流走,如今竟只有我一个人了。”^[10]厨房这个小小的空间,撩拨着主人公的孤独。她躺在厨房的冰箱旁边感受着“家庭”所剩无几的温暖。厨房“闪着寂静的微光”,仿佛与主人公一起体味着孤独煎熬。这里的厨房除了是烹饪场所之外,还兼具了卧室的功能。在寄宿田边家之

前,美影每天都睡在厨房。厨房原本是日常性的存在,提供一日三餐,是家庭中最具生活气息的场所。随着至亲接踵离去,尤其是祖母,作为主宰厨房的女性撒手人寰,厨房的传统空间意义面临消亡,家庭内部的秩序也因此被打破。“日本的传统是在家的内部建立起井然的秩序,以家族为中心,在一幢建筑里保持着内部秩序”^[8]。随着维护家族内部秩序的中心人物祖母的离去,家族解体,传统也将随之崩塌,由此足见女性对于家族与传统的重要意义。秩序混乱时期的厨房开始演化为主人公承受孤独、舔舐心灵伤口的港湾。孤独疲惫的美影甚至想到了死亡,“什么时候死亡降临时,能死在厨房里就好了。无论是孤身一人死在严寒中,还是在他人的陪伴下温暖地死去,我都会无所畏惧地注视着死神。只要是在厨房里就好”^[10]。此时的厨房是她孤单一人时唯一的陪伴,甚至给予了她面对死亡的勇气。

厨房对美影来说几乎代表了“家”的全部含义,是她理想的容身之地。正如加斯东·巴什拉所言,“在人的一生中,家宅总是排除偶然性,增加连续性。没有家宅,人就成了流离失所的存在。家宅在自然的风暴和人生的风暴中保卫着人。它既是身体又是灵魂。它是人类最早的世界”^[9]。如今,美影传统的“家”不复存在,她不得不寻找新的“家”,于是她接受了田边的邀请。到了田边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宽大、明亮的厨房以及与厨房相连的客厅中的沙发。田边家的厨房,整整齐齐地摆放着“日常所需最小限度”的厨具,“银石涂层的平底煎锅和德国产的削皮器”,还有“硕大的盘子”“带盖的啤酒杯”等等。目睹这些与厨房相关的器物,“我不住点头,四下看看。这个厨房,我第一眼就深深地爱上了它”。在陌生人的家里,“我却没有孤独之感。这也许就是我一直在等待的吧”^[10]。与美影家阴郁昏暗的氛围相对照,田边家给人的感觉始终是阳光灿烂的。小说中反复使用“晨光炫目”“洒满阳光”“灿烂耀眼”“暖阳高照”等词渲染田边家的明媚与美好,正是这些美好的感受让美影决心在这个家寄宿下去,开始探索属于自己的女性成长之

路。

美影家的厨房由于传统女性祖母的存在,传统的厨房是隐秘的空间。而田边家的厨房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开放空间,给了初来乍到的美影一种从未有过的解放感。在这里,美影的听觉、视觉、触觉和嗅觉都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感受。在田边家的厨房里,美影遇到的另一位厨房的女主人——变性人母亲惠理子。田边家的这种明快灿烂的气氛无疑来自于这位“太阳”般存在的女性。清晨,惠理子在厨房中活动的声音唤醒“我”,她明快地与“我”打招呼。这种安心感日渐延伸,与雄一和惠理子共同生活、一起吃饭谈笑的日子成了美影人生中“无比幸福”的“夏日”回忆。惠理子的歌声、脚步声、开门声、浴室的水声等所有的这一切,都如交响乐一般,使美影倍感舒适与安心。惠理子,原本是田边雄一的父亲,在妻子去世后,“说是,反正今后再也不会喜欢别的人了”^[10],就变性为女人成了他的母亲,靠开变性人酒吧抚养雄一成人。变性人惠理子是这个家的“太阳”,是既非父亲亦非母亲的精神领袖般的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是“由亲子关系、夫妻关系等关联的人们之间的小规模集团”^[11]。田边家则将这种传统的家庭模式解构,并经过艰难的探索建构起了一种新的家庭模式。此外,还接纳了美影寄宿其中。看似不凡的家庭并未让人感到不适,生活其中的美影反倒觉得舒适自在。反观以血缘维系的传统家庭,美影在回忆起与祖母的共同生活时感慨道:“无论老人和孩子是多么快乐地生活着,还是会有无法填满的空间”^[10]。以前与祖母的生活虽有血缘维系,精神上却还是感到莫名的缺失。芭娜娜在解构了传统家庭模式的同时,又探索出一种不拘泥于血缘与法律的新型家庭模式。维系这种新型模式的纽带既非血缘也非婚姻,而是各自独立的精神。

在小说的结尾处,作者写道:“梦中的厨房……我会拥有许许多多厨房,在心中,或是在现实中,又或是在旅途中。有一个人单独的,有大家共有的,有两个人的,在我人生路途的所有

站点,一定到处都会存在的”^[10]。传统厨房的隐秘为突遭变故的美影提供了短暂疗伤之所,但现代厨房的包容与开放则给予了美影重塑人生的勇气以及今后的人生梦想。芭娜娜笔下的“厨房”,既是一个真实的空间,又是一个存在于意识中的想象空间,“既是温饱的保障,又是家庭温暖的象征,属于女性空间”^[12]。传统女性在厨房劳作、抚育后代,现代女性则赋予厨房这一空间更多的抽象意味,使其成为女性独立成长、追求自我的原点。

三、缓冲与容纳的空间——真加的院子

如果说厨房是哺育生命、慰藉灵魂的人文空间的话,那么庭院则是人为创造的自然空间,既是连接内部住宅与外部街道的缓冲地带,又是容纳与化解的空间。不仅如此,院子还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女性之女性意识向外界的进一步延伸。女性不再被禁锢在某一个封闭的空间,而是置身于这方寸自然之间,看花开花落、四季轮回,去思考生死、体悟爱情、实现成长。

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庭院空间因其历史、地理以及风俗文化之不同而各具特色。日本传统的庭院空间,其造园艺术别具一格。例如,江户末期的汉诗大家广濑旭庄表现夏日庭院的诗作《初夏偶成》中的诗句“街居犹觉远尘嚣,三面高墙护小园”^[13]，“街居”却不受尘嚣之扰,究其原因乃是“三面高墙”之内的“小园”,也就是院子,由此可见庭院隔离内外、缓冲干涉的作用。由于生活方式欧化、人们居住观念的变化等,现代都市中的个人住宅已较少见到传统庭院。即便如此,不论多小的面积,日本人都都会种植花草以营造自然景象,打造出属于私人的一方庭院空间。小说《厨房》中,田边家居住的是高层建筑,没有属于自己的院落。即便如此,主人仍在阳台的大玻璃窗前摆放花草,营造出一个热带丛林般的自然景观。跟随着美影的目光,我们看到“阳台的大玻璃窗前,摆满了一盆盆一罐罐的花草,简直像是热带丛林。细看,家里到处是花,每个角落都摆放着各式各样的花瓶,里面装饰着时令鲜花”^[10]。不仅窗前,甚至可以说整个住宅空间

都兼具着院子凝缩自然的功能。

在芭娜娜的诸多小说中,《蜜月旅行》这部小说对“院子”这一空间着墨最多。该小说讲述了少女真加和少年裕志的情感故事。两人从小一起长大,日久生情,高中毕业后马上结婚了。不料爷爷突然离世,使裕志本就晦暗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为了逃离这样苦闷的日常生活,两人决定踏上旅途探寻生命真谛。小说共分九部分,第一部分“真加的院子”反复描述了“院子”这一空间,表达了真加对“院子”的挚爱,“我从小就喜欢自家的院子。它并不是那么大,但和房子一比,面积就算很大的了”^{[14]3}。真加家的院子是一个真正的庭院空间。因其母亲酷爱园艺,在院子里种植着各种植物,里面既有可供食用的植物,也有供观赏的山茶花等开花树木,“点景石交错成趣”。真加贪恋院子带来的“辽阔而悠远”的感觉,置身院落之中,女性的幻想被唤醒,仿佛将自己融入这自然缩影当中,几乎成了院子的一部分。

院子除却是一方自然的缩影,还是一个阻隔外界干涉的缓冲地带。置身于这“没有墙壁也没有天花板”的院落,时间被静止,空间成为永恒。“无论身处何处,当不安蓦然袭来,我有时便会在心中让自己不知不觉间返回院子里。院子是我感觉的出发点,是我永远不变的基准空间。”^{[14]4}院子对于真加的意义就好像厨房对于美影的意义,置身其中,人物的情感可得到尽情宣泄,又不为外人所知。正是由于院子的缓冲与隔离,仅由“一道矮矮的篱笆墙”隔开的两家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氛围。裕志家是一座日式老宅,没有庭院。裕志的父母因热衷某种神秘信仰在他年幼时移居海外,将他丢给爷爷抚养。后来,裕志的父亲死于邪教组织的集体自杀。裕志的家本就“弥漫着一股好像混合了霉味和线香味的怪味”,在裕志的爷爷去世后,这种阴郁怪异之感愈加强烈。作者用“冷寂得恐怖”“寂寥”等词形容裕志家的氛围。裕志在整理爷爷的遗物时,这种阴郁寂寥之感更甚,仿佛要将他和这个家一并吞噬。篱笆墙另一边的真加家是新式的商品房,有一个大院子。真加的母亲虽不是亲生母亲,但“由衷

地疼我爱我”，一家三口以及小狗奥利弗一起过着温暖幸福的生活。

作者一再用“另一个世界”“另一个宇宙”等词来表明一墙之隔的两个家庭的氛围之差。早春时节，院子里已经能够感到“微微暖意”，但是院子另一端的裕志家仍是“寒冷的世界”。在明亮与晦暗、温暖与寒冷、生机与死寂的对照中，我们更能够体味院子这一空间所具有的意义。

此外，院子作为一个空间还具有容纳功能。与农家院里收纳用具等不同，真加家的院子容纳并化解着种种情绪。首先就是面对死亡时的心痛之感。裕志的爷爷在初春时去世。尽管裕志一直十分担心爷爷死去，但生老病死这样的自然法则无人能例外。裕志选择独自面对爷爷的离去，希望一个人整理爷爷的遗物。在整理的过程中，尤其是清理那个“阴森可怕到极点”的巨大祭坛时，裕志发现了更多可怕的秘密^{[14]27}。正是祭坛上这些邪恶之物所代表的力量，夺走了裕志的父母、童年与家庭。掩埋了从祭坛清理出的可怕物什，焚烧掉各种恐怖纸头之后，所有悲哀、不幸、神秘的诅咒消失在院子里燃着的火堆里。不久之后，一直陪伴两位主人公的小狗奥利弗也死了。奥利弗死于樱花时节，真加和裕志守着奥利弗的遗骨，深感“在我们中间，一个时代结束了”^{[14]18}。主人公们不仅一次又一次地与死亡相遇，还初次体味到了青春的丧失感，结束的这个时代就是主人公们的青春。面对死亡与丧失，真加不禁思考与叩问生命之意义，“既然迟早要回归泥土，为什么还要出生、生活？”^{[14]29}主人公最终在院子里觅得这个问题的答案。作为自然的缩影，院子里的四季变迁就像严谨的日本茶道一般，程序流转毫无多余，“花开花落，枯叶落地，所有一切将在下一时段不知不觉间形成渊源”^{[14]54}。人类自然也不会例外，缘此，面对目前的处境，真加决定不再纠结沉溺于裕志消沉的情绪中，而是尽可能活在当下，做好眼前事，不去做无可挽回之事。

真加借由院子这一空间展开女性思索，她从女性视角出发，从日常生活的点滴思索爱情、家

庭等女性话题。在两个人的爱情里，裕志是“沉默不语”的存在，他依赖真加，却毫无言语表达。尽管如此，真加依然能够体会到裕志的爱，“他的爱，宛若开放在空壳里的一株小小的雏菊”^{[14]19}。在真加看来，裕志的爱静谧恬淡，自然不造作。真加珍视这样的爱情，愿意陪伴裕志面对人生的种种不幸遭遇，静静地等待裕志重新振作。陪裕志清理完爷爷的遗物和可怕的祭坛之后，真加的继母建议他们去真加生母所在的城市——布里斯班旅行。回想起与父母相处的点滴，经过一大段心理独白之后，真加又联想到院子，“我是非常现实的。若非如此，院子不会带给我冥想空间，院子里的风景将变成容纳我娇纵的心的延伸，即被随意排放的美梦的空间”，紧接着又说，“父母则恐怕在疼爱我这个拥有不太可谓一般的经历的女儿的同时，内心某处却早已想要赶我出门”。尽管如此，真加却坚信自己对院子的深厚情谊，“即便成了老太太也依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待在院子里度过余生”^{[14]66}。这一段描述中的“院子”，是家庭的象征，真加对于自己与院子之间的关系的思考，事实上是对自己与家庭的关系的反思，不管身处何种境遇，家总是人们避风的港湾。

陪伴裕志重新振作的过程中，真加还悟得许多人生真谛。例如，小说中将事物复原的过程与四季变迁相类比，“事物复原的过程是赏心悦目的，和季节的变迁相似。季节决不会变得更好，叶落叶茂、天青天高，只不过像一种发展趋势而已。和这一过程很相似，当我们的心情恶劣到以为世界末日来临，那种状况却一点点地发生变化，尽管并非有什么好事发生，我们却从中感觉到某种伟大的力量”^{[14]77}。本部分结尾处，作者也写道：“即便被迫闭居高楼大厦的一室，山川河海皆不得见，但只要体内鲜血奔流，人就能沿着类似于大自然流转的生命之河活下去”^{[14]77}。在院子里，关于爱情、家庭、生命等的思考，使得少女变得更加坚定、独立、善解人意，最终在布里斯班壮丽的海边，两位主人公消除了彼此之间的隔阂，开始谋划未来的日常生活。

四、禁锢与自由的空间——橡果姐妹的网络空间

厨房、院子都是实实在在地存在于现实中的生活空间,被人们赋予了种种内涵。随着信息科技的进步,网络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虚拟的网络空间为人们提供了便捷的交流平台,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在芭娜娜的小说中亦有所体现。小说《橡果姐妹》依托网络空间展开叙事,主人公是一对性格迥异的姐妹,姐姐叫橡子,妹妹叫果子。两人的父母原本是一对充满童心的恩爱夫妻,因一次交通事故双双离世。失去父母之后,姐妹俩辗转寄宿在亲戚们家中。她俩先是在静冈县的叔叔家度过了平静的童年时代,后来叔叔猝死,婶婶改嫁,万般无奈之下,她们被姨妈收养。正是这段寄宿姨妈家的日子,导致了妹妹果子的自闭与抑郁。后来,在律师的斡旋之下,她们开始与性格怪异但品行高洁的爷爷一起生活并照顾他直至其离世。姐妹俩在与爷爷相处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重要的东西,在爷爷离世后开设了名为“橡果姐妹”的交流网站,通过网络与人交流,安慰别人的同时也解开了自己的心结^{[15]1}。

所谓的网络空间,是“一个概念空间、符号空间、思维空间,也即一个自为的人造空间,而非一个自在的实存空间或物理空间”^[16]。网络空间延伸和拓展了日常空间的领域,尤其是人们的话语空间。女性开设网络空间,是女性主导自我话语权的一种表现,同时,也是女性向公共空间迈进的途径之一。《橡果姐妹》中,姐妹俩开设网站的目的是为了提供一个“与人聊天来排遣心中的烦闷”的空间,网站的指导理念是“想给人写信,却不想写给熟识的人。就是这种时候的绝佳选择”^{[15]2}。姐姐负责写信,妹妹负责提建议以及其他事务性工作。“在网络社会中,情感和文化认同会促成一种集体的默契行动。”芭娜娜笔下的网络空间叙事也是如此,橡果姐妹通过网站与深陷困苦中的陌生女性交流,实现了女性之间的互助。

父母离世后,俩人在静冈县的叔叔家寄宿的

童年时光是平静而美好的,“到处是一派自然景象,晚霞那么灿烂,星星月亮也都闪闪发光,随处是温泉,冬天比较温暖,春天万物焕发出勃勃生机”^{[14]15}。然而好景不长,不久后叔叔心肌梗塞猝死,婶婶改嫁他人,姐妹俩只好由本就与母亲关系不和的姨妈暂时收养。在姨妈家的日子,她们体会到了“寄人篱下”的压抑。由于对都市生活的厌倦,再加上姐姐因不愿接受姨妈安排的相亲而离家出走,妹妹果子频繁出现幻觉、幻听等精神异常现象,孤独的少女干脆将内心封锁了起来。虽然最后果子被姐姐从姨妈家解救出来,但是这样的少年经历,造成了果子日后的幽闭性格。不管是在姨妈家,还是后来被姐姐接到爷爷家,从一所房子到另一所房子,空间的改变并未使果子的内心症结得到改善。果子可以几天闭门不出,姐姐外出后,“家里的空气仿佛全然凝固不动”,“这半年来,我去过的地方就只有这家超市、DVD出租屋、书店,再就是星巴克了。”果子幽闭自我,认为“世道奇怪,反而是人更令人感到害怕”,对现实世界的人与事物十分抗拒,甚至觉得“现实世界全部是我内心反映并创作出来的,也未必是谎言”^{[15]3-9}。

姐姐橡子似乎比妹妹看起来坚强独立、勇敢固执,更具有反抗意识与叛逆精神,是妹妹的“城堡”。姐姐拒绝了姨妈安排的相亲并离家出走这件事,足以证明其反抗与叛逆的性格。此后,虽然姐姐仍常常会陷入爱情,但她只顾享受爱情初始的甜蜜,拒绝长久稳固的婚姻。对于恋爱的态度,姐姐认为比起构筑一个家庭,更应关注爱情中自己的样子,这又是姐姐强烈的女性主体性的一种体现。下面一段引文可为佐证。

我喜欢谈恋爱,喜欢它带给我的无限遐想,喜欢在他和我面前膨胀得慢慢的空间。……虽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想我并没有把对方当做一个人来看待,而只是去想象和他在一起自己会怎样?只是想沐浴在由那个人所引发的想象的洪流之中^{[15]85}。

橡果姐妹通过网络与外界交流,生活空间似

乎得到了无限延伸,但事实上她们依旧沉浸在自我意识构筑的狭小空间里。与她们邮件往来的也都是些寂寞孤独的人,因在现实中没有可诉说的对象或者个人烦恼难以与身边人分享,因而通过网络途径来实现宣泄。这些烦恼可能来自因照顾生病的家人而无法外出旅行而苦恼的“咪咪”,还可能是与丈夫死别,满脑子都是与丈夫有关的回忆的“安美”。总之,都是内心苦恼但无法与人诉说,或者找不到倾诉对象的女性。姐妹俩开设的网站,为这些孤独苦恼的灵魂提供了一个安放之所。“在回旋于宇宙空间的意识夹缝里,我们编织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在这个夹缝的空间里,我们橡果姐妹结成像蜘蛛一样的巢,构建出一个小小的空间。”^{[15]7}但是,网络的存在也并非全都是益处。网络一方面为人们彼此间的交流提供了快捷的方式,另一方面却阻隔了人与人面对面的交流。这种现象也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正如文中所言:“谁都会认为问题是私人的,而实际上在这无限的空间之中,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着的,这才令人不安。”^{[15]7}正是这种不安,让人们更加禁锢自我,以此来保护自己脆弱的内心。

风暴再大亦有风平浪静之时。爷爷的去世让她们不得不面对生死以及财产等复杂问题。再加上姐妹俩开设橡果姐妹网站,收到各种各样的来信,闻得诸多故事,看过百态人生,从中悟出属于自己的人生哲理,那便是遵循自然与常规,顺应潮流,随着潮流变化去改变自己。从爷爷的离世、姐姐的恋爱到网友的来信,再到梦中出现的初恋男友阿麦,橡果姐妹似乎重生了。循着回忆与梦境以及安美女士的来信,妹妹果子预感到了初恋男友的离世,这个消息同时也得到了中学同学的证实。世界处在联系之中,如同网络一般充满暗示。果子终于意识到自己“消沉”“蛰伏”的原因正是阿麦的离去。当果子手捧鲜花来到阿麦的家乡,并在游艇码头偶遇阿麦的母亲时,内心深深的歉意、青春的回忆、压抑许久的悲伤一并涌上心头,随之即“飘散于风中”。果子决定去迎接新的人生,从“头”开始,去做了时尚的发

型,购置了喜爱的新衣,谋划着一场旅行。对于姐姐的感情生活,果子也希望姐姐“不再偏执于性爱,而能踏出找寻男女关系中的真爱与关怀的第一步”^{[15]88}。

小说在姐妹俩的冲绳之旅中落下帷幕。芭娜娜通过《橡果姐妹》的字里行间营造了一个幽闭的生活空间,这种幽闭特性体现在现实、梦境以及虚拟的网络世界中。即便如此,灵魂却跃跃欲试,意欲冲破这牢笼,重获自由与安宁。网络空间的出现,为女性的内心隐秘提供了言说的平台,并有了得到回应的可能性,女性的话语权不再受到束缚,女性可以自由发声去表达自己,由此,女性才能走出伤痛的阴霾,去勇敢地面对人生。

五、结语

芭娜娜的小说总是在某个空间中展开,这个空间可能是厨房、院子,抑或是虚拟的网络,既是物理性空间,又是精神性空间。通过上文分析可知,芭娜娜描写的空间在现实中大多是私人的、隐秘的、微观的空间,对公共的、开放的、宏观的空间不甚涉及。芭娜娜注重空间给人们带来的精神抚慰,对其所具有的政治意义等命题不够关注。这是芭娜娜小说中空间叙事的特点,也是芭娜娜一直坚持的创作理念,即希望人们读毕小说能获得某种慰藉。芭娜娜所描写的这些空间,都与女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置身其中的女性思考生命、家庭、婚姻以及爱情等女性问题,勇敢地追求自我、自立与自由,体现了芭娜娜对女性生存与成长的关注。

如上论及的空间中,厨房为人们提供一日三餐,在倡导“贤妻良母”的日本传统社会,女性被禁锢于家中,往往因反叛父权夫权而厌恶厨房,渴望逃离厨房的桎梏,而芭娜娜笔下的女性美影却强烈地热爱着厨房,并且从厨房中获得慰藉与希望。院子是内部住宅与外部社会的中间地带,能够阻隔外界干涉,消解人的情绪,是女性思考与成长的原点。网络空间则进一步延伸与拓展了女性的话语空间。总之,不同的空间场域在芭娜娜的小说中登场,并生产出了更加开放的家庭关系、更加和谐的两性关系以及更加多元的人际

关系等新型的社会关系。这些正是现实社会的需求在文学中获得的回应。伴随着日本社会经济水平的发达,信息化社会的日渐跃进,人们的精神家园越来越贫瘠,“低欲望社会”“下流社会”“女性贫困”“平成废物”等一个个标签警示着日

本社会中涌动的重重危机。芭娜娜小说中描写的年轻男女在面对死亡、失恋等人生困顿时,总是想方设法地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以寻求自我的生命价值。从这一点上看,芭娜娜的小说对当今日本社会又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 章小凤. 时空体[J]. 外国文学,2018(2):87-96.
- [2] M·巴赫金. 巴赫金全集:第三卷[M]. 白春仁,等,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274.
- [3] 和辻哲郎. 风土[M]. 陈力卫,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0.
- [4] 吉本ばなな. ばななのばなな[M]. 東京:メタローグ,1994:301.
- [5] 吉本芭娜娜. 尽头的回忆[M]. 周阅,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194.
- [6] 吉本隆明,吉本ばなな. 吉本隆明×吉本ばなな[M]. 東京:ロッキング・オン,1997:121-124.
- [7] 包亚明. 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48.
- [8] 芦原义信. 街道的美学(上)[M]. 尹培桐,译.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12-13.
- [9] 加斯东·巴什拉. 空间的诗学[M]. 张逸婧,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3-6.
- [10] 吉本芭娜娜. 厨房[M]. 李萍,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3-37.
- [11] 波平惠美子. 系统看護学講座:基礎9文化人類学[M]. 東京:医学書院,1995:49.
- [12] 肖霞. 日本现代女性文学的主题表达与价值取向[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157.
- [13] 严明. 花鸟风月的绝唱——日本汉诗中的四季歌咏[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87.
- [14] 吉本芭娜娜. 蜜月旅行[M]. 张唯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 [15] 吉本芭娜娜. 橡果姐妹[M]. 李萍,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The Space Narrative and Female Consciousness of Banana Yoshimoto 's Novels

GUO Yan-meì

(Shandong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Jinan, 250014;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The contemporary Japanese female writer Banana Yoshimoto entered the world literary stage with a space novel *Kitchen*. Combining the females with the family space of “kitchen”, this novel tells the story of the life revitalization of a girl named Mikage. The space in Banana’s novels may be a private “kitchen”, a “yard” between the inside and outside space or a virtual online world. Space is not only the narrative stage of Banana’s novels, but also an effective way to characterize characters, arrange narrative structures, and promote the plot movement. This is well reflected in her novels like *Kitchen*, *Honeymoon*, *Donguri Shimai*, etc. From the spatial narrative analysis, the concern about females in different spaces can be easily seen and it will also be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significance of her literary works in reality.

Key words: Banana Yoshimoto; *Kitchen*; *Honeymoon*; *Donguri Shimai*; Space Narrative

(责任编辑 赵莉萍)

· 女性文化研究 ·

性别的单一自觉

——1990年代女性文学话语生产的再考察

张 开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97)

摘 要:反观1990年代女性文学创作不难发现,由于受限于单一的性别话语,女作家在兹念兹的性别议题实际中只能有限地介入女性群体所面对的社会、文化生活,因而无法在知识分子阶层以外的读者中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其研究往往专注于文本的故事和叙事层面,虽然能够从文学性角度衡量1990年代女性文学创作的利弊得失,但是却忽略了1990年代文学生产方式的转型这一重要背景。1990年代的文学空间是由作家、批评家与书商等多种因素共同参与、营构的场域,女性文学之所以呈现出以性别为单一核心的话语特征,正是该场域内部多方力量合力运作的结果。因而,以作家、批评家和书商为视域,深入考察1990年代女性文学话语的发生、演进和其重要特征形成的内在根源,不仅有助于梳理女性文学存在与变迁的历史脉络,也能够为释放女性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活力寻找新的可能。

关键词:女性文学;女性话语;性别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9)05-0090-07

在对女性文学进行世纪末的回眸时,王晓明曾批评女性文学创作不由自主地回避了公共生活,并滋养了“个人”的“物质欲望和官能冲动”^[1]。无独有偶,贺桂梅也把矛头指向了1990年代单核结构的女性话语,她批评女性文学创作和研究“往往从单一的性别视角考虑问题,而无法从更广泛的角度面对妇女的社会/文化问题”^[2]。

上述论断能够代表学者们针对1990年代女性文学达成的某种学术共识,即由于受限于单一的性别话语框架,令女作家在兹念兹的性别议题中实际无法介入广大女性群体所面对的社会、文化问题,即便“女性文学”能够在社会公众论域中

迅速扩散、在文化市场中畅通无阻,但最终只能营构女作家精神世界的虚假繁荣,而无法在知识分子以外的读者群体中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学者们指认了女性文学视角的局限性,并预言单一的话语方式必然限制女作家的艺术创作。然而,清楚指出其话语方式的局限性仅仅应当是发现问题的开始,而非盖棺之论。有待解决的问题是,承接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与新时期启蒙文学资源而来,1990年代女性话语为何嬗变,并生成了以性别为单核结构的女性话语模式?

以往涉及1990年代女性文学及相关话题时,我们习惯于从故事和技巧角度抽象讨论其文学性,而忽略了文学生产方式的转型。1990年代的

收稿日期:2019-07-11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世纪介入现实主义小说研究”(项目编号:182W007)

作者简介:张开,男,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性别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文学空间是由作家、批评家、书商、大众传媒等多种因素交织而成的合力场域,如果说女性文学的书写传统与女作家的创作激情是话语生成的原动力的话,那么批评家和文学市场则赋予作家以书写的价值感,并向作家暗示了能够取得声誉与经济效益的特定话语方式,从而引导作家对这种话语模式进行主动获取、习得以至归趋。因而,在讨论1990年代女性文学的走向和困境时,我们选择以作家、批评家、图书出版为视域,以知识考古学的方式爬梳女性话语资源的生成理路。

一

1990年代女性文学写作接续着1980年代女性文学的传统,是其延伸、发展的结果。历史的延展性表现在,这两个十年中的女性文学创作共同表达了“告别革命”的价值取向。也就是说,以性别为单一核心的女性话语在1980年代女性文学的话语实践中早已着床。从代际角度看,早于林白、陈染开始文学创作的女作家张抗抗,在1980年代就已经设想过文学题材与人类生活空间的性别属性。她在西柏林国际女作家会议上按照性别将人类生活空间分为大世界与小世界,并认为“女作家的文学眼光既应观照女性自身的‘小世界’,同时也应该投射到社会生活的‘大世界’”^[3]。这一句式是偏正的,作家将“小世界”视为女性“自身的”归属,而与之相对应的“大世界”则被当作外在于自身的社会空间。在这一男性/女性、大世界/小世界的二元结构“装置”中,张抗抗把“小世界”指派给女作家,视之为女作家最适合栖息的精神领地。可实际上,大/小两个世界共同构成了人类生活的整体,我们无法人为地从生活中将女性剥离出来。并且,这种把女性派定给特定空间的做法恰好显示出女作家深受男/女性别观念模式影响,并不自觉地将自我“他者化”。

1990年代的女性文学正是伴随着女作家对“小世界”和“身体经验”的性别认同和想象逐渐起步的。女作家不仅顺理成章地接受了前辈作家留下的思想资源,并且相较于前辈而言,在社

会业已转型的1990年代开始创作的她们,不需要过多背负转型期的叙事伦理负担,她们身段轻盈地将性别单核话语模式推向某种极端。就文学创作而言,女作家一方面从性别角度回忆并叙述历史中被遮蔽、压抑和扭曲的女性经验,同时宣告其文学创作从大历史、公共空间中退场;另一方面走进“钟形罩”或“一间自己的屋子”,在西尔维娅·普拉斯和弗吉尼·伍尔夫式的小世界中登场,于社会生活之外的幽闭空间中探索个人性的、“独特而隐秘”的身体经验。也就是说,退场与登场构成1990年代女性作家面对历史/现实、国族/家庭、社会/个体时的基本选择倾向。

1990年代女作家的历史重述,与普通的历史文学相比有较大差异。如果说普通的历史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兼有历史记载、政治研究、法律审判及新闻报道的某种功能的话”^[4],那么女作家的历史文学创作对男作家的历史文学和历史元话语的解构意义要远大于其对中国女性集体记忆的正面建构。女作家长于以反讽手法重写历史(history),呈现文本态历史的话语建构特性,以此颠覆男作家的历史话语,给男权中心的历史体系制造危机。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1980年代后期成为文坛主力的女作家。王安忆频繁在“叔叔的故事”(Uncle's story)中制造断裂,目的是消解为右派作家赢得广泛社会声誉的“苦难叙事”。叔叔们^①在男作家笔下是在反右运动中受难的普罗米修斯,在王安忆的故事版本中却被还原为卑琐的肉体凡身。针对同一段历史故事,两性话语提供的历史情节大相径庭,结论亦相互矛盾,男性历史在悖反的话语关系之中“金身脱落”。女作家重述革命历史,部分源自于革命、战争对于中国二十世纪女性来说“不是一个‘事件’、一个时段,而是她们曾经的生活内容或生活环境”^[5]。但应该注意的是,女作家的历史重述重点不在于系统想象,建构女性的国家、民族经验,而在于指陈男性的蛮横霸权与女性的无奈艰辛,在于呈现男性史述的卑琐虚伪与作为历史接受者的女性

① 叔叔们指右派叙事中带有理想色彩的男性角色,他们以《布礼》中的钟亦诚,《绿化树》中的章永璘、《雪落黄河静无声》中的范汉儒等形象为代表。

的蒙骗受屈,在于最终忘却甚至退出有关“大世界”的痛苦记忆。这是由于,只有放逐“大世界”之后,女作家才能心无旁骛地专注于营构“小世界”中独特而隐秘的经验,以性别为单一向度的女性话语才能够以合法的身份出现。从这一角度看,1990年代女作家的历史文学创作致力于唤醒“母系”历史记忆的同时,也从事实上剥离了文学的家国情怀。

“私人化写作”是女性文学异军突起的重要标志,“私人化”是女作家创作现实题材时的最典型特征。从陈染、林白、徐小斌,到卫慧、棉棉,1990年代女性的“私人化写作”可谓高潮迭起。私人化写作的最大特征是题材内容的私人性,它无关社会、民族、国家等时代议题,是女作家在“小世界”中登台后发现身体经验的结果,这一写作潮流直接推动了性别单核话语的形成。陈染是典型的“室内的作者”,她的《无处告别》《与往事干杯》《私人生活》等作品无不着意于对女性独特而隐秘的经验进行刻画。这里的女性经验主要是指身体经验、性欲求与性行为等内容。倘若抽离其代表作《私人生活》中的上述经验,这本小说已无多少主干情节。《上海宝贝》中的女主角一方面是中国青年天天的情感伴侣,另一方面是德国中年马克的性爱伙伴。与其说卫慧将精神/肉体、爱/性放置在二元对立的框架中,对性爱这一复杂现象作了简单化处理,倒不如说女主角的精神诉求和情感角色是为了动物化、官能化的性游戏作冠冕堂皇的掩盖,为其放纵的性行为裹上伦理色彩。因此,王澄霞将1990年代“私人化写作”的发展脉络描述为:隐私→女性隐私→身体隐私→下半身隐私^[6]。性观念的解放无疑能够推动妇女解放,推动人性的自由和解放。然而,世纪末登场的九丹和木子美在“性爱日记”式的《遗情书》中自曝隐私或杜撰隐私,在“实录”的旗帜下大胆奔放地对女性身体进行二次拍卖。这不仅在挑战伦理底线,存在道德上的“硬伤”,同时也是对艺术的亵渎与不恭。

考察1990年代女性文学创作,不难窥见自然的性别身份如何取代了女性的国家、社会、家庭等多元身份属性,步步为营地在历史/现实题材

中成为女性文学的创作方向和言说方法,并最终占据了女性话语的中心。女性文学创作以“祛蔽”为目标,打捞女性历史记忆,反映女性现实经验,原本大有文章可做。但是,关于女性的文学想象被简单化了,女性成为自然性别意义上的单向度的人。

二

如果说女作家对文学分工的设定及其文学实践是促使以性别为单核结构的话语生成之“根本”,是女作家的文学创作活动生产了女性文学的主题和概念的话,那么文学批评家、理论家则凭借其专业知识,对女性话语的内涵进行界说和阐释。毋庸置疑,是批评家的批评实践、理论概括让女作家有意无意的性别表达更加显豁,让独立于集体与阶级、民族与国家之外的性别问题获得了自足性。在性别单核话语的合法化过程中,理论家对女性文学概念的界说以及批评家对女性文学创作的同步批评是两个重要环节,两者共同生成了女性文学及女性话语的规定性。

女性文学概念的正式提出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谭正璧在其著作《中国女性文学史话》中,率先使用了“女性文学”这一概念,从性别维度对文学史进行了重新整合。从对“人的发现”的角度看,女性文学概念的提出顺应了晚清以来文学现代化的必然趋势,然而这一概念却不断遭遇尴尬和驳诘,其中最常见的问题是:文学是否具有性别属性,是否存在与之相对应的男性文学?这些诘问促使理论家、批评家从性别维度出发,为“女性文学”寻求相对于普遍的文学,尤其是男作家的作品而言清晰可辨的核心品质。到1980年代后期,女性文学已经形成较为普遍的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广义概念认为女性文学指女作家所写的表现女性生活、体现女性风格的文学;狭义概念同样将女作家指认为唯一合法的写作主体,但是更加强调女性意识,将女作家与女性意识的组合视为这一概念的特定标识。两者都试图使女性文学中“女性”与生物层面的自然性别相区别,指向更具有学理性的内涵。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种概念当中,无论是“女性生活”还是“女性意识”,其内涵都相当暖

味,甚至可以说是任人填充的能指。如何从人类生活中剥离男性生活并提纯一种“女性生活”,抽象的“女性意识”又如何通过生命经验得到表现?无人作答。因而,准确地界定女性文学这一概念显然成为了赋予其规定性的关键。刘思谦认识到了已有界定的不足,整合广义及狭义的女性文学概念,并使之具体化。她认为女作家和女性意识的组合模式最能够切近女性文学的精神实质——“独特隐秘的女性经验和对女性价值的体认”——是男性作家和保留男权中心意识的女作家们不可能超越、不可能采用,也未能企及的领地^[7]。在这一表述中,独特隐秘的女性经验与对女性价值的认同感成为区别女性文学与非女性文学的关键。虽然女性价值到底是什么仍旧是含混不明的,但独特隐秘的女性经验却不由分说地指向了初潮、性欲、怀孕、生产和哺育等相关隐秘的女性经验,尤其是身体经验。存在的问题是,除此之外,独特而隐秘的女性经验是否还囊括其他内容?如果没有,我们重新组合广义和狭义的概念不难发现,所谓女性文学指的是由女作家为写作主体,注目于女性小世界或者身体经验的文学。女性文学的界定,既体现学者对女性文学创作的整体性把握,又通过与文学现实的互动,重塑女性文学以性别为单一核心的话语形态,反过来将身体写作指派给女作家。

1990年代的女性文学创作与女性文学传统的最大区别在于,女作家悄然置换了宏大议题,性别不再是民族解放的载体,也不再是翻身道情的介质;性别本身构成了谈论的最终目标指向。而性别话语方式的习得与合法性的获取是在与批评家积极对话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批评家通过文学批评积极回应了1990年代的女性文学创作,同时也对女性文学的可能形态进行前瞻性的预见。也就是说,批评家实际参与了1990年代的女性文学话语方式的形塑过程,这不仅为女性文学生成性别单一向度的话语样态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论证了这一话语方式的合法性。批评家的任务之一是重塑评价标准,发现被遮蔽的文学景观。具体到女性文学批评而言,孟悦、戴锦华两位学者的著作《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

女文学研究》具有范式意味。她们较早引入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并将其应用于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实践。她们认为,由于男性文学史家普遍缺乏自觉的性别观念,相关史述中女性文学作品的真实情态被遮蔽在“地表之下”,因而那些偶而被提及的女作家也只是处在挂名状态的“空洞能指”。因而她们以“女性身体”“女性苦难”为核心关键词,重新解读了包括庐隐、冯沅君、冰心、凌叔华、苏青在内的中国现代女作家及其创作,并认为“国家与民族的归属感很大程度上是男性的”^[8],关于国家的叙事不能解释与抹去女人身体所承受的种种苦难。随着女性文学批评标准的提出,许多过去被批评的作家如今被重新接受,在她们之中,萧红的文学史地位变迁最具有典型性。鲁迅在给萧军、萧红的信中,曾针对《生死场》序言补充道,“有一句‘叙事写景,胜于描写人物’,并不是好话,也可以解作描写人物并不怎么好。因为做序文,也要顾及销路,所以只得说的弯曲一点”^[9]。胡风也曾批评萧红“对于修辞的锤炼不够”。然而,以女性文学批评的后见之明看萧红,上述缺点恰恰构成了萧红文学创作的艺术特征,是萧红“用诗的语言和思维写小说”^[10]的结果。

造成女性文学批评祛蔽功能丧失的因素不一而足。但是,在诸多因素之中,研究者的性别经验及由此产生的价值取向无疑起到关键性作用。由于女性学者具有天生的性别优势,利用西方性别话语资源是她们的自然选择,这就使得她们自觉地亲近孟悦、戴锦华、刘禾等前辈学者,并且沿着她们的路走得更远。我们不能抹杀从性别视角取景时看到的别样景色,以及她们对女性隐秘经验作出的系统阐释。但是,每一个文学现象都是立体、多面的,如果仅将研究视野局限在性别取景框架中,便不能够做到“横看成岭侧成峰”,甚至错误地将女性文学研究引入一道从女性主义立场看女作家写女性经验的“窄门”。比如在整理1990年代女性文学创作时,刘思谦曾率先提出“女性新历史小说”这一概念,并从语素角度强调女性新历史小说应涵盖以女作家为创作主体的性别因素,以历史为主要内容的题材因素以及相对于传统历史小说和男性历史小说而言的文学新质等特征^[11]。这一研究视

角,无疑有助于发现女作家在处理历史题材方面的异质性,但由于其博士研究生张兵娟等人在进一步对女性新历史小说作分类研究时采用了单一性别视角,过度关注并盛赞小说中呈现的女性经验,尤其是以女性身体经验、情感经验、轮回命运作为阐释中心,忽略了故事、技巧和话语层面的多种面向,而将女性文学批评模式提纯为单一的性别话语模式^①。可以说,当文学研究的目的完全被性别意识形态化之后,文学批评的言说方式也随之被扭曲为具有排他性的系统。从文学立法角度看,以“女性经验”为核心视点的文学批评对1990年代以性别为单核结构的女性话语的形成来说,其影响或许不是敲边鼓式的推波助澜,而有可能是决定性的。

三

以往我们习惯于从文学本体的角度抽象地谈论女性文学的异质性特征,谈论女性故事中的性别经验以及讲故事的叙述技巧,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杂志、出版对女性文学话语的形塑功能。特别是对于1990年代女性文学来说,如果无视1990年代文学生产方式与传统女性文学创作环境之间的区别,我们可能就无法理解在商业化和现代传媒背景下促成女性文学话语呈现单一向度的重要原因。1980年代前期,作家大多依附于作协、文联等国家单位,是处于计划经济框架之中的国家公务人员,主要依靠工资而非稿酬与版税生活。这就意味着,作家无需把写作视为谋生的手段,在供给制语境下,工资——“铁杆庄稼”作为个人的经济来源,具有旱涝保收的特点。创作数量和写作质量给予作家的仅是声望、名誉等象征性资本。但是,从1980年代中后期的社会转型开始,文学一方面遭遇了被迫“断奶”的局面,“除少数必须补贴的期刊外,其余期刊都要‘独立核算,自负盈亏’”^[12],原本抱定了“铁饭碗”的作家和文学相关从业者今后必须自谋出路;另一方面,文学传播媒介原本在政府严密规范和监管下,并不具备独立性,但经济制度的转型、国家监管力度的适度调节,使传媒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主体性。具体到对1990年代女性文

学生产方式来看,女作家逐渐朝市场归趋,向市场靠拢,同时报刊、杂志和书商共同操作、制造了女性文学一波又一波的“热潮”。也就是说,1990年代蓬勃发展的文学市场和大众传媒生产了“女性话语”、“包装”了女性文学,即便这种作用不是决定性的,在女性文学话语日趋单一化的1990年代,至少起到过推波助澜的作用。

1990年代女性文学创作队伍曾呈现出“四代同堂”的繁荣局面,这批女作家中不仅有“文革”结束后开始创作的张抗抗、张欣欣、张洁等人,还有1980年代中后期成为文坛主力的王安忆、池莉、方方等人;有1990年代初登文坛便引领女性文学风潮的陈染、徐坤、徐小斌等人,也有世纪末在传媒策划之下集体亮相的魏微、卫慧、棉棉等“70后”女作家。随着自由作家与自由撰稿人重新成为一种职业志向、生活方式和身份选择,女作家中包括林白在内的自由撰稿人,在以文学市场化为背景的1990年代普遍交上了好运,不断地出版自己的新书,又不断地领取稿费,成为市场的宠儿;女作家中也有像铁凝这样供职于文化管理部门与科研机构的体制内作家,由于被市场之风吹动心襟,主动加盟书商的出版、策划活动,为出版社量身定做了包括《无雨之城》在内的有失创作水准的作品。我们虽然不能据此指认作家对文化市场投降纳表,但是也没有必要遮掩1990年代文学与商业联姻这一事实。既然整个社会都已经被纳入到了商业轨道,文学创作活动也难免与商业接轨,就有必要正面回应“商业和经济的价值取向也将同样是文化创造的重要标准和目标”这一问题^[13]。因此可以说,同时追求价值与价格、靠近文化市场是多数作家的必然归趋。作家为了满足市场并寻求读者,就不得不琢磨读者的欣赏口味,甚至投其所好地进行“目中有人”的创作。

既然在文化商品营销过程中,必须将女作家与女性文学放置在“被看”的位置上,那么就需要相应地创造出能够引起观看欲望的内容,即鲁迅先生在《论照相之类》一文中所说的,“我们中国

^① 张兵娟的相关论述散见于《一道奇异的历史风景线——女性新历史小说及其批评概览》等文章中。

的最伟大最永久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14]。只不过对女作家而言需要的不是易装,而是将自己还原到最为本质的生理层面——好看的层面。因此,1990年代突显女性气质和生理性别的文学书系成为商业热点和消费时尚。尤其是在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前后,出版商、文学期刊、批评家和作家相互联合,创造了商业价值与文学热点的双重效益。仅此一年,就有四川文艺出版社策划出版的“红辣椒”丛书,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蓝袜子”“红罂粟”“金蜘蛛”丛书,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她们”丛书等书系相继问世。以上书系名称有意挪用传统文化中的女性象喻,并将其当作吸引顾客的招牌,这不仅违背了女性话语,不能颠覆传统性别文化秩序,反而以自然性别作为商业竞卖的标签,加深了大众对传统女性角色的刻板印象。除去书系名称将性别符码转化为商业符码这一策略之外,丛书中的序言以及广告语同样强调了女性话题的异质性、神秘性和趣味性。比如,王蒙在“红罂粟”丛书序言中突出了女性的“心软,心细,感情化,神经质”等特点;程志方则在“她们”丛书题记中强调“她们是他们。我们是他们”,从自然性别层面将女性“包装”成与男性相区别的“她者”。此外,上述两种丛书将那些能够反映作者趣味和审美选择的生活照作为插图,与文字信息共同构成了可看并且好看的视觉内容,也就是说“写女人”和“写作的女人”共同构成了被阅读和被观看的卖点。这意味着,不仅女性文学作品能够成为文化商品,就连女作家自身也无法避免被商品化的命运。

因此,女作家如何看待性别因素被制造成卖点,如何回应女性现代意识被扭曲和误读,如何在价格看涨而价值跌落的现实悖论面前进行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她们对市场期待的回应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女性文学的话语方式及其走向。以“红罂粟”丛书为例,其中包括了当时活跃在中国文坛上的22位女作家的新作和力作,这种系统性、大规模地为女作家集体出书的现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出版史上实属罕见,结果证明这种策划方式具备了相当大的市场号召力。丛书封面上一个个洁白、殷红的罂粟既是良药又是毒

品,它们象征着妖娆而美丽、诱人却危险的女性魅力,更是对传统文化观念的女性形象——天使与恶魔集合体的现代演绎。有意味的是,该丛书的名称“红罂粟”并非男性的性别设计,而是女作家的自我命名,是1994年夏天女作家在河北教育出版社组织的笔会上的集体智慧的结晶^[15]。也就是说,女作家面对书商暗示与市场期待时,在理性、自觉的情况下进行着判断和选择。女作家以此自喻,或许暗示了这套丛书对于传统话语方式构成了挑战,从这一角度看具有一定的解构意义。然而,即便隐喻修辞和诗意表达能够为女作家的表态提供较大的阐释空间,女作家可在此空间之内进行解释和辩驳。但不容置疑的是,由于女作家自身性别立场的游移与暧昧,她们并未对被观赏、被把玩、被消费的境况进行批判,反倒心甘情愿地将私人化的身体表述作为吸引读者的招牌。随着文化市场的成熟发展,商业资本和大众传媒会以强大的力量重塑女性话语,突显出性别向度在女性话语中的重要位置。到1990年代末,卫慧登场,“并询问他们来看看上海宝贝的乳房”时,可以说,“女作家不再以‘女’字为耻,而是以比较自如的心态来面对这一曾经是1980年代文化识别方式中的‘第二性’身份”^[16]。

勾勒1990年代以性别为核心的女性文学话语知识谱系,分析其在不同领域中的运作方式,目的是对其走向进行检省并纠偏。我们发现,在新启蒙语境之下,女性文学回避了革命、国家、民族等宏大议题,追求“纯文学”的创作目标,并将个体化、私人性的生活经验指派为女作家最应表现的题材范畴;从生产方式角度看,市场对作家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女作家接受了批评家和书商的提议与策划,主动归趋并习得了使女性文学变得“好看”的话语方式,最终使性别因素兀立在女性话语的核心位置。由此可见,作家、批评家以及文学市场共同推动了女性文学话语的生成,尽管女性文学话语存在各种各样的表述,但事实上其共同突显了性别在女性文学话语中的核心位置。作上述梳理,不是要把颠倒的再颠倒过来,否定私人化的写作形态,而是试图探寻女性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多重可能性与活力,使女性文学不

至于沦为少数人的乌托邦,而能在更广阔的天地 里创造出真正诗意的世界。

[参考文献]

- [1] 王晓明. 在创伤性记忆的怀抱中[J]. 文学评论,1999(5):48-50.
 [2] 贺桂梅. 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三种资源[J]. 文艺研究,2003(6):12-19.
 [3] 张抗抗. 我们需要两个世界[N]. 文艺报,1985-08-10.
 [4] 许子东. 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 50 篇文革小说[M]. 北京:三联书店,2000:3.
 [5] 李小江. 让女人自己说话:亲历战争[J]. 读书,2002(11):03-09.
 [6] 王澄霞. 情色话语:男权与女体——当代大众审美文化批评三题[J]. 扬州大学学报,2004(3):22-26.
 [7] 刘思谦. 女性文学这个概念[J]. 南开大学学报,2005(2):1-6.
 [8] 刘禾. 跨语际实践[M]. 北京:三联书店,2014:237.
 [9] 鲁迅. 鲁迅全集:第十三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76.
 [10] 杨联芬. 中国现代小说导论[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96.
 [11] 刘思谦. 走进历史隧洞的女性写作[J]. 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3(1):17-21.
 [12] 邵燕君. 倾斜的文学场——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2.
 [13] 吴俊. 文学的变局[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81.
 [14] 鲁迅. 鲁迅全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96.
 [15] 语嫣. 这套书为何叫“红罂粟”[N]. 中华读书报. 1995-08-16.
 [16] 贺桂梅. 女性文学与性别政治的变迁[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203.

The Monotonous Consciousness of Gender: A Re-examination of the Production of Female Literary Discourse in the 1990s

ZHANG Kai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 Looking back at the female literary creation in the 1990s,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hat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a monotonous gender discourse, female writers' gender issues can only limitedly intervene in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life faced by female groups, and they can not have a broader impact on readers. Previous studies tend to focus on the story and narrative aspects of the text. Although they can measure the gain and loss of female literary creation in the 1990s from a literary perspective, they neglect the important background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ode of literary production in the 1990s. Literary space in the 1990s is a field jointly participated and constructed by writers, critics and booksellers. The reason why women's literature presents the discourse characteristics of gender as a monotonous core is precisely the result of the joint operation of multiple forces. Theref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riters, critics and booksellers, an in-depth study of the occurrence, evolution and the internal causes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female literary discourse in the 1990s will not only help to sort out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existence and change of female literature, but also help to find new possibilities for releasing the vitality of female literary creation and criticism.

Key words: female literature; female discourse; gender

(责任编辑 文向华)